

鳳凰週刊

2015大軍改啓幕

中共最高「課堂」新變化 | 「超級水稻」之禍
王朝搶劫疑案後續 | 人口政策至少應超前一代人



中國內地 RMB 15.00元 港澳地區 HKD 25.00元
本刊獲特許在中國內地發售

Independent Thinking for Chinese All over the World.
www.ifengweekly.com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凤凰周刊》上期封面



凤凰周刊官方网站



凤凰周刊官方微博



凤凰周刊微博



凤凰周刊微信



世界遗产地理官方微博

鳳凰週刊

PHOENIX WEEKLY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咨询服务热线

深圳0755-25934567/北京010-65281005/
香港00852-22008790 传真0755-25934579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董事长/出品人 刘长乐
行政总裁 崔强
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王纪言 杨家强 周军
编委会顾问 余秋雨
编委(姓氏笔划为序) 王晋年 王多多 邓飞 刘庆东 刘爽 何新京 吴晓镭
钟大年 段敏 郭志成 唐建 袁路 喻凌霄
编委会秘书长 孙谦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社长/总编辑 孙谦
副社长 丁晓曙
副总编辑 蓝芝
主编 师永刚 周宇
副主编 崔世海 段文
总编室主任 魏恭 总编室副主任 黄楠
编辑部主任 崔世海(兼) 编辑部副主任 王毕强 路琰 漆菲
主笔 叶润洋 段宇宏 袁凌
主任编辑 晓波 李光
编辑 徐伟 陈祥
首席记者 钟坚 张弛
主任记者 孙杨 曾鼎 吴如加
记者 谢彦辉 徐佳 王琰 李克难 马军 刘荣
邱锐 郭天力 赵福帅 曹蓓 闵云霄
特派记者 李想(华盛顿特区) 蔡源(墨尔本) 田晶(巴黎)
特约主笔 曹景行 杨锦麟 南方朔 谢国忠 阮次山 何亮亮 石齐平
美术总监 小米 图片总监 丁大伟 美编 黄静 虎妹
多媒体发展部主任 吴穷 广告总监 李泽红
多媒体编辑部编辑 马茹均 莫文辉 韩丰泽 康亦玮 钟新星

香港凤凰周刊副总经理 崔博

海外事务总经理 夏婷婷 / 社长办公室主任 赵海燕
大区业务总经理 齐崇轩 柳楚光 傅张伟 高卉 周卫 李莉 / 出版事务部主任 李迪 / 副主任 张云
驻地代表 北京 贾楠 / 上海 金龄 / 广州 陈卫东 / 南京 任浩

法律顾问 王霖 财经顾问 沈铭

编辑出版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编辑部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景街2-6号 电话00852-22008790
社址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景街2-6号凤凰卫视总部 电话00852-22008888
深圳办事处 深圳市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号楼6楼 邮编518026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嘉景大厦9楼 邮编518001
电话86-755-25934567(订约热线)/25934558/25580179/25934597
Email:weekly@phoenixtv.com.cn
北京办事处 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金龙建国温泉酒店3211室 邮编100005
电话86-10-65281005/65281006(订约热线)/65211745(办事处)
Email:cuibo@phoenixtv.com.cn
北京凤凰雨翔广告有限公司 汽车、外航行业总代理 IT、房地产行业代理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10号院 电话010-84467053/84467054
浙江金色凤凰影视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浙江省区域广告总代理
杭州市文三路90号(东部软件园内)凤凰科技楼7号楼6层 电话0571-87175087
上海新泽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广告总代理
上海市余姚路288号1号楼7楼 邮编:200042 电话021-63511838
深圳市派动广告有限公司 华南区钟表、金融、洋酒、红酒、地产行业总代理
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南方日报大厦7楼 0755-83226011 0755-83225602
凤凰周刊理事单位 深圳凤凰生活文化广告有限公司
中国内地进口/发行总代理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地址 北京市工体东路16号 电话86-10-65063082
承印人 凸版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北角电气道169号宏利保险中心20楼

中国大陆广告总代理 神州电视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010-65207877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381号中环广场1927室 电话021-52925188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55号峨山饭店商务楼2705室 电话028-85588710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建设大道700号香格里拉饭店432号 电话027-85781338
西安分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东大街319号索菲特人民大厦东楼2层 电话029-87928666
沈阳分公司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总统大厦A座2103室 电话024-22814065
凤凰卫视广告综合业务机构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010-65207833
广东一代传媒 广州市东山区文德路67-69号金德大厦28楼 电话020-83226130

广告委托代理商 深圳市凤凰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嘉景大厦9层(邮编518001)
广告热线 0755-25580179 传真0755-25580169
广告客户服务热线 0755-25580179/25934597 传真0755-25580169

本期所有文字和图片作品经著作人授权本刊,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作品并不代表本刊立场观点。

本刊字体由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军改事关国家民族之命运

□ 周兼明

备 受关注的中国军队改革方案出台了。2015年11月24-26日,中央军委召开改革工作会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部署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具体计划与任务。这可能是中共建政60多年来规模与力度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次军队改革。面对新一轮世界性军事革命浪潮,构建一个能应对未来信息化战争要求的新型军事体系,必然会给中国军队带来一场整体性、革命性的变革。

本次军队改革的核心,是对军队组织体制的改革。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表述,是要构建一个“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军事新格局。中国现行的军事体制,无论是军委一总部制,还是军区建制,都是早年仿照前苏联军队建立的。总部制几经变动,形成了现在的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四总部。由于四总部都拥有决策权和执行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互相隔绝的权力架构,给军委的统一领导带来难度。所谓“军委管总”,就是要把总部体制改为“军委多部门制”,通过对这些部门工作的合理划分,将其变身为军委直属的参谋部门、执行部门和服务部门,决策权上移并集中到中央军委;原来权力相对独立的“总部”,将变成权力互有制约的“军委部门”。

对原大军区和军(兵)种的改革也是如此。过去作战和行政合一的大军区制管理的是陆军,弊端也很明显,不仅大军区易成自成一体的封闭体系,而且因此与海军、空军、火箭军(二炮)等军(兵)种长期处于完全分离、独立的状态,早已影响到信息化状态下的诸兵种合成作战与演练。现在,把用兵体系和养兵体系分开,构建一个“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作战指

挥体系为“军委——战区——部队”,可让指挥变得更快,以应对突发作战任务的实现。领导管理体系则为“军委——军种——部队”,使部队日常管理和建设影响不到作战与训练,对提高军队作战能力的作用会更明显。

这种改革模式,其实也是世界军事革命的大势所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发展,不仅引发了军事技术、武器装备、作战方式的变革,也推动了军事组织理论和模式的变革。美、英、法、俄等国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纷纷开始了军事改革,向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进行转型。军队谋划和比拼的,永远是未来的战争。面对这种全球性的军事革命浪潮,只有进行组织体制的改革,才能让军事组织架构适应信息化战争的需要,真正实现整体军事力量的提升;不顺势改革,等于在战略上已落后、被动于对手。而这种被动影响的不只是军队的命运,也会直接关系甚至决定国家整体安全。应当说,这是中国高层决心对军队进行整体性、深层次改革的深层动因。

这次军队改革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抓住“治权”这个关键,在军队内部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新体系将把实现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分开及制约作为原则,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要“重点解决军队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监督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的问题”,会议透露,将组建新的军委纪委、军委审计署和军委政法委。这些监督机构由于改为直属军委、垂直领导,对独立调查与发现问题非常有利。毕竟,军队腐败对国家来说是最危险的腐败。作为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之所以反复告诫全军上下,要深刻总结、全面吸取徐才厚贪腐案件的教训,也正

是站在国家安全和民族命运的高度来履行军委主席的职责的。

这次军改的目标,是要打造一支精锐作战力量,推动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所以裁军30万、精简非战斗机构人员、优化军(兵)种结构、改革部队编成、推进军事管理革命都成为这次军改的重要举措。其中,调动战斗人员的主动性,使之可以面对复杂的战争环境与各类困境最为重要。所以管理者要始终注重把发现和培养既懂战术技能、又能审时度势的综合性军事人才作为推进改革的目标之一。

必须承认,这种广度和力度的军改将遭遇的困难注定非比寻常,但相较于改革成果,又是军队前行的必由之路,国家发展不得不跨越这个门槛。因此,在涉及到权力转移、编制调整、人员裁减等关系到官兵的切身利益时,要未雨绸缪,妥善应对人心抵触和机构内耗等问题。国家和社会需为军改提供较好的财政支持与配套措施,从工资、退役安置及社保制度等方面确保军人的待遇,这样军改才不致影响到军队或社会的稳定。任何改革方案都不可能毫无偏差,而效果的显现也需要一个过程,全社会多一分支持和理解,军改成功的可能性就大些——这也是推进军改的关键。

在军事技术和思想迅猛发展的今天,军队改革甚至会成为一种常态。国力越强大的国家,越会把军队改革视为一个持久而艰难的过程。说到底,军改改变的是思维方式与对未来战争的判断,所以需要不断的探索和调整。如果军改在2020年前取得突破性进展,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最终使之演变为一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对中国军队来说,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18 2015大军改启幕

COVER
STORY

此次军改是中共建政以来军队系统最大的一次深刻变革，其意义不亚于“1980年代初地方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改变”，其更深远的影响可能需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得清楚。

红雲红河集团
HONGYUNHONGHE GROUP
赠阅部分嘉宾

卷首语 Editorial

3 军改事关国家民族之命运

现在时讯 Trending

6【瞬间/封面/台港澳/中国观察/环境&科技/
阅读/军事】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18 2015大军改启幕
32 “史上最牛”军改出台幕后

大陆时事 Mainland Politics

40 中共最高“课堂”新变化
42 “超级水稻”之祸
46 “互联网+”颠覆医疗体制，道阻且长



“超级水稻”之祸 42▲

黑龙江不少农民领种了免费发放的号称产量高的稻种，并获得“承担低产部分的补偿”的承诺，但最终稻田大量减产甚至颗粒无收。目前农民们辗转多地讨要说法，均无功而返。损失到底该由谁来埋单？

观察 Observer

50 人口政策至少应超前一代人
54 给中国的“扎克伯格”们打开做慈善之门

特别报道 Feature

56 王朝抢劫疑案后续

国际 World

62 韩首次追回海外贪腐款内情
64 巴黎气候大会：为何如此悲观

军情 Defense

68 击落苏-24的土空军实力几何

专题 Feature Story

70 以银川速度打造塞上智慧之巅

财经线 Business

- 74 第三方征信牌照难产 催生灰色业务
- 76 资金链紧绷 大陆企业债务风险加剧
- 79 财经资讯

图谋天下 Galleries

- 80 外国记者镜头里的西藏

历史档案 History

- 86 华沙条约组织诞辰60年祭
- 90 微史记

文化 Arts & Culture

- 92 导演王小帅：
时代忏悔无门，故乡温柔犹在
- 95 商业片和独立电影如何共存？
- 97 旧学问和新学术

行走 Traveling

- 98 穿越爪哇：浓缩的印尼风情画

三地书 Books

- 102 人类为什么越来越善良？

资讯前线 Advertorial

- 53 浙江开化醉根山房圆满落成

40

中共最高“课堂”新变化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不仅“课堂”首次走出中南海，学习形式也一改专家授课、政治局委员听课的传统，出现自学、调研、讨论等多样化形式。

64▼

巴黎气候大会： 为何如此悲观

巴黎会议面临的巨大挑战并非制定更多的一次性排放目标，而是克服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即经济发展必然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相冲突。



王朝抢劫疑案后续

对突然改口的原因，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邢世平委婉地向媒体透露：“不这样说，不让你走。”

56▲



商业片和独立电影如何共存？

“现在应该去思考商业片和独立电影如何共生并存，而不是谁代替谁。娱乐工业现在是主流，而作者型电影（独立电影或艺术电影）不是主流，且处境过于艰难。”

95▲

广告目录

新媒体 / 第一跨页 周刊征订 / 封三 《世界遗产地理》 / 封底
《凤凰周刊·生活》 / 13 松下 / 17 比音勒芬 / 27
将本刊作为指定读物的航空公司和酒店 / 61 广告资讯 / 104





MOMENT

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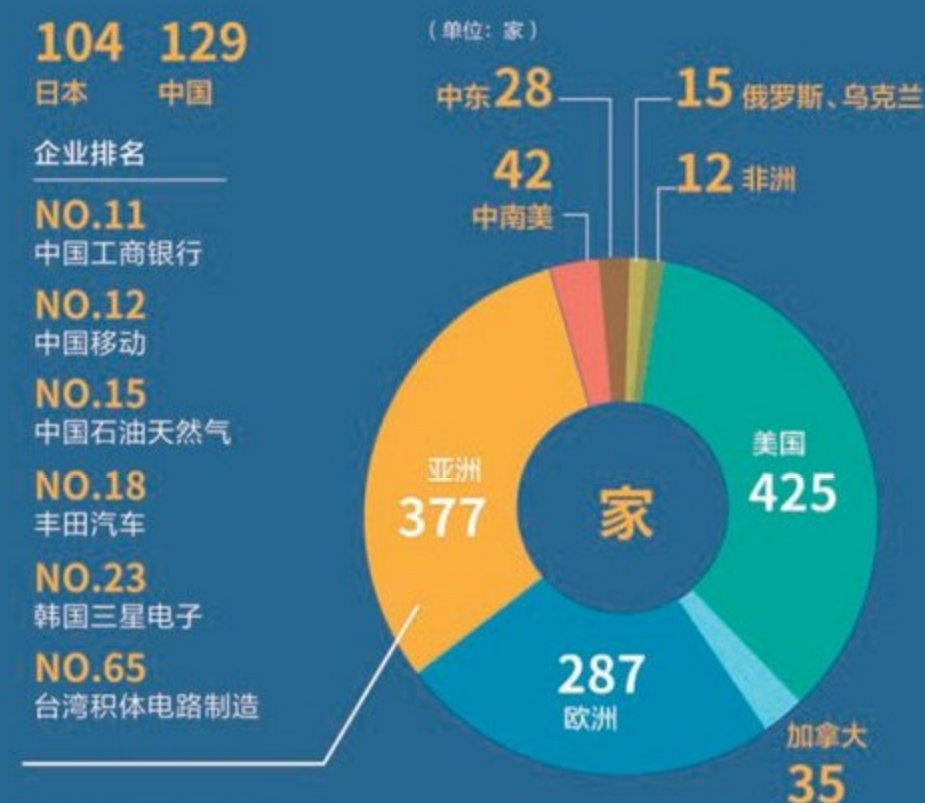
黑河市 2015 / 11 / 29

黑龙江省军区某边防团百余名“95后”新兵冒着零下20余度严寒气温进行五公里体能训练。



市值超100亿美元企业 亚洲占三分之一

在全球股票市场上，亚洲企业的存在感不断增强。日本经济新闻社（中文版：日经中文网）基于QUICK和FactSet的数据统计显示，截止10月底全球股票总市值超过100亿美元的企业共有1221家，亚洲企业达到377家，占1/3。其中日本企业占104家，中国占129家。



资料来源：日经中文网 11月27日

中国中产规模 居世界之首

●《海峡时报》/2015.11.28

→ 日前，中国金融调查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家庭平均资产水平为91.9万元，其中房产占比高达69.2%。同时，中国中等收入家庭成年人口数量为2.17亿，平均财富为81.21万元，这一规模和财富总额均居世界首位。

11月27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家庭金融研究部首席研究员李凤表示，2015年中国家庭平均资产水平较2013年增长20.2%，金融资产增幅最大，高达59.4%。从调查结果看，家庭金融资产增长主要来自于风险资产的增长，与2013年比，股票增长92.5%，金融理财产品更是飙升至198.5%。但她也指出，“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增长主要源自价格具有波动性的金融资产和房产。”

另一方面，家庭定期和活期储蓄资产在金融资产中占比分别为36.3%和34.4%，两者总和超过70%。同时，2015年中国家庭总资产中，房产占比高达69.2%，比美国的两倍还多。此外，中国百姓的负债水平也远低于美国。“这反映出我国的家庭资产流动性非常弱，与百姓对拥有房产的传统意识有关，说明大家的收入还不算高，没有更多的钱去配置流动性强的金融资产，并且中国百姓理财意识还不够。”她表示，中国的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比例比较低，一方面因为金融知识缺乏，没有涉及股票、基金、债券等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很多人虽然有贷款需求，但因为手续麻烦等原因而不去银行申请贷款。

关于中等收入家庭，中国中等收入（即个人净财富在32万至320万元之间）家庭成年人口数量为2.17亿，人均财富为81.21万元，规模和财富总额均居世界首位；但中等收入家庭人均财富还不及美国，成年人口中的中等收入家庭占比中国为21.4%，日本接近60%。“中国的财富分配结构呈金字塔形。”李凤说。

1

美国之声

2015/12/01

中美闭门磋商打击网络犯罪

中美两国官员正在华盛顿举行首次打击网络犯罪高级别对话。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达成的一项共识，也是自从美国司法部2014年因网络盗窃行为而起诉5名中国军人导致中国中止中美网络安全工作组活动以来，两国首次就网络安全问题正式对话。这次对话的美方共同团长是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和司法部部长林奇，中方主持对话的是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美国国土安全部有关官员表示，会议在12月1日-2日举行，这次会议不向媒体开放。

2

《星岛日报》

2015/12/02

报告：海平面上升危及中国沿海城市

日前中国科技部集合550位专家撰写了《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详细列举了全球变暖将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报告显示，日益升高的海平面将使中国沿海城市面临危险，冰川以及永久冻土层融化也将威胁三峡大坝和青藏铁路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该报告预测，到本世纪末，靠近中国东部的海域会比20世纪的平均水平升高40-60厘米，进而导致上海等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更容易发生潮汐引发的洪灾，暴风雨和台风的危害也会加剧。中国内陆的降雨和降雪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91.9 万元

中国金融调查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家庭平均资产水平为91.9万元，其中房产占比高达69.2%。



香港三大基建项目 均超支延误惹争议

•《联合早报》/ 2015.12.02

→ 香港三大基建均出现超支及延误争议，但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12月1日在5票赞成、13票反对下，否决“要求押后机场第三条跑道工程（三跑）”的无约束力议案。泛民议员批评港府以工程“烂尾”作胁迫，特首梁振英则呼吁港人支持高铁香港段工程的“封顶”协议。

除高铁香港段及“三跑”外，另一惹起争议的基建是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公民党议员郭家麒指出，目前香港建筑业人手和物料短缺，应押后工程，否则多个工程同时进行，推高造价。特首梁振英主动谈及高铁超支问题。他说，港府与港铁公司在五年前就高铁工程签订的协议，没有就工程费“封顶”，而前日双方公布的协议，确定了工程在2018年第三季完工，并就工程费“封顶”，值得大家支持。

根据协议，高铁造价由五年前650亿港元修订为844.2亿港元，港府将向立法会申请额外拨款逾196亿港元，港铁则计划向外借贷派发特别股息，所得归还港府，变相抵消超支款项。但新民党议员田北辰说，是否支持拨



款，须视港府就“一地两检”的交代再决定。田北辰坦言，若高铁没有“一地两检”，长远来说是“国际笑话”。律政司长袁国强日前访京后表示，要实施“一地两检”，免不了要让大陆人员在香港西九站执法。他说，仍继续同北京商讨，原则是不能违背香

港《基本法》。

另一方面，立法会小组会昨日审议港珠澳大桥的54.6亿港元追加拨款，令该项目总预算增至358.95亿港元，并延迟一年至2017年底才落成。路政署长刘家强表示，若不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拨款，需废除没有即时需要的设

施，例如减少检查亭的数量等。

虽然香港库房丰厚，但大型基建的“超支”已引起立法会警惕。即将开展的“三跑”工程项目，以天价1415亿港元兴建，造价较最初估算的845亿增加67%，多名议员担心“三跑”项目若超支，最终也是由纳税人承担。机管局行政总裁林天福强调，会尽量降低超支风险。他说，“三跑”造价预算经多重独立顾问量定，有信心相关预算合理。但机管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二号客运大楼最新改建设计，包括在大楼两旁加建附属大楼，设置陆路运输设施，及在地底兴建旅客捷运转车站。

由于二号客运大楼将由目前只能出境，拟改建成全功能、即可以出入境和转机之用，改建费用由2010年第四季估算的95亿港元，大幅上升约七成至2014年估算的165亿港元，较当年二号大楼所需的28亿港元增近五倍。环保团体“环保触觉”四名成员到会场外抗议。他们批评“三跑”工程费估算逾千亿，且有不断增加趋势，更要“香港人做羊咭”支付，形容该工程是“大骗局”。

（易锐民）

两岸首度换俘 前所未有善意

•中评社/ 2015.12.01

→ 两岸2015年10月首度进行交换被俘情报人员行动。两名台湾情报人员朱恭训、徐章国于10月13日获大陆释放返台，而台湾则于10月底提前假释大陆情报人员李志豪。两岸首度换俘被视为历史性动作，

引起关注。路透社评论称，两岸以前所未有的善意进行了换俘行动。台湾媒体分析，换俘是两岸政治互信的试金石，更是两岸谈军事互信的第一步。

两岸官方也都对首度换俘作出回应，但侧重点不同。国台办发

言人安峰山表示，朱、徐二人符合假释条件；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则说，这是基于“习马会”两岸互表善意所致。无论从什么立场、什么角度看，首度换俘，都是两岸累积善意、降低敌意的一项重要发展，对将来两岸政治对话、建立军事互信机制有帮助。

因为长期的政治、军事对峙，过去两岸间出现很多互相对抗消耗的悲剧。如果两岸不和解，继

续对立，这种对抗消耗就还会继续下去，就还会有冲突和牺牲。因为“大选”临近，台湾可能政党轮替，两岸善意互动能否持续下去，面临考验。两岸首度换俘在“习马会”举行之前完成，那是双方互释善意、营造良好气氛的表现。两岸领导人新加坡会面让两岸在降低敌意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如果两岸朝这个方向走下去，未来获致更多类似换俘的具体成果，是很自然的。



中共的命运和反腐败息息相关。通过反腐败重建制度，通过反腐败寻求更有效的反腐败体系，只有这样，一个政党才能生生不息，实现可持续发展。

反腐败与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 《联合早报》/ 2015.12.01

→ 自中共十八大发动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以来，海内外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这场运动才会停止？实际上，考虑到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反腐败不应当有逗号，更不应当有句号。换句话说，反腐败应当是永恒的常态。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讨论反腐败的政治重要性。

首先从政权内部运作来看，腐败往往导致政权自我击败和毁灭。腐败影响政权的治理能力和效率。为什么需要政府？任何时候，政府必须提供和维持公共秩序，这是最低限度。在现代社会，政府还必须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尽管不能把政府（government）等同于国家（state），但政府无疑是社会中最重要国家制度。如果这一国家制度腐败了，对国家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腐败导致执政党及其政府合法性的流失。无论是政党还是政府都是治理社会的有效组织。要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政党及其政府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

合法性，也就是社会自觉接受执政党及其政府的统治和治理。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合法性有很多资源，例如社会秩序的维护、经济的发展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等，但不管如何，一旦腐败蔓延于执政党及其政府，或执政党及其政府被社会成员视为是腐败的，其合法性就会流失。

第三，腐败往往趋向于形成寡头政治，也就是中国官方所说的“团团伙伙”。一旦寡头政治形成，就会对整个执政党和国家构成致命挑战。无论是周永康、令计划还是军队里面的徐才厚和郭伯雄，所形成的“团团伙伙”不仅是从中央到地方的网络，更是横跨中央多个部委的网络。这些大都是腐败的寡头，在内部通过买官卖官或者不正当的政商关系等途径形成。这些腐败的圈子在不长的时间内，不仅越来越大，并且也越来越无法无天。

正是因为腐败会导致中国官方所说的“亡党亡国”，反腐败运动本身就成为目的。腐败发展蔓延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如果不通过大规模

的反腐败运动实现“治标”，做其他任何事情（包括“治本”）也会显得无济于事，不会有什么效用。这也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发动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的最大理性。

不过，在实现这个初始目标之后，反腐败运动又表现为手段，即实现其他目标的有效工具。只要中共是具有使命感的政党，这种反腐败运动就不会有结束的一天，而是常态化的政治行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反腐败可以说是中共实现“四个全面”的起点。考虑到中共是中国政治和改革事业的主体，完全可以认为第四个“全面”最为关键，前面三个“全面”都是中共所要实现的短长期目标。如果把第四个“全面”放在最前面，就很容易理解“四个全面”了，即中共要通过从严治党来实现其方方面面的使命。

反腐败运动的最终目标，是要确立一套新的能够预防腐败和保障清廉的制度体系。人们经常把反腐败和制度建设对立起来和分离开来，这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反腐败的过程也是制度重建的过程。很多方面的制度开始重建或者转型。首先，已经开始改变从前体制内部反腐败过于分权和分散的状态，形成了一个以中纪委

为核心的反腐败体系，制度效率大大提高。其次，体制内的“外部反腐”机制逐步形成。之前，反腐败往往是自己反自己，例如各部委的腐败都是各部委自己负责，各地方的腐败也是自己负责。现在则不同了，中央各部委的反腐败由中纪委直接负责，而纵向上实行“下管一级”的制度，例如省一级的反腐败直接由中央来负责。其三，中央巡视体系的建设。这是中国古老的制度，存在了数千年，有其强大的生命力，现在把这个传统复兴起来，为现代所用。其四，新的党纪体系的建设来预防腐败。

不过，反腐败运动和制度建设仍然具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反腐败运动要走向法治化，而避免走上民粹主义的道路。现在在一些地方，反腐败演变成干部之间的互相揭发和社会对党政官员的揭发。尽管这种形式成本很低，但往往会造成扩大化，造成人人自危，更重要的是破坏法治精神。如果把改革试错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视为腐败，整个官僚系统就很难作为，更会扼杀改革者的改革精神，导致不作为、不能作为、不敢作为的状况。而这正是目前中国很多地方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郑永年）

人民币入篮 中国货币管理方式面临考验

• 《华尔街日报》，节选 / 2015.11.30

→ 美国东部时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目前拥有储备货币地位的货币只有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人民币被纳入储备货币将意味着，随着中国在全球金融领域地位的上升，人民币地位的提高得到了认可。

接下来中国将面临真正的考验：人民币被纳入储备货币将给中国政府带来新的压力，中国需要在人民币管理、如何与投资者和世界交流等各个方面做出改变。中国有关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管制及开放中国金融系统的承诺将面临新的监督。中国央行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表示，中国必须建立国内外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阻止人民币全球化带来的金融风险，这要求继续协调推进各项金融改革。

人民币“入篮”也将令中国央行面临压力：美联储、欧洲央行和其他重要机构所应达到的政策清晰度和信息透明度，中国央行同样应达到。这可能存在困难：单单在过去六个月，中国央行就有多次出人意料举动，包括推动人民币意外贬值，在中国股市重挫期间大多保持沉默，央行还澄清央行行长周小川关于今年开通深港通的讲话实际上是几个月前发表的，这也让市场感到一头雾水。

上海资产管理公司彬元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创始人周平表示，央行需要更加清晰有效地与市场沟通；对央行而言，就像是某种形式的文化转型。即将到来的一项挑战是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引发的要求人民币贬值的市

压力，而此前三个月央行一直试图提振人民币。中国央行顾问称，预计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可能是小幅渐进式的，未来12个月或许会贬值3%-5%。他们说，挑战在于如何向市场清晰传达央行的意向。

预期中的人民币“入篮”是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及其同僚取得的最高成就。围绕人民币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应与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的重要性相匹配这一观点，他们争取到了政治支持。为达到IMF的储备货币标准，虽然遭到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中国央行仍推行了一系列变革，如放松利率限制、放宽海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条件。

不过，为了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现年67岁的周小川和他的继任者必须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出于对经济减速的担忧，中国领导层已经放缓了一些金融领域的关键改革。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年底实现金融市场更加自由化的目标已被延至2020年底前实现。

金融改革步伐的放缓也减少

了投资者对人民币的热情。周平认为，人民币目前大约高估20%，若继续维持这样的水平，只会对经济不利。高盛集团在一份11月19日的报告中指出，人民币显著贬值是新兴市场资产明年面临的重大风险。人民币的贬值虽然对中国出口行业有利，但是会招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批评，指责中国在人民币问题上玩弄政治手段。

尽管人民币被纳入IMF货币篮子基本上是象征性的，但当IMF每五年一次对其货币篮子进行评估时，中国的金融政策可能会受到批评。正式来说，SDR是一种虚拟货币，IMF利用SDR对其成员发放紧急贷款，成员国可以用SDR增加外汇储备。洛杉矶资产管理公司TCW董事总经理洛文杰表示，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说，人民币纳入SDR不是什么大事；缺乏数据和政策透明性对投资者来说仍是一项风险。洛文杰曾在美国财政部担任关注中国事务的官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经济学家张明预计，短期内，人民币“入篮”将导致对人民币计价资产温

和的、不超过300亿美元的新外需。他表示，在中国国内还远远不能肯定特别提款权地位是否会推动其他结构性改革。

与此同时，中国央行必须为人民币开辟一条路径，既能帮助经济又能避免全球投资者信心流失。8月，中国央行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下调2%，在金融市场引发更猛烈的人民币抛售潮，导致外界担心央行可能采取更多类似行动。

后来，中国央行于11月初在其网站上发布了行长周小川5月的公开讲话，让人误以为这是周小川的最新讲话，在投资者当中引发新一轮混乱。该言论随即登上各大媒体头条，引发香港市场和深圳市场反弹，而后央行才澄清这是周小川半年前的讲话。中国央行已经提高了透明度，特别是在更多地使用社交媒体之后。然而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央行缺乏美联储和其他机构享有的那种独立性，其大多数重要政策决定都必须首先获得领导层的批准。

(Lingling Wei)



移民能拯救老化的亚洲吗？

●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 / 2015.11.29

→ 相比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人口结构更为健康的国家，亚洲的主要经济体中国、日本和韩国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欧洲决定接受数百万新移民，凸显了老龄化的亚洲各国面临的困境，后者正在努力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负担。亚洲决策者是否会跟随欧洲的脚步？

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劳动力人口的不断减少引发了关于中国将“未富先老”的预测。2012年，该国的劳动力人口几十年来首次出现下降，到本世纪中叶，将有三分之一的中国人超过60岁，决策者已被迫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不久前，中国政府宣布，它将正式取消每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尽管被描述为“历史性事件”，但人口专家王锋（音）说，它可能来得太晚了。“它不会对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产生任何影响，但它会改变许多年轻家庭的特征。”

2013年生育政策放宽后，有资



格的人当中只有7%的人申请“二胎”，因为养孩子的成本不断增加。在上海，生育率降至每对夫妇只生育0.7个孩子，不到平均水平的一半，是2.1的人口替换率的三分之一。预计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达到14.1亿的峰值，随后会在2050年下降至13亿，不过人口专家张聚伟（音）认为，劳动力人口直到2030年前依然是“大致稳定”的，可维持“至少10年的中速发展”。

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通过加强对家庭的支持

和福利设施在今后50年使日本人口保持在1亿以上的目标。安倍就此问题召集了一个顾问小组，他说，按目前的出生率，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可能会面临50年内人口从1.27亿降至8000万，100年内降至4000万的情况。尽管有人曾呼吁“移民革命”，但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向新移民开放门户的讨论。2014年，日本收到创纪录的5000份难民申请，但仅接受了11人。

邻近的韩国也面临着人口危机，它是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国家

之一。根据韩国政府201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如果出生率保持在每名妇女1.19个孩子，该国到2750年将会灭绝，如果没有与朝鲜统一或者没有大量移民流入的话。据韩国经济研究所称，为防止衰退，到2060年前该国可能需要多达1500万移民，2014年韩国接受了总共170万移民。

相比之下，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由于拥有年轻劳动力而都将看到“人口红利”带来的好处。预计印度到2020年将取代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到2060年将达到17亿的人口峰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人员对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财政影响发出警告，敦促各国控制医疗支出的增长，提高退休年龄，鼓励更多移民，让更多的女性和老年人加入劳动力大军当中。改革可能会避免人口决策的最坏影响，不过，眼下大量的移民对于老龄化的亚洲来说似乎仍遥不可及。（安东尼·芬瑟姆）

中国超九成艾滋感染者经性传播

● 《纽约时报》/ 2015.11.30

→ 在中国准备纪念世界艾滋病日之际，卫生部门官员和研究人员对高校学生新感染病例增加发出警告。其中大多数是与其他男性发生无保护性行为的青年男性，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说。数据显示，性传播如今已在所有新感染病例中占92%以上，与国际上的情况较为吻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2015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和病人共计57.5万例，死亡17.7万人。性传播是主要的艾滋病病毒传播途径，其中异性性接触传播占66.6%，同性性行为传播已占到27.2%，而母婴传播和药物针具感染的比例较低。年轻人当中艾滋病感染情况尤为值得关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2015年1月至10月，共报告2662例学生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较去年同期增加27.8%。

从1985年至2005年，中国大约30%感染HIV病毒病例是血液交易导致的，这些交易往往得到了地方官员的支持。当时的通行做法是，将不同卖血者的血液混合在一起，从中抽取血浆，然后将血液重新注入卖血者体内——使他们能够更多次、更大量地卖血。以前，在静脉注射毒品时共用针头也是感染的主要途径。

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景军说，国家已有效遏制了这两个问题。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但是，政府在控制普通人的私生活方面似乎不那么有效，通过异性性行为 and 同性性行为而感染HIV的人数迅速增加就是证明。政府需要学会如何使用以教育为手段的软权力改变人们的不安全性行为。”

在通过血液交易、毒品和母婴传播等途径感染的病例大幅下降的同时，性传播却在抬头，尤其是在男同性恋群体中。

中国制造业放缓，焉知非福

• 《金融时报》/ 2015.12.02

→ 中国在上个季度实现了近7%的年化增长率目标，但数字无法告诉我们全貌。中国的经济困境远没有过去。中国官方的制造业活动指数再度大跌，降至2012年以来最低水平。有些投资者预计中国政府为此将推出更多刺激政策，这种可能性在亚洲各地股市引发一波乐观情绪，但刺激性的经济处方或许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中国制造业遭遇了强大的逆风。正与产能过剩问题做斗争的生产商，如今又面对着需求疲弱。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正在加剧通缩压力。

过去35年，制造业一直是中

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力，带动新兴中产阶级崛起的引擎。投资占到总需求的一半，所以投资放缓使政府要实现已经调低的7%增长目标也加倍困难。

北京方面明显倾向于再拿出一个全面刺激计划。今年，中国央行已6次下调官方贷款利率，无疑也将出台进一步的货币宽松政策。这将让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能够继续享受投资盛宴。

此外还传出了采取新一轮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风声。地方当局已采纳了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开支目标，政府正在快速审批建设新房屋和工厂的申请。

财政刺激具有明显的吸引

力。至于这是不是正确的措施就不好说了。眼看着制造业形势糟糕，人们忽视了服务业的悄然崛起，它帮助抵消了其他经济部门下滑的影响。11月，中国服务业PMI指数升至53.6。其他方面的迹象也表明内需正在上升。房地产销售已出现复苏，房地产热时期建造的成千上万的公寓开始入住。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声称要推动经济再平衡，由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向消费拉动。那意味着，增长引擎从制造业切换到服务业。这样的历史性转变在制造业没有相对放缓的情况下几乎是几乎不可能的。北京方面必须着眼

于长期目标。一看到市场有恐慌迹象就赶紧刺激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是错误的。财政政策如果是以鼓励国内消费为目标，那倒也不坏，但是不应发誓建造又一条无果之路，投资应当被引导向清洁能源领域，中国在这个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资金外流之际，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对于抵消中国市场的流动性紧缩可能是必要的。

制造业活动的最新数据令人悲观。不过，中国看似典型周期性下行的放缓，很可能正是人们期待已久的经济再平衡。转型是痛苦的，但每一步都是值得的。



香港凤凰卫视倾力打造 全球华人精品生活杂志

**《凤凰周刊》征订的读者
征阅全年《凤凰周刊》+《凤凰周刊·生活》**

可享受690元优惠，即刻节省90元

单订阅《凤凰周刊·生活》全年240元

用户可免费获得凤凰精美礼品一份!

征订热线：陈先生 0755-25934591

广告热线：张先生 0755-25469762

城市版合作：聂小姐 0755-25934586

征订传真号：0755-25934593

邮局汇款

收款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层

收款人：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邮编：518001

银行汇款

开户名：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帐号：7705 5795 9990

开户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红岭支行

若通过银行汇款，请将汇款收据及您的详细邮寄地址

一起寄回或传真至本刊发行部。

邮寄方式

平邮免费；挂号邮寄每本加收挂号费3元，

半年挂号费18元，全年挂号费36元。

天津兴建全球最大克隆工厂

● 法新社、《南华早报》/ 2015.12.02

→ 日前宣布将在天津兴建全球最大克隆工厂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博雅控股集团说，该公司掌握的先进技术已足以克隆人类，目前只是因为担心公众反应而未展开这方面的工作。博雅控股及其合作伙伴计划在未来七个月内正式投入生产，从事优质工具犬、宠物犬、非人灵长类、优质肉牛、顶级赛马等动物的克隆业务，并在2020年达到每年100万头克隆牛的产量。

博雅控股集团董事长许晓椿说，“该公司已着手提高克隆灵长类动物的能力，以便为疾病研究复制更优质的实验动物。”

由于人类也属于灵长类动物，因此从克隆猴子到克隆人

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不过，这也可能掀起一系列道德及伦理争议。曾在美国制药巨头辉瑞进行药物研发工作的许晓椿说：“有关科技已经存在，如果获得批准，我不认为有其他公司比博雅更有能力（落实）或拥有更好的技术。”他强调，公司现阶段必须“自我约束”，不进行人类克隆工作，主要是担心引起公众的负面反应。

在新加坡，生物医药研究管制法令严禁科研人员克隆胚胎，利用细胞复制的技术来克隆人类。许晓椿以社会对同性恋者的观点为例指出，社会价值观会随时间而改变。他认为，人类的繁殖未来也将拥有更多的选择。

“很不幸的，目前人类生育孩子的唯一途径是一半母亲和一半父亲。或许在未来，你也可选择继承父亲100%的基因，或母亲100%的基因。”

博雅控股的韩国合作伙伴秀岩生命工学研究院负责人黄禹锡曾在10年前声称以克隆技术制造人类胚胎并从中提取干细胞，结果一夜成名。不过，他过后被揭捏造研究，不仅失去大学教授职位，也被控违反生物道德法令和挪用研究经费等多项罪状。黄禹锡曾称，他的研究院计划在中国成立克隆联营公司，“因为韩国的生物道德法令禁止我们使用人类卵子。我们决定在中国设立工厂，以准备未来将（克隆）技术应用在人体上”。

博雅正在天津兴建的克隆工厂预计将建有生物多样性基因资源库，能储存多达500万个液氮冷

冻的细胞样本，为未来重新繁殖濒临绝种动物做好准备。

秀岩目前正着手研究，通过克隆冰封在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带上千年的细胞，让绝种的长毛象起死回生。研究院也以每次10万美元的价格，为顾客克隆过世的宠物狗。目前，许晓椿只想要专心生产能媲美神户牛肉的克隆牛肉。天津克隆厂的项目计划投资2亿元人民币，厂房建设现已基本完成，预计2016年上半年就能正式投产。

不过，不少中国网民质疑食用克隆牛肉的安全，也对工厂就建在今年8月发生严重爆炸意外的化学物仓库所在地附近感到担心。许晓椿回应说：“我们要让公众看到，克隆工作其实并不是那么疯狂，科学家并不是穿着实验室工作服的怪人，躲在密封门后做一些奇怪的研究。”

中外科学家成功研发“蚁人”

● 德新社 / 2015.11.30

→ 最近，漫威漫画的超级英雄“蚁人”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蚁人”只有亚原子般大，能够完成一些不可思议的任务。如今这不再是梦想，在不久的将来，或将出现可以快速提取DNA分子链或复制动物的微型机器人，因为中国和加拿大科学家最近成功合作研发出一台工业机器人，其手臂能够拿起长度仅以纳米为标准的物体，为世界首个此类机器人。目前，部分此类工作在显微镜辅助之下也能够以人手进行，但过程费时，也需要很多人力，而且失败率极高。

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孙钰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表示，他们与中国社科院及哈尔滨工业大学

合作，在这个领域取得了突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孙钰的研究团队展示了一个由所谓“纳米操纵系统”控制的商用机器人。这个机器人由黑龙江的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生产，造

价超过600万元。其体积约相当于一个中型比萨。

研究人员说，这个领域的研究遇到的其中一难题是：由于机械手臂体积极小，且需要进行细微动作，所以找不到能够驱动机械手臂的马达。后来研究人员把机器人手臂连接到一个名为“压电马达”的特制马达，解决了问题。他们所采用的

压电陶瓷材料，插电时能够收缩或扩张。

不过，在使用传感器时却遇到更大的问题。传感器的敏感度必须很高，才足以在误差幅度少于1纳米的情况下辨别机器人手臂的确切位置。这一问题使纳米机器人技术无法在商业领域使用，但在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周超博士的努力之下，这个问题似乎已得到解决。

周超的灵感来自体重秤。“这个难题的解决方法可能就摆在你眼前，只是因为人们觉得它太普通，所以忽略了。”周超说，中国科学家发明了许多东西，但都无人理会，因为人们认为这些发明没有多大用途，不值得投资开发。但这个情况近几年出现变化，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要在国际高端产品市场上与西方企业竞争，务求与对手平起平坐。



经济上的“奇点” 即将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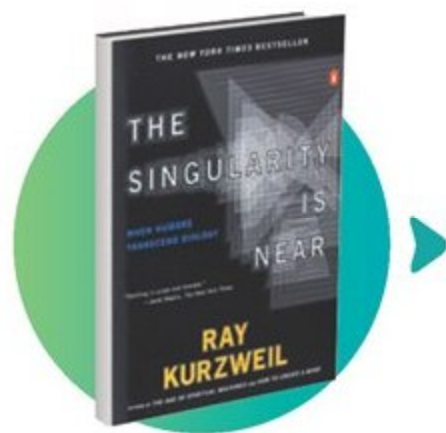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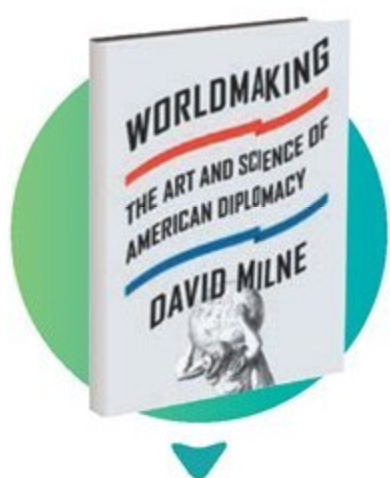
•《金融时报》/2015.12.01

→ 我们正接近经济史上的戏剧性一幕吗？在人类发展农业以前，全球人口大约每25万年增长一倍。而在人类获得农业生产的力量之后，全球经济规模大约每900年增长一倍。工业革命之后，全球经济增长再次加速。而自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大约每15年增长一倍。上述数据是基于多位经济史学家给出的有历史依据的估计。

如果再发生类似程度的阶跃式变革，全球经济或许会从现在到圣诞节这段时间里增长一倍。这一点虽然很难想象，但在工业革命发生前，一切也很难想象。这一场景的少数不乏想象力的信徒，期冀出现一种经济上的“奇点”。计算机科学家、《奇点临近》一书的作者雷·库兹韦尔也许是他们中最有名的一位。

“奇点”是这样一个时间点，即不再是由人类开发新技术，而是新技术本身会开发新技术。它们会以一种远超我们想象的速度开发新技术。在“奇点”之后，我们的文明会被置于半机械人、或上传到云端的大脑、或基因强化的超级生物、或别的什么能极快提升自身智力的东西控制之下。未来的经济可能由人工智能之间的快速互动组成。全球经济每过几周就可能增长一倍的想法，不再看上去那么不可想象了。

不过，想象这样的未来是一回事，相信这样的未来正在到来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奇点”正在来临，人们可以预计的是，投资品会变得非常廉价并决定着经济产出。（蒂姆·哈福德）



美国外交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华盛顿邮报》网站/2015.11.26

→ 有些书人们会去读，而有些书让人崇拜，这两类书未必有交集。

戴维·米尔恩撰写的《构建世界——美国外交的艺术与科学》一书似乎注定是让人景仰多过让人阅读的。仅仅是这本书的主题似乎就会让读者充满敬意却目光呆滞地陷入沉默。如果说书中探讨的话题从学术角度讲让人高山仰止，那么书本身则更是如此。

我们直接从1949年讲起，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团队负责人乔治·凯南和他的副手保罗·尼采正在努力为哈里·杜鲁门总统提出一项关键的政策建议：鉴于有迹象显示，苏联人在1949年底试验了一件原子武器，美国是否应该努力研发一枚氢弹呢？对凯南而言，决定美国是否应该研发热核弹这一问题不能仅仅简化为一个战略问题；它是一个道义问题，具有近乎神学意义上的重要性。最终，凯南精心撰写了一篇79页长的论文，对历史和哲学旁征博引，奉劝总统“不要制造这件吓人的武器”。依凯南之见，解决

办法是号召所有国家拒绝接受热核武器并把核研究的控制权交给一家国际组织。

凯南的门生尼采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件事简单极了：苏联人肯定会在试验原子弹后就打住，因此美国也不能就此打住。冷战的冷静逻辑要求开展一场军备竞赛；和平只能通过人们日后所说的“互有把握摧毁对方”思想得到最佳保障。

接下来还有马汉上将，对于那些把他夸张地描绘成拥护美帝国主义的狂热爱国者的人而言，常常会忽视马汉曾怀疑美国是否有能力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此外还有奥巴马，右翼批评家狠批他的被动和犹豫不决，左翼批评家却谴责他对恐怖主义采取的无情和置对方于死地的态度。

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艺术家以马汉、凯南、沃尔特·李普曼、基辛格以及奥巴马为代表。他们看待世界时带有一种“悲剧感和警惕性”，此外还有种“不愿背离实际看到的历史先例的心理”。他

们把抽象的推理视作蛮干，把直觉与谦恭视为一个不确定和不可预测世界中的唯一试金石。与此同时，以伍德罗·威尔逊、尼采和沃尔福威茨为代表的科学家则认为，他们不但可以搞清历史的模式，而且可以超越这些模式。他们认为世界是可塑的，是能够通过联合运用美国的实力和美国的道德操守来进行重塑的。

但这种艺术/科学二元论和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二元论一样容易招致批评。按照米尔恩的思路，相信美国的道德设想可以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想法无疑是一位科学家的想法，而不是一位艺术家的想法。

许多读者也会在米尔恩对高级外交政策学者的选择问题上挑刺。比如，他的名单中连一名女性都没有，而且他还说，珍妮·柯克帕特里克、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和康多莉扎·赖斯等女性“作出的贡献”目前还无法在“吸引力与经久性方面与马汉、基辛格以及沃尔福威茨相比”。

（罗莎·布鲁克斯）

中国轰炸机演习 展示穿透第二岛链能力

• 《简氏防务周刊》/ 2015.11.30

→ 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举行了一次不寻常的大规模编队演习，8架得到侦察监视和电子情报飞机支持的轰-6K轰炸机于11月27日在中国东海上空演习，并飞入第二岛链水域进行了长距离飞行。中国官媒引用空军发言人说法称，这次演习是为了维护2013年12月划设的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

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起飞的飞机拍摄的照片显示，其中一个轰-6K编队是属于中国空军第10师28团的飞机，该部队驻扎在上海以西450公里的安庆。

两个飞行编队中的一个一直停留在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内。但这两个编队在冲绳以西海域解散编组，此后一个4机编队在一架空警-200早期预警机的支持下穿越了琉球群岛，通过宫古岛附近的宫古海峡。空军发言人称，这个编队深入第二岛链飞行了1000公里。这一队轰-6K飞机还得到了两架中国电子侦察机支持：一架改装的图-154MD和一架运-8CB侦察机，其中后者也



具备电子对抗能力。

轰-6K轰炸机于2011年服役，该机采用两台俄罗斯D-30-KP2涡轮风扇发动机，作战半径不低于3500公里。该机可在机翼下挂载6枚射程2000公里的DF-10空射型巡航导弹，也可携带射程250-400公里、飞行速度达到4马赫的YJ-12冲压动力反舰导弹。大陆军事评论员认为，所谓“第二岛链”是美国方面提出的一个围堵中国的概念。美国将北到日本、南到菲律宾的一系列基地和美国

盟友当做围堵中国海空军的“第一岛链”，在中国具备摧毁“第一岛链”各主要基地能力后，美国又将“第一岛链”以东的海域称为“第二岛链”，然而这里并没有一条真正的“岛链”，美国目前所说的“第二岛链”唯一的核基地就是位于太平洋上的关岛。关岛距离中国约4000公里。因此轰-6K这次飞行被认为是展示了使用射程2000公里的空地-20巡航导弹攻击关岛的能力。

事实上，中国摧毁关岛基地

的手段远不止轰炸机一种，中国此前在东南地区部署东风-4核导弹，其主要目标就包括关岛。而现在这些老式导弹已被东风-26导弹替换，这种射程超过4000公里的导弹既可携带核弹头也可携带常规弹头。此外，中国新一代核潜艇093A等都装备有巡航导弹垂直发射装置，而052D驱逐舰的垂直发射装置也可发射YJ-18巡航导弹的对陆攻击型，这些水面、水下舰艇在进入西太平洋海域后也可以打击关岛。

日本计划在钓鱼岛附近部署军队

• 德国之声 / 2015.11.28

→ 为了应对紧张局势，日本正计划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部署自卫队，规模约500人，并配署防空导弹以及反舰导弹系统。2019年完成部署后，驻军将能够针对突发情况作出快速反应。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副大臣若宫健嗣11月26日与冲绳

县石垣市市长进行了会晤，并介绍了部署军队的方案。石垣岛距离日中争议岛屿仅有170公里左右。英文出版的《日本时报》称，日本政府的这一计划是为了应对中国舰艇愈发频繁地进入东海争议岛礁海域。就在11月30日，三艘中国海监船进入了该海域。日方表示，这是今年中国舰只第

32次“侵入日本海域”。

11月27日，几架包括轰炸机在内的中国军机飞到了冲绳附近的空域。日本方面派出了F-15战机应对。而在10月，日本政府发布消息称，今年4月以来，日本战机已经紧急出动231次拦截中国飞机。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政府尚未正式公布的驻军计划便可以理解为对中国的反应。同时，日本还将在宫古岛以及奄美大岛上增加驻军数量，以提升这一

地区的兵力。不过，日本并不计划在争议岛礁上直接驻军，以避免激怒中国、增加地区局势的紧张程度。日本天普大学亚洲研究所主任金斯顿表示，日本重新部署其军力是应对中国崛起的直接反应。

在安倍晋三出任首相后，日本的这一进程明显加快。金斯顿说：“安倍坚信日本需要作出更多贡献。而这也是美国对其盟友的期望。”

□ 编辑 漆菲 □ 美编 青年

2015大军改启幕

此次军改是中共建政以来军队系统最大的一次深刻变革，其意义不亚于“1980年代初地方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改变”，其更深远的影响可能需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得清楚。

记者/钟坚





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2015年11月24日至26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1月24至26日，北京天寒地冻，京西宾馆，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在此召开。200余名军地高级领导干部悉数正装出席，闭门会议连开三天，这是继上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后的又一次高规格的重要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就军改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军队深改组副组长范长龙就落实阶段性改革任务提出要求，常务副组长许其亮就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总体方案作了说明。

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12月1日发表评论称，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整体性革命性改革全面展开”，并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变动最大的一次，是一次结构性、革命性的体系重塑，改革推动力度之大、触及利益之深、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这是中国60年来最大一次军事改革”，彭博社称这“将使中国军力辐射到海外”。

北京军情观察人士称，中国军队从1955年左右正式确立了苏式建制模式，此后60余年基本不变，此次军改是中共建政以来军队系统最大的一次深刻变革，其意义不亚于“1980年代初地方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改变”，也是以往若干次部队精简整编或者编制体制改革所不能比拟的，包括1985年邓小平主导的百万大裁军那次。此次变革更深远的影响可能需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得更清楚。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如果顺利实行，中国这次军改将动及筋骨，其路径也十分清晰，就是习近平要将解放军的前

苏联式组织架构，转型为美国式的精锐作战部队架构，同时扭转党对军队的管理属“无牙老虎”的现实。

军改方案目前尚未公开，但从官方措辞评论和谈及军改的只言片语中，已可见军改不少端倪。多位不愿具名的军方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军改方案估计春节前后或将公开，而军委、总部至战区、军兵种的人员调整、机构部署已初步到位，合并组合后的新军事机构亦可能在节前挂牌。

多个消息来源显示，中共军队主要智库中国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亦在此番调整重组之列。国防大学一位专家称，从某种程度上讲，改革是一场不流血的战役，而中共主导的这场战役已经悄然展开了。

军委“扩权强军”

军队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作战思想和管理方式的转型。一些西方国家认为，和平时期军队大量经常性的工作是对部队进行教育训练和行政管理，如果把这些日常工作与执行军事任务搅在一起，指挥机构就必然陷于事务，也很难做到精干、高效。这就需要实行军政与军令系统分离。

欧美诸军早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便推行实施军政、军令也即作战和行政分离的体制，这套体制从最高统帅层到战区再到各军兵种，三级闭环运行，精干、高效。由于实行军令与军政相分离的体制，各级指挥机构得以摆脱庞杂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专门负责对军队的作战指挥，保证了指挥机构的效率。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军队，都在积极仿效欧美诸军，进行了类似的领导指挥体制改革。

中共军队也不例外。中央军委改革会议上，军队深改组组长习近平提及的“构

建军委—战区—部队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也即上述军令、军政分离的体系。接受官媒采访的北京军事专家赵小卓称，“把战和建分开，养兵和用兵适度分离，符合现代军队发展的规律。”

这套业已被世界各国军队证明为先进的军事管理体制，其核心是最高军事管理层的高度集权，“权力要适当集中，出于应对突作战需要。”赵小卓如是表示。

加拿大军事期刊《汉和防务评论》总编辑平可夫认为：“改革的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减少中间环节，使它（解放军）向扁平化发展。俄军和美军一直是这么走过来的。”

中共军队最高军事机关是中央军委，国务院层面的军事工作机关是国防部。但长期以来，“军委名义上是权力机关，实际上不是，军队的重要权限如军事决策、参谋、干部任免、作战训练、后勤保障等这些，跟军委办公厅或国防部没有太大关系。”有北京军情分析人士表示，军委办公厅实际上是领导机构的秘书班子或调研性班子，日常起草文件、书写领导讲话。军委办公厅下面有若干个局，如秘书局、法制局、调研局等，这些局有的是师级单位，也有副军级单位。军委办公厅日常干的活，按一位军事专家说法“好像一个什么都干的全能人物”。而国防部更不像俄军或美军那样是个实体机构，仅下隶外事局和新闻事务局，寥寥数十人。

从中共军队领导管理体制上看，经过多次调整改革，目前形成了中央军委集中领导，参政后装四总部归口管理，七大军区、四个军兵种按照职能分工的组织构架和体制设计，但随着战争形态更新迭代，这种领导管理体制上的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具体表现在：统帅层战略管理功能不



强，四总部平行设置，致使职能机构运行效率不高、决策质量不高、统筹力度不够，特别是涉及军队建设发展全局的重大事务难以有效统起来。

统帅层中央军委过于弱化，而军委下属的总参、总政、总后和总装四总部，“权力过于集中，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领导层级，代行了军委许多职能，客观上影响了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军事专家尹卓此前对媒体

表示。而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军事专家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原中央军委权力被四总部代行分割，或者说架空了，军委实权都在四总部那里。

大陆官媒称，这次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一系列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军委主

席负责制，真正使军队的最高领导权、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确保军队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主席习近平指挥。

从官方辞令上不难理解，这次军改首当其冲应是强化军委机关。按北京军事专家的说法，经过此番军改，中共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后，军委机关由“总部制”调整为“多部制”，原来权力高度集中的“总部



领导机关”，变成权力互相有所制约的“军委办事机关”。

军委办公厅主任原是正军级，这几年军委办公厅升格副大区级，现任军委办公厅主任为秦生祥中将。但按上述军改方案，多部制后的军委办公机构显然不止大区副级别，权限还将大大扩大。

军改方案具体内容暂未公开，从中央军委改革会议的口径看，军委“多部制”具体

有哪些部门也未闻其详，但从官方已经公布的几个组织机构看，一些新设机构都将归入军委旗下，如新组建的军委纪委和军委政法委，以及调整组建的军委审计署等。

军委纪委原本是总政治部旗下的机构，一个正军级部门，纪检部长一般为军纪委会副书记。军纪委书记为大区正职，一般由现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同时为中纪委副书记。而解放军审计署从总后分离后升格

为正军级单位，现在隶属军委直管。至于军委“多部制”后的其他几个部，依循俄美军队执行此体制的权限划分和归类，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新组建的陆军部，可能分别会成为军委属下的几个大部。

从现有各大部的名头来看，军委旗下的“多部制”每个独立部门的级别估计不会低于大军区正职或副职，解放军审计署或再次升格，和新任军委政法委一起晋升为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既是一场体系性、结构性、
突破性转型重塑，
也是一次利益的大调整，
必然会深刻触及现存利益
结构和利益关系。**

◀ 2014年7月30日，习近平在福建，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和双拥模范代表，致以节日的祝贺，并强调要提高实战化水平。

大区正职或副职。军委纪委则从总政治部正式独立出来，行使反腐监督职能。

军委扩军强权由此坐实。然而新军委机关各部门独立的权限也不是平地空降而至，而是从原有四总部及其他军兵种“抽丝剥茧”整合而来，如总政治部原有组织、宣传、文化、干部等几大部门，每个部门都属正军级的二级部。但编制改变后的军纪委、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相继从总政拆解出来独立成部，都升格了。

现行的四总部体制是根据当时形势需要建立的，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四总部出现“体制的滞后性、局限性日益突出”的现象。军委扩权后，将从四总部、战区和军兵种，收回军种指挥权，“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四总部从名称到职权划分都将不复往日模样。

而军事专家尹卓更表示，在军委多部门制后，这些部门成为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参谋机构、执行机构、服务机构，确保部队在执行命令时步调一致、政令畅通。

这意味着运行多年的四总部的机构名称将消失，各部门职能在合并同类项后分别转入新的组织机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或将成为历史，淡出人们视野。

“先搬掉‘大陆军’这块石头”

军委机关的“扩权强军”，四总部的拆分，还只是领导管理体制的“革命性重塑”，军改绕不开的另一个重塑任务是联合作战指挥，改革的具体目标指向“大陆军体制”。

世界各国军队对体制编制是否科学、先进的评判标准中，联合作战指挥始终是一个公认的风向标。联合作战指挥是军种分类和联合作战的产物。20世纪初期，英美

法国军队就开始了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尝试。1923年，英国正式组建专门用于协调军中作战行动的参谋长委员会，之后美法等国相继成立参谋长联席会议、三军联合参谋部等机构。经过近百年的完善，西方主要国家的军队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大放魅力最近显著的一例，就是2011年5月2日美军击毙恐怖组织“基地”头子本·拉登那一幕。2013年，美国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写了《艰难一日》一书，对一些作战的细节进行了披露。在美军最高领导层白宫的一块大屏幕前，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等人，观看现场直播24名海豹突击队员执行突击任务。在美军海豹突击队遂行特种作战任务的背后，是美国诸战区司令部、军兵种的各種信息、侦察、电磁、干扰等力量的合力。

作为一种新型指挥模式，联合作战指挥成为军队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纵观近期世界各大国的军队改革，无一例外地都把强化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核心要求，而且要求联合指挥的中心更下沉、范围更扩大、任务更拓展，无论成本多高、代价多大、周期多长，都始终坚持联合这个基本方向。

这些年，中共军队在建立健全联合作战体制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还没有完全形成，统帅层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还不完善，战区层面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还没有建立，遇事靠临时建机构、搭班子。比如20世纪进行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即是由中央军委临时成立的“领导小组”统一指挥的，还有“1996年三军联合演习”，也是如此。

这样的指挥体制的症结在于：总参谋部职责定位本应是统帅部层面负责作战指

中共军队体系中，陆军一直唱主角，海、空军和二炮等常是配角。本次军改后，这一状况或将被改变。

挥的机关，但因为军队领导管理体制，特别是陆军管理事务极大分散了总参的主要精力，致使指挥权分散，平战分离。

陆军也始终无法以一个独立军种的身份进入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一些新型作战力量分散在各个系统，管理分散、多头指挥，使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始终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陆军的建设管理职能也分散在总部和大军区，导致陆军建设缺乏整体性、协同性和系统性，与统帅部的职能交叉过多，导致本军种建设的自主性、前瞻性不够。

现有以陆军为主导的大军区职能庞杂，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既要担负区内军事行政、陆军部队管理建设等职能，又要担负联合作战指挥职能。战区一级联合作战能力与国外军队相比，差距巨大，“如同雾里看花，看着很近，似乎能摸得着，其实很远，完全够不到。”北京一位军事专家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联合作战体制无法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本原因，在于军队的大陆军症结。

中共建政以来，从生存困难到安身立命，陆战的战争经历和辉煌历史使中国军队形成了陆战型为主的军事力量结构。这种军事力量结构适应了当时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需要，完成了打赢战争、夺取政权的目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国土防御型为特点的大陆军主导的架构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现代战争需要。

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欧建平少将称，近几轮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虽然加大了兵种合成的力度，如军种领导进军委、总部机关调入人员不再统一要求穿陆军军装、各战区编入战区空军等，但军事力量体系中陆军主导成分的苏式建制仍然很浓，军事组织形态始终未能摆脱传统的陆战型结构。

过了这么多年，中共军队中，陆军还是老大哥，虽然名义上比过去淡化了一些，海、空军和二炮等军事力量在整个军队体系中仍是配角。从各军种比例来看，现在陆军机动部队有85万人，占整个军兵种相当大的比例，如果把非机动作战部队加上，陆军的比例会更高。根据2013年4月16日发表的《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首次披露陆军机动作战部队和海、空军人数。海军现有23.5万人，空军现有39.8万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大陆还保留了相当大规模的武警，这种力量虽然不在作战体系内，但也和地方预备役部队一样，属于准军事力量。

陆军主导的时代，军队日常管理训练纵向指挥层次多、效率低，横向条块分割、协调难。平时严重制约战斗力生成，战时不可避免地出现打乱仗现象。从军队编成状况看，一方面230万人的总体规模仍然偏大，另一方面一线部队兵力不足。

一位军中人士透露，1998年抗洪、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等行动中，就出现了无兵可调的局面。“为什么有这么大规模的军队，还会出现无兵可调的窘境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保障服务和非作战力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该人士称，陆军领导机构的长期缺失，是军队管理领导体制诸多矛盾的焦点和瓶颈，也是全军管理体制改革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的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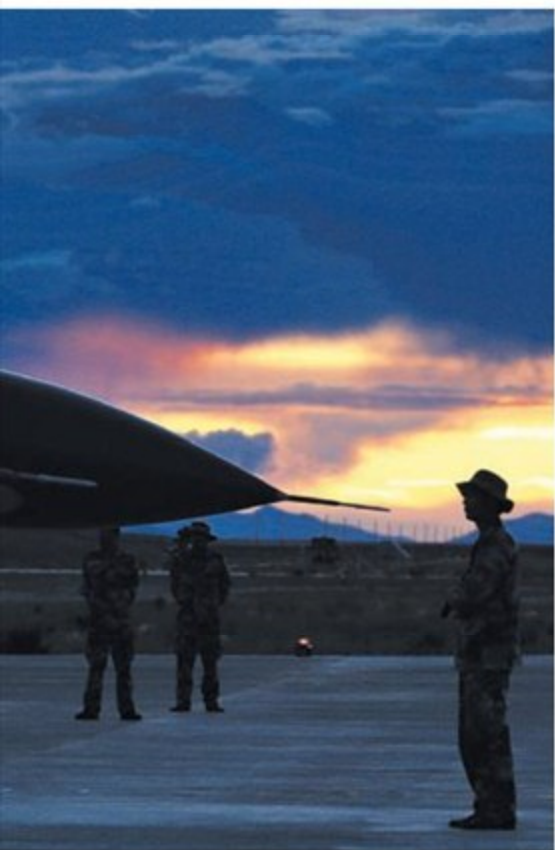
大陆军和陆军主导的大军区领导体制，已成为联合作战的主要体制性障碍，军队力主改革者更是一直把“大陆军体制”视为军队建设发展道路上的一块大石头，却无可奈何。“这次一定要搬掉大陆军这块石头了！”

北京有军事专家表示，陆军的这些现状说明，解决陆军过大的障碍，绝不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质量问



题。必须下决心从中国国情和安全需求实际出发，把陆军建设放在现代军事力量整个体系之中，对陆军实施全面重塑。

从这次军改的官方表述来看，“对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进行一体设计，组建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目前陆军独立成军或已成事实。据多家海外信息源推



测，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作成将担任新成立的陆军部主官。按军令分开的体制来看，重塑不仅是分离重建一个陆军部，统帅层面原有陆军色彩浓厚的总参谋部，也或将改组成类似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样的总联合作战指挥部，专司协调指挥各军兵种、战区作战打仗等职责。

军方近期文章也以俄罗斯为例，阐述

陆军特征很明显的大军区体制，将如俄军一样在改革之列。中共军队的七大军区将按国家战略方向和军事意图，重新排列组合。联合作战体系建立后，按战区作战方向划分的海、空军力量将会大大增加。

俄罗斯2008年开始大刀阔斧推进“新面孔”军事改革，将原先以陆军为主体的六大军区，合并组建成东、西、中、南新四大军

区，统一指挥辖区内陆、海、空三军部队，建立起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联战联训指挥体制。

改革主要是动“脖子以上”

军委扩权强军、四大总部分拆、组建陆军管理机构、重新调整划设战区……2015年启幕的中共军队军改，注定充满了悲壮和浓

烈的改革色彩。军改方案虽然暂时并未公开,仅从这些平静而简约的军方表述文字上看,一般读者似乎不太明白其所以然,不过但凡了解一些军队架构常识的人或许早已明白:一派外表平静和谐的中共军队内里,或许早已波澜壮阔、巨浪滔天了。

军方转述官媒文章称,这场被称为“史上最牛”军改的特异之处,在于直指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实现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的有机统一,让军队的“中枢神经”更加高效灵敏。

不过,该文章也称,改革不像“剪指甲”那样无关痛痒,必然会触动许多人的切身利益。单位撤并降改,部队转隶换防,一些军人将脱下军装,有的面临再次择业、家属安置、孩子入学等实际困难。对改革中的失利者,该文晓以大义,“若以小利计,何必披征衣”。

军方《人民前线报》微信公众号11月30日发表《谁将在军队改革中经受利益考验?》一文指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既是一场体系性、结构性、突破性转型重塑,也是一次利益的大调整,必然会深刻触及现存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触及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能不能经受住改革利益的考验,检验着许多人的党性、操守和觉悟。谁将在这次大变革中经受利益考验?这个问号已实实在在摆在军人面前。

该微信公众号称,军改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军队的领导干部。“从披露的方案看,这次改革主要是动‘脖子以上’,动首脑机关。无论是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还是重新调整划设战区,动的主要是高级领导机关,影响的主要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可以肯定,这轮改革后,机关领导干部

的调整面将非常大,许多师以上干部可能不仅个人进步受阻,甚至会成了编余或过早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北京军情分析人士称,以军政和军令也即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为主线的这次军队变革,的确是自上而下,从军委机关到四总部、七大军区、军兵种领导机关开始“下刀”,逐步延至省军区以下部队行政机关,几乎全部触动,无一幸免;新旧官衔叠现,各种职位纷纷易面。

《解放军报》12月1日以《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是强军兴军的必然选择》为题,发表评论称,长期以来,我军“头重脚轻尾巴长”的突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机关臃肿、机构重叠、层级太多、直属单位庞杂等问题表现突出,严重制约影响部队领导管理效率和联合作战行动的高效指挥。

有军事专家此前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中共军队目前是生活型的体制结构,从官兵比例结构看,官兵比例目前是1比1.47。官多兵少,也是军队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打仗要靠一线士兵,养那么多干部,不仅加重了养兵的负担,打起仗来还会出现缺兵的现象。

发达国家军队十分重视保持合理的官兵比例,美国是1比4.28,日本是1比4.12,英国是1比3.66,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官兵比例已经达到了1比18.33。习近平曾就此深刻地指出:“军队是要打仗的”。

即便是此番担任军改论证主力的军方智囊团体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这两所高级军事智库内部也是将军林立,乌纱遍地。过去国防大学有一句俚语形容这所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一大怪,将军和士兵抢咸菜”,意思是将军过多。这两所大军区正级编制的单位中,随便在大院里碰到一个衣着朴素行色匆匆的老者,都可能

是将军。据不完全统计,退休的加上现职,国防大学和军事科学院就有少将以上数百人。更遑论军委、各大总部机关和军区、军兵种。

按中共军队的编制和职级排序,军委以下,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四总部称为一级部,都是高于大军区正级的单位;另还有七大军区、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大军区正级的单位,共有11个。一级部以下是各种二级部,如总政的干部部、宣传部,总参的军训部、信息化部之类,这些二级部长们都属正军级。七大军区也有各种二级部,这种二级部一般为正师级。

四总部内部也稍有差异,总参的副总长和总政的副主任,都是大军区正职,而总后、总装的副部长则一般为大军区副职,总后和总装还编列配备了大军区正职级别的政委。

这次军改整合收权,指向明确无误,就是动这些“脖子以上”的人,大批中将、少将等高级军官将挪位转岗,甚至有的可能将黯然退役。

按国外军队现行体制推测,军改的最理想结果是,中共军队将形成军令作战指挥线及军政军队管理建设线,军委作战训练(通过类似参联会指挥机构)一战区一部队;军委日常行政管理一军兵种一部队,两条线顺畅运行,形成一个崭新的军队组织形态体系。

署名为“吴铭”的军报这篇评论员文章还透露,“这次改革,坚决贯彻精简高效的原则。特别是军委机关带头精简,局以上减少一个领导层级,普遍降低机构等级,大量压缩机构数量和人员编制员额,大幅度减少直属单位,在解决‘头重脚轻尾巴长’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为全军调整改革带了好头。”



Biemlfolk
比音勒芬

中国国家高尔夫球队指定品牌

公司官网: www.biemlf.com 全国服务热线: 400-113-2228



关注比音勒芬官方微信

从官方的文字表述来看,悄然推进的军改已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包括总部机关和各大军区、军兵种在内的一级部和大区正单位,及底下大批二级部可能已列入或纳编或合并或撤编。国外军队军改前一般先颁布法令再推行,但中共军队并无此惯例和传统,按中共军队令行禁止的向来做法分析,眼下进行的军改可能推进迅疾,一些变革中涉及的机构部门估计都已早有规划和安排了。

比如长期被诟病的军队总部机关一直都有庞大的保障后勤生活部门和为这些非战斗编制服务的部门,如总政的直工部等类似部门,军改后,这些功能重叠的部门估计都将重新组合。而总参的军训部、信息化部等料将职能下放至重新划分的各大战区。向来神秘的总政联络部和总参情报部等按既定的改革思路,估计也有合并同类项的可能,其部分职能或许下放战区或军兵种,也未可知。

军队的“庙”已经拆掉很多了

军改后的军委大部制下,部门更加精干,权力划分精细,实际上以“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两条线运转。这套军政、军令分线管理体系革新了沿袭60余年的军队内部管理体系。按新的体制编制要求,军队官场的官衔、职级要重新编配。

目前来看,军委、总部机关、各大军区、军兵种的“瘦身”基调是一致的,比如过去四总部一把手都是军委委员,相当于地方副国级官员。但军改后这些部门变成军委的一份子了,四总部的职能做了分离、合并和调整。

谜底何时揭开,大陆民间有各种版本,在军改方案未公开前,这些版本都不足为据。但有些已成共识,如关于七大军区裁撤

这次军改 虽然主刀“脖子以上”, 但因涉及到军队利益机构和 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 “改革之痛不可避免”。

重组,推行数十年的七大军区战场布防或将按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意图重新划分,有不少说法认为是划分为东西南北四大战区。原七大军区,14名司令、政委都是上将或中将,皆为大区正职。如果传闻属实,这些相当于省部级的将军们也将重新排列组合。

裁撤部门、降低职级、合并重组,这类词汇在这次军改中将频密出现。透过已公布的官方文件,军改后,这些已改变的总部机关生态依稀可以想见,“用人心波动并不为过”。北京军情分析人士形象比喻:军队很多“庙”拆了,而且“庙”拆得太多。过去庙里的“方丈”已找不到了,至于下面的“游僧”嘛,不少都在等分配、等消息。

担任四总部一把手的军委委员们,这次大军改过程中的重要担当者,角色最为吃重,任务更为艰巨繁复。从编制到体制,从组织到人事,从军内到军外,他们责无旁贷,既是无数棘手矛盾的操刀者,也是问题怨怼的责任人。仅就国防大学和军事科学院而言,机构和职能重叠,传闻合并已有数年,此次军改估计难以幸免。国防大学的校长和政委、军科的院长和政委都是大区正级,他们以下还有若干个中将级别的常务副校长、校长、副政委,再以下还有各大教研部、军事战略研究部等头头脑脑,起码也是正军少将级别。

如这两大单位合并重组,这几百个少将、中将恐怕有不少无合适官位可放;再说原七大军区14个大区正的司令、政委以下,也有为

数众多的大区副的副政委、副司令员,还有各大高校的院长、政委,这些军内的高官们,随着这轮军事改革的调整,不少人的命运或者去向或都已清楚,或并不清楚。有分析认为,保留原有的级别和待遇,等到任职届满后,再行退役亦是一种不错的安排。

七大军区以下18个集团军、31个省军区,将军云集。特别是省军区,在过去军队内部被视为仕途即将到点的最佳养老去处。虽然省军区、军分区、地方人武部不事一线作战任务,但工作生活稳定,家属子女工作入学条件优厚。若军改涉及军、师和地方部队一级,庞大的军、师级军官将面临转岗或退役。

这次中央军委改革会议的不同之处,不仅全军重要将领悉数出席,还有国务院相关各大部委要员参与,不过从历次军改来看,军改都需要取得地方的支持才能顺利推进。如“百万大裁军”那年,十余万军队干部被裁撤向后转,都无一例外地需要地方消化。

作为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在当天的会议上也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大局观念,把支持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当作份内的事,拿出一些特殊措施和倾斜政策,主动帮助解决好退役军人、职工安置工作,“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共同落实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各项任务”。

大调整时期,官场也一定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在新的编制单位确立后,一些过去十几年历经各种考验、治军清廉,又与腐败势力无任何瓜葛的高级干部,现在可能会调整到重要岗位。懂军事、会管理的军队新人亦可能会担任新职。按一位军队专家的说法,这次编制体制改革调整的原则是“一切按照打仗的标准”。

北京有军事专家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军队经过系列大刀阔斧的反腐举措,两个原军委副主席、数十名高级将领因涉腐落马,因为涉及军队形象和保密需要,有一些将军的腐败劣迹目前还没有被发掘出来,军队与这些贪腐分子有若即若离关系的人也并非个例,此番军改人事调整,恰好也可剔除腐骨。

习近平在11月下旬的中央军委改革会议上表示,要着眼于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区分和配置权力,重点解决军队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监督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的问题,以编密扎紧制度的笼子,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改革料会稳定过渡

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作为这次军改的总动员人习近平强调:全军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坚决打赢改革这场攻坚战,努力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官媒称,这是习主席对全军官兵发出的政治号令,也是全军官兵必须承担的时代重任。

这次军改的军方主要宣传阵地,《解放军报》从11月底开始连发六篇评论员文章,六论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有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军改虽然主刀“脖子以上”,但因涉及到军队利益机构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改革之痛不可避免”。

军报二论军改评论员文章称,“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血的历史教训启示我们:早改者早强,大改者大强,不改者必亡!”改革的“窗口期”稍纵即逝,

抓住了就能乘势而上,抓不住就可能错过整整一个时代,而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百舸争流,千帆竞渡。每名官兵都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投身改革,参与改革,赶上潮流、赶上时代。

“和平时期的改革,领导干部如果只讲‘给我上’,自己当缩头乌龟,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改革的问题上,应当像打仗一样,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一定以上率下,当好模范。”国防大学欧建平少将曾撰文表示,改革的决心意志和雄心魄力要体现在敢于搬大石头上,如果只是什么容易改什么,什么好改改什么,做边边角角的事,搞皮皮毛毛的事,改革将一事无成。

这名熟悉中共军队建设的少将称,在我军建设中,存在一些制约战斗力生成和提高的大石头,这些大石头是制约我军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是阻碍我军改革的拦路虎。比如构建联合作战和训练体制、军队领导管理体制、陆军建设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保障体制、军官职业化体制、改革大军区体制等,已经到了绕不开躲不过的地步。

“一切以战斗力为唯一标准,该让权的让权,该让利的让利,该担当的担当,决不能因局部利益、部门偏见、个人顾忌使改革停滞不前,各部门各军兵种只有勇于牺牲小我,才能成就军队改革的大业。”

1985年邓小平指挥百万大裁军时,邓环顾四周向将领问计,“怎么个减法?请大家出主意,”见将军们无语,邓随即说道,“我只讲三总部带头!”那年的整编方案,就是把精简三总部作为首要原则列出来的,邓的这个做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作为军改主导者的习近平,也表现出了作为政治家的足够担当和勇气、对军队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政治魄力以及战略眼光。习近平掌军后,深刻意识到军队改革不能

再拖了,再拖下去会越来越严重。此前习也多次表示,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看准了的改革项目,要果断决策、加紧实施,时间拖长了,影响改革效果,也影响部队稳定。”

北京有军情分析人士称,未经证实的数字表明,此番军改高级军官人事调整幅度估计会超过1985年百万大裁军那次。“脖子以上”改革完毕后,“脖子以下”的部位也即军队基层部队也将展开裁撤合并,陆续裁军30万,军队总员额保持在200万之内。军改组将这次军改的时间表最后截定期定在2020年,要在这一年年末前,使军队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共历来讲究社会稳定,特别是军队的稳定更是压倒一切。军委、总部机关虽然此次有了革命性的变革,但也有新设的部门机构,这给调整后为数众多的高级将领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军中的活儿总得有人干,因此大区正职以上大多数人会安排合适的位置,”分析人士认为,军改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大区副职和大量的军、师级军官,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作出“牺牲”。

从军改时间表跨度来看,跨越中央十八大、十九大两个时期,“前二后三”。中央层面决心即下,这场中共主导下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军改大幕迅疾启动,各方目前也按设置程序、规则同步推进。

军报评论员文章称,改革不是改向,变革不是变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军特点和优势,规定了改革的性质和方向。无论怎么改,我军的基本军事制度、根本性质宗旨和优良传统作风,绝对不能变。在这些根本政治原则问题上,绝对不允许出现颠覆性错误。●



2015国防和军队改革图解

★ 改革总目标

2020年前要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改革上取得重要成果。
努力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

★ 执政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① 新格局

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
军种主建的格局

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更好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

改革举措

调整军委总部体制
实行军委多部门制
组建陆军领导机构
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
重新调整划设战区
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等

作战指挥体系

军委——战区——部队

领导管理体系

军委——军种——部队

② 监管体系

组建新的军委纪委和政法委，
调整组建军委审计署

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组建
新的
军委纪委

向军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分别派驻纪检组，推动纪委双重领导体制落到实处。

调整
组建
军委审计署

全部实行派驻审计。

组建
新的
军委政法委

调整军事司法体制，按区域设置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确保它们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③ 裁军30万

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

打造精锐作战力量，优化规模结构和部队编成，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

裁减军队员额30万，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
调整改善军种比例，优化军种力量结构。

根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
推进以效能为核心的军事管理革命。

⑥ 军民融合

着力解决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努力构建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工作运行体系，系统完备、衔接配套、有效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完善民兵预备役、国防动员体制机制。在国家层面加强对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和相关政策制度。

下决心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

④ 军事竞争

抢占未来军事竞争战略制高点

充分发挥创新驱动发展作用，培育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国防科技发展是具有基础性、引领性的战略工程。

必须选准突破口，超前布局，加强前瞻性、先导性、探索性的重大技术研究和新概念研究，积极谋取军事技术竞争优势，提高创新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

⑤ 人力资源

让军事人才辈出，人尽其才



加强军事人力资源集中统一管理，努力使军事人力资源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和战斗力。



深化军队院校改革，健全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



推进军官、士兵、文职人员等制度改革，深化军人医疗、保险、住房保障、工资福利等制度改革，完善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和后勤政策制度。



建立体现军事职业特点、增强军人职业荣誉感、自豪感的政策制度体系，以更好凝聚军心、稳定部队、鼓舞士气。



“史上最牛”军改 出台幕后

习近平掌军后，力挽狂澜，重手治吏，廓清了军改的气候与土壤。当下的中国，内部国力快速发展，外部边壤虽有领土争端但无战事。军队有识之士普遍认为，这是中共军队改革最好的“窗口期”，过时不候。

记者/钟坚

中共军改并非空穴来风，在军事学术层面，各种军改的思路和方案，军改的专题论证研究已开展数年，有关军改走向，各种论派观点，始终莫衷一是，各表一枝。

军改进入快车道是习近平掌军后第二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国家改革战略全局，作为一个重要部分进行部署，着重提出“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三大领域的各项具体任务，全面覆盖了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所有重要方面。

由中央军委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副组长刘继贤作序的《实战化的军事改革》一书认为，把国防和军队改革单独作为一部分列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主要考虑是将军改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后，可以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不同于地方自下而上的改革，军队是一个特殊的武装集团，其改革走向从来是自上而下推行，领导人的意志和决心往往决定改革的走向和效果。遍数中共军队60余年来的多次调整精简变革，对军队重构式的变革基本没有过，很多只着眼



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受阅部队。当日，他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



于裁减员额,做一些边边角角的改变,因为各种利益固化的坚固性,各种既定的格局无法打破;也因为观念和思想的陈旧,导致中共军队的体制编制至今落后欧美诸国军队足足半个多世纪。

在中共基层和军委领导机关都有任职经历的习近平掌军后,力挽狂澜,重手治吏,廓清了有利军改的气候与土壤。当下的中国,内部国力快速发展,外部边壤虽有领

土争端但无战事。军队有识之士普遍认为,这是中共军队改革最好的“窗口期”,过时不候。

此时,习近平以其大智大勇,将中国军改快速全面推开,也可谓正当其时。

军改过去时

1992年10月19日,以江泽民为军委主席的新军委成立。世纪之交,军队学术界普遍

将这一阶段称为军队变革跃升阶段,主要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1991年,爆发了海湾战争,这场战争使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和战争方式,从而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军事变革。

中央军委适时提出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分三步走”。1995年12月,《九五期间军队建设规划纲要》中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在军事



中国军队11次裁军一览

■ 裁军前 ■ 裁军后

1950

计划将军队总数由550万人压缩到400万人

新中国成立之时,解放军的总员额达到了550万人,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的以步兵为主体的陆军,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技术兵种也很少。1950年4月,中央决定将全军总员额由550万减至400万。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精简工作未能继续进行,军队又进行了扩编,到1951年12月总人数增加到627万,是解放军历史上兵力最多的时期。

1952

627万人减至400万人

1951年底,中国大陆大规模剿匪作战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已转入阵地防御作战阶段,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于1952年再次对解放军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

1952年精简工作全面展开,至年底结束,全军总人数降为400余万人。

1975

裁军计划流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队数量再次大幅度上升。1975年,解放军总人数高达610万。为了解决比例失调和部队臃肿问题,1975年6月至7月,中央军委决定3年内将军队减少60万人。

但是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这次裁军随之夭折。

1953

减至320万人

朝鲜停战和国内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基本结束后,195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面对国民经济“一五”计划全面展开等大好形势,决定对人民解放军再一次进行精简整编。

此次精简工作到1955年底顺利结束。全军兵力精简到了大概320多万人。

1980

继续完成第五次精简整编任务

1980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大力精简机关,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8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实施精简方案,精简机关,压缩军队员额,减少保障部队和非战斗人员。这次精简还裁并了各级机关的重叠机构,撤销了省军区独立师,部分野战军步兵师改为简编师。

1982

军队总员额减至400余万人

1982年9月,中央军委下发精简方案,将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改为总参下辖的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军区直属的炮兵、坦克和野战工兵部队,大部划归陆军的军内建制;将铁道兵并入铁道部;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所驻省、自治区、直辖市。

至此,中国军队总员额减至400余万人。

1956

降为240万人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降低军政费用占国家财政开支的比重。中央军委1957年1月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全军总人数再裁减1/3。

这次精简工作从1957年开始到1958年底结束,全军总人数降为240万。在步兵减少的同时,海、空军和特种兵得到了加强,占到全军总人数的32%。

第一次^①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六、七次^②

斗争准备上,由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两个转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开始。“分三步走”,是1997年江泽民在军委扩大会议时提出的:第一步,到2010年,主要是解决好规模、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问题,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打下坚实

基础;第二步,到2020年,加快军队的质量建设,使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第三步,再经过30年的努力,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

军方将“三步走”方案确立为军队现代化的一个中远期目标,沿用至今。质量建军此时也受到重视,按照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则,“九五”期间,将军队裁减50万,“十五”期间又裁减20万。

权力过渡到胡锦涛时代的2003年6月23日,中央军委印发了《2005年前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总体方案》。2003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全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全面展开,中共军队裁减军队员额20万,军队总规模降至230万,陆军部队占全军总员额的比例下降至历史最低点,机关直属单位、院校得到了精简。

据公开数据显示,这次军队整编,团以上机关部门减少3000余个,直属单位减少400余个,全军减少院校15所、训练机构31个。农场、文体单位、军代处、物资机构等较大压缩。陆军撤销部分集团军及师团,增加实行“军旅营”体制集团军的数量。组建一批高新技术装备部队。海、空军撤销部分舰艇大队和航空兵师团场站,全军精简干部17万,减少军职以上领导岗位150余个。

胡锦涛任职军委主席之初,军队内部裁撤臃肿机构,加速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同时数次给军队加薪增加福利,安抚军队人心。但郭伯雄、徐才厚两人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大肆贪腐,搞山头主义,阻挡和停滞了整个军队的改革和建设。

过去十几年,世界军事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美各国军队在伊拉克战争等局部冲突中得到长足的锻炼,军队作战样式、指挥模式和战略防卫思想等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外军的发展进步对中共军队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催促和紧逼。虽然这十几年中国军费开支逐年增长,武器研发、购买先进武器等方面也付出巨大成本,但郭、徐并未推出多少管理和变革军队举措,身居高位,蝇营狗苟。一手网织了以钱财进贡为标准的用人规则,使得一大批军事人才被耽搁,军事改革断档,直接影响了现在和未来,给现在的军事改革和建设带来巨大灾难。如军队建设“三步走”的第一步:



数据来源:中国军网、《纵横》2007年07期《共和国军队的十次裁军》、《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注① 到1950年底,人民解放军完成复员任务约60万人,陆军缩编共94万余人。正当精简整编工作全面展开之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精简工作未能继续进行,军队又进行了扩编。

注② 囿于数据不足,第五、六、七次精简数据合并呈现。

1985

裁减员额百万人

1985年7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转发了军队精简方案。根据方案要求,这次精简整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压缩军队总员额,全军总人数减少100万。到1987年,百万大裁军的浩大工程基本完成,解放军总员额为300万人。

与裁军同步,陆军航空兵部队、电子对抗部队等新兵种,以及预备役部队相继成立。陆军中技术兵种比例首次超过步兵,人民军队迈出由摩托化向机械化转型的关键一步。

1997

裁减员额50万人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在80年代裁军100万的基础上,将在今后3年内再裁军50万。到1999年底,裁军50万的任务已经完成。

2015

裁减员额30万人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

如果这一计划完成,军队规模将保持在200万人左右。

2003

裁减员额20万人

2003年,中国宣布将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基础上,2005年前再裁减20万,使军队总规模降至230万。

第八次

第九次

第十次

第十一次

到2010年,主要是解决好规模、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问题,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在郭、徐手里,仍原地踏步,给接任的军委主席习近平带来极大难度,习面对的是军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空前猖狂的买官卖官病态时期,军队编制过大、发展无序等沉痾种种。军费迅猛增长,但军队的战斗力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使得现在的改革必须要采取破釜沉舟、壮士断腕的姿态来做,退无可退。

空军某部大校董子峰认为,从阶段性特征上考察,军队虽然搞了十几年信息化,这些年也进行了多次调整改革,但尚未完全摆脱机械化、半机械化模式的束缚。信息作战、远程作战和联合作战多有短板,体系作战能力弱的瓶颈日益显现,战斗力生成模式总体上处于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过程中。

各种“信息化”口号喧天的情况下,这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的体制编制和指挥链显得很落后和陈旧,发达国家军队早已开始削减和压缩指挥管理层次,普遍实行师营或军旅营的体制编制。中国陆军虽然也推进军旅营体制改革,已经在扁平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但“一刀切”的军旅营体制,也并非最佳选择。

“军队扁平化的空间仍然很大。扁平化的重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在下层,而在上层。上层过‘厚’的问题解决好了,我军体制编制和指挥链条将会更加顺畅。”有军事专家直指改革弊端所在。

历次改革反思

《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称,军队改革正是体现检验革命军人责任担当之时,不能只想改别人、不想改自己,只想做加法、不想做减法,只想换新鸟、不想腾旧笼。只有

此前中共军队的历次改革,多把军事改革的重点置于减少人员数量,而对优化部队整体机构考虑的不是很多,许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弊端和问题没有得到根除。

把责任担当扛在肩上,跳出一时一事、一地一己的局限,甘愿以个体之失换整体之得,以局部之失换全局之得,以一时之失换长远之得,改革才能顺利推进。

“以往的经验教训是,一谈改革,大家都无比拥护、双手赞成,但改革如果涉及削弱或剥夺自身利益,则会引发各种强烈的利益诉求,强调本部门本系统的特殊和重要性,反而提出增设机构、增加人员和提高编制等级的要求,致使偏离改革初衷,半途而废。”国防大学一位学者表示,面对重重改革阻力,必须要有统一的意志、坚定的决心,各级领导干部、改革设计者要做好表率,敢于向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开刀动手术。

2013年11月,国防大学战略部主任任天佑少将在接受光明网记者采访时说,“在部队与机关比例这一块儿,目前我们各级机关规模庞大、人员也比较多、机构重叠、职能交叉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这个问题是我们长期以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任天佑坦承,因为机关是权力部门,每次精简调整,往往不是想着怎么精简优化,而是想怎么保留住现有机构和人员直属,并尽可能有所增加,即使当时增加不了,过后增加的也不少,所以这块已经需要各级领导机关尤其是高层机关痛下决心,“壮士断腕,自我割肉,确实到了这个时候了”。

以往军改方案的困难重重,或在于标准的模糊。过去的改革之所以成效不大,或者毫无成效,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标准没有建立起来。“近30年的和平环境,实际上已经让我们挂在口头的战斗力标准,变得没标准。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到底应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全军上下心里无数,缺乏量化标准,缺乏明确具体指标。战斗力标准的缺失,导致的结果常常是:演习更像是在演戏,各项建设更像是走走过场,改革更像是装点门面,而非解决问题。”

在军队改革的问题上虽然大家都在说改革的重要,都在表态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都在讲以提高战斗力为标准,但落实到具体单位,不少领导者考虑的不是战斗力的标准,而是本单位的领导职数增加了没有,级别提高了没有,规模扩大了没有。如果哪个单位被裁撤了,被压缩了,被其他单位合并了,哪个单位的领导就会觉得自己是“历史的罪人”。他们宁可当改革的促退派,也不当改革的促进派。

曾经有个单位,在一次编制体制改革调整后,降了一级,单位的领导职数减少了一半多。这个单位的领导直到退下来很多年,都被认为是“历史的罪人”,他自己在人前人后也觉得抬不起头来。

还有一个单位在论证改革方案时,按照精干高效的原则,可以提出与另一个单位合并的方案,但这个单位领导却“非常英明”地指出,与这个单位合并,师以上干部的消化要多少年?老干部的队伍要有多大?你们在座的各位还有提升的空间吗?参与论证的人顿时感到如梦初醒,都说打死也不提合并的方案了。

“这样的场景不是虚构,它真切发生在历史细节中,就是这些历史细节,造成了

一些阻碍战斗力生成的体制机制等深层次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建设始终无法取得革命性的突破和发展。”一位军队将领痛心疾首地表示。

中共军队的历次改革,多把军事改革的重点置于减少人员数量,而对优化部队整体机构考虑得不是很多,许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弊端和问题没有得到根除。有的还炒“回锅饭”、“走回头路”:如不断归建又移交的地方人武部、军队前几年的大联勤建设等。对于基层改革者来说,虽有改革的勃勃雄心,但无力对已经落伍的领导管理体制等改变一分。

军改之难的根源

如今已在中共军队内密切推进的军队管理体系,在过去很多年来并非没有纳入专家学者和高层的视野,而是众多人士都陷入一个奇妙的观念漩涡不能自拔。

军队建设专家称,构建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是敢不敢在领导指挥体制上“猛切一刀”,把军政军令系统相对分离出来。对于军政军令分离问题,长期以来,中共军队理论学家的认识常常是把它与社会政治体制联系起来的。以为军政、军令分离体制是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的产物。军人不问政治,是这种体制的鲜明特征。

而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和简诺维茨的研究更为这种担忧加了一把火,这两位学者在考察军队与国家关系时,认为实行文官治军是资本主义国家防止军人擅权的一个重要制度。军人只负责打仗,不过问政治。“军人只是政治家手中那杆长枪上的子弹,扣动扳机的手不在将军们那里。”

但也有中共军内学者认为,文官治军这种制度与军政、军令的分离没有绝对必然

的联系,文官治军解决的是军队和国家的关系问题,而军政军令分离解决的是军队平时建设和战时指挥互相关系的问题。两者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

“回顾我军历次体制编制改革,为什么在政令和军令分离问题上,大家讳莫如深,不敢越雷池半步?根子就是这个问题没搞清楚。似乎一触及这个问题就是崇洋媚外,就是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上述学者称,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制绝对不会出现有人担忧的情况。长期的军政军令不分,特别是长期的和平环境条件下,各级党委和军官的注意力大量转移到平时的建设和管理上,指挥权力层层上收、指挥效率越来越低下,部队打仗的功能严重弱化。

这位学者总结称,可以说,目前军政军令合一的体制,指挥效率与管理控制两难取舍,已经成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一个很难解开的死结。从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上看,地方推行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虽然尚不够彻底,但确实解决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

“对市场经济我们已经去掉姓社姓资的标签,对军政军令分离我们也需要去掉姓社姓资的标签。适度的军政军令分离,既能提高指挥效率,又能防止军人擅权,还能实现军令系统与军政系统的相互监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中央军委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许其亮,在2013年发表的《坚定不移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一文曾指出,要按照调整职能、理顺关系、优化机构、提高效能的思路,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健全新型作战力量领导体制,加强信息化建设集中统管。

这表明,中央军事最高决策层那时已然采纳了这种革故鼎新式军队变革。尽管

中共军队进行的体制编制改革,是面向未来的力量重组,但也是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改革往往会触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以及军地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造成改革困难重重,难以进行到底。

邓小平在1980年3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军队改革特别是军队体制改革,必须“要搞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与其他改革事项不同的是,军队体制编制改革在方法上要采用革命的办法,形成体系设计、自上而下的改革发展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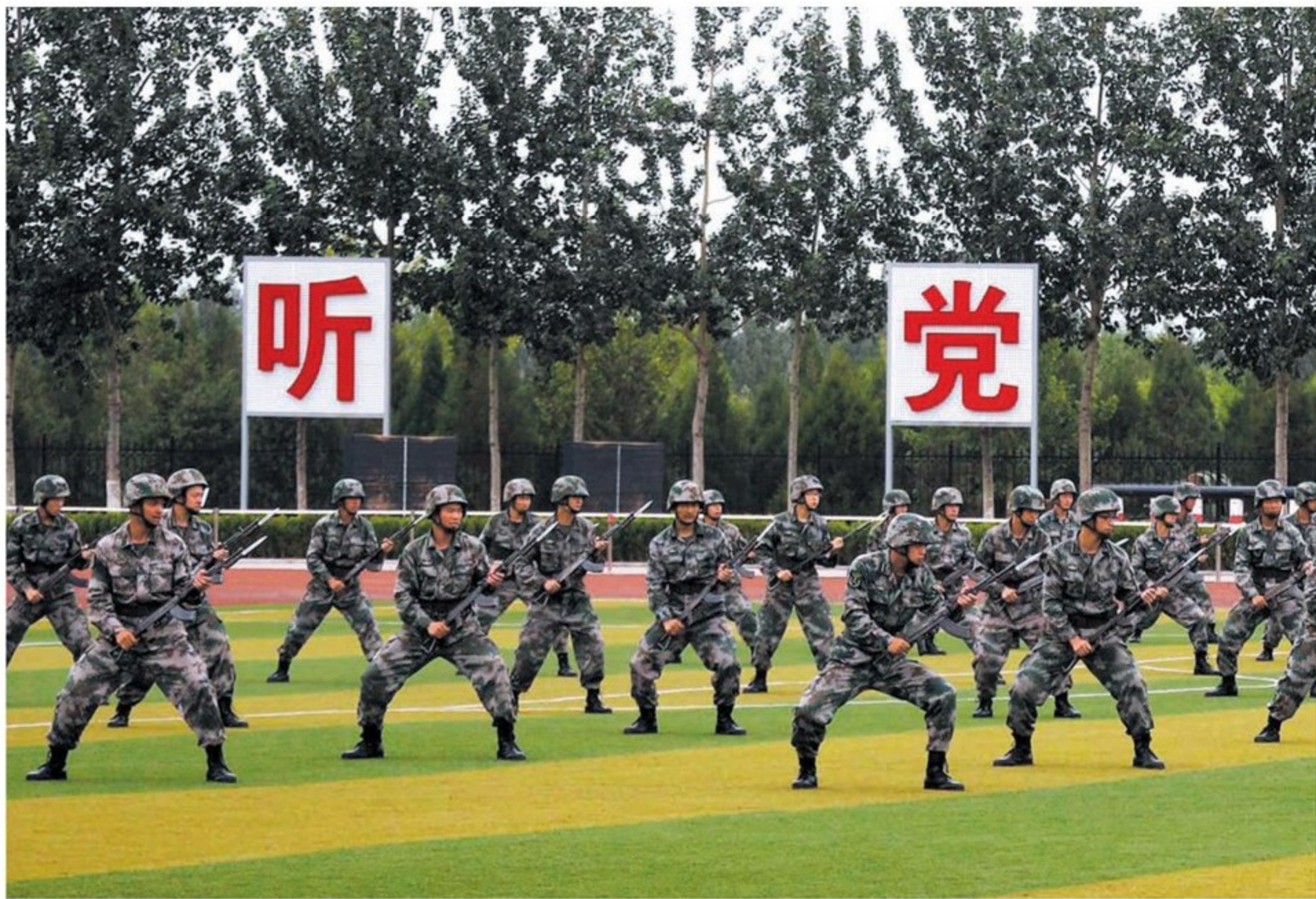
中共军队现在敢于对军队领导指挥体制进行大刀阔斧式改革,得益于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有很强的政治领导力,敢下定改革决心,有勇于承受各种可能的反对意见的魄力和意志。

俄军在推进改革中,普京坚定支持几任文职国防部长推行改革举措,为此不惜将抵制改革的总参谋长克瓦什宁、巴鲁耶夫斯基和空军总司令泽林等高级将领撤职。如俄军事专家所指出的,“俄军‘新面貌’改革是在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坚定决心基础上展开的。”相反,如果得不到最高统帅的坚定支持,如果缺乏立断立行的勇气魄力,如果拿不出超出常规的断然举措,那么,军队体制编制改革常常是无果而终。

改革正逢良机

纵观历史,破除部队的和平积习,根本出路在于从制度设计出发,形成以实战化为改革指向的军队建设发展新常态,确保部队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同时也要看到,相对和平的环境为推进实战化的军事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

因为军事改革往往涉及体制编制、规



模结构、政策制度等根本性的问题，改革本身具有很大的风险和挑战，军队的战斗力可能会因为改革而暂时下降。为确保国家安全和利益，大规模、深层次的军事改革往往在一个较为宽松、稳定的和平环境中进行。这样可以遵循军事发展的普遍规律，可以更为从容、长远地筹划设计军事改革。所以说，和平时期往往是推动军队建设获得大发展、大进步的最佳时期，但这种军事改革必须以实战化为基本指向。

如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军事家敏锐地觉察到新型武器装备和新兵种建设面临重大飞跃，苏联应不失时机地实施军事改革以追赶这一潮流。当时苏联红军的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向最高军事领导部门提出建议，认为应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和最新技

术因素的基础上，全面改组武装力量。

1931年，在拟定和修改国家军事建设计划过程中，苏联最高层充分吸收改革派将领的意见，推动旨在赢得战争的军事改革，图被调任中央军事机关，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装备部长，负责主持军队的技术改装和改革工作。一批支持实战化改革的军队领导干部得到提拔重用，苏联的军事改革得以推进。从当时参观苏军演习的西方国家军事专家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这场军事改革确实给苏军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2006年以来，美军对其现行领导指挥进一步调整职能、精简机构，在总部层级，国防部精简约50个将军岗位和150个高级文职岗位。新型作战力量得到加强，继网络司令部正式组建后，各军种也组建了相

应指挥机构和作战部队。国防大学研究外军的一名专家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美军现在实行全域战略布防，军队编成模式完全按照作战需要，随时转化、变化、更新。

中国国力的发展也给军改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和充分的物质条件。有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国际和周边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可控，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60万亿元大关，财政收入超过14万亿元，这为推进实战化军事改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和雄厚的财力支撑。

“不管在何种背景下发起的军事改革运动，都有一个最佳的窗口期，一旦改革窗口期过去，就会失去发展的机遇。”全军上下对改革期望很高、呼声很大，实战化的军



长期的军政军令不分，特别是长期的和平环境条件下，各级党委和军官的注意力大量转移到平时的建设和管理上，指挥权力层层上收、指挥效率越来越低下，部队打仗的功能严重弱化。

改具有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在《实战化的军事改革》一书中，多位军内专家都持有相同观点。

与以往历次由单一部门牵头的军改不同，目前军内推行的这次军改方案，由中央军委深改组统筹指导，全军全局论证，自上而下，统筹兼顾，科学合理。军委深改组下设改革办，改革办下又分设二十余小组，参与军改论证的是由全军抽调的精兵强将。据参与军改的一位军事专家透露，军改方案全部由各方背靠背编制而成，多个小组不跑风透气，各种编成的方案提交深改组领导小组统筹综合，之后才最终定稿。现定稿的军改方案原本计划2014年草案论证，年底公布方案，但军改千头万绪，事涉多方利益盘整，延宕至今年年初。今年的计划

是在6月底拿出方案，完成论证，却也无果，又推迟半年。至国内外诸多大事完美收官，军改综合方案才终于出笼，获领导层面权衡审定。军改方案的插曲，可见其推进之不易，变革之艰难。

“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只有相对合适的方案。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只要不犯颠覆性失误，改革方案就不必过于追求完美，否则有可能错失改革良机。”上述军事专家表示，要认清根本不存在完美无缺的方案设计，也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政策制度。“现在我军改革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同时也要看到改革窗口期不是无限的，必须抓住机遇，实现弯道超车，才能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

□ 编辑 崔世海 □ 美编 青年

中共最高“课堂”新变化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不仅“课堂”首次走出中南海，学习形式也一改专家授课、政治局委员听课的传统，出现自学、调研、讨论等多样化形式。

记者/郭天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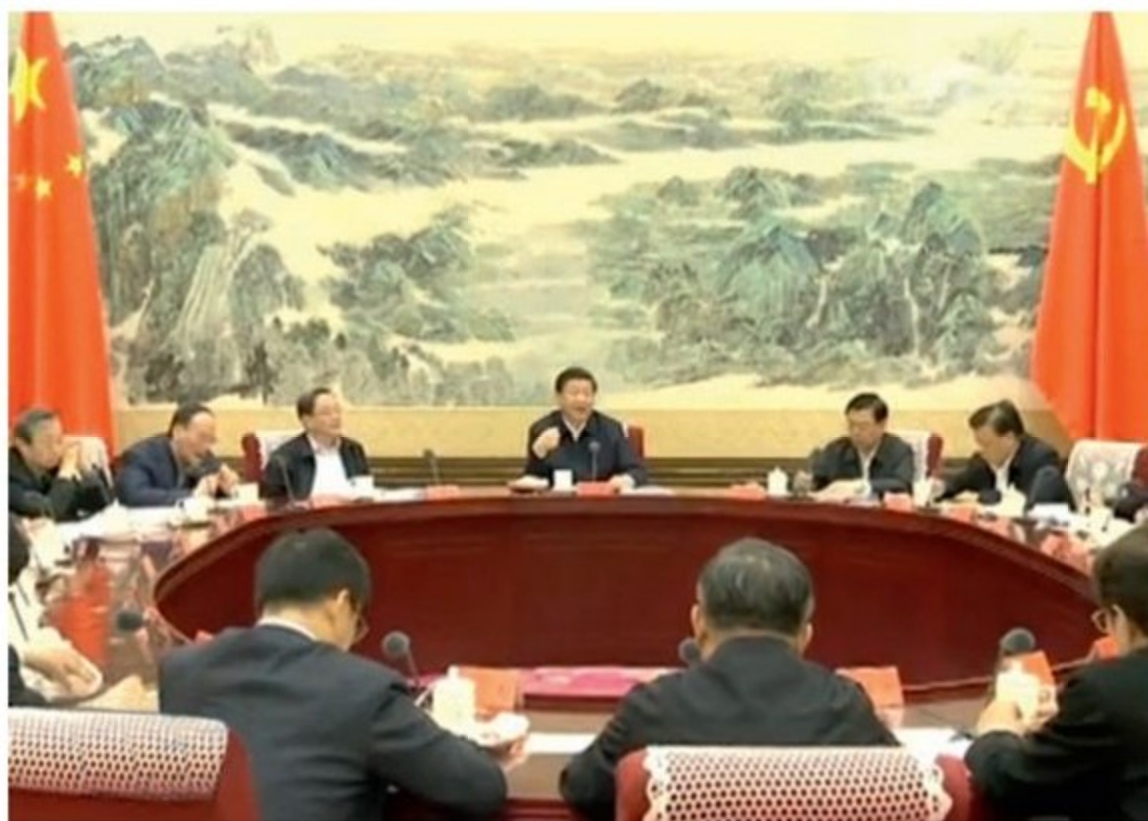
11月23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进行第28次集体学习，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此次学习延续以往集体学习惯有的学者主讲方式，讲解人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顾海良教授。主持这次集体学习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

这是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进行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集体学习，之前两次是2013年12月第11次集体学习、2015年1月第20次集体学习，主题分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属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在主持第20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说：“安排这两次学习，目的是推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更全面、更完整的了解，以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

两年时间内，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三次聚焦马克思主义，颇耐人寻味。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部主任韩庆祥接受陆媒采访时曾对此作如是解读——“避免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源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南海法制讲座，十六届中央政治局时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学习主题也不再局限于法制。十六届、十七届的中央政治局，一共进行了77次集体学习，其中，十六届44次，十七届33次。十八届中央政治局截至目前已进行了28次集体学习。

学者主讲、政治局委员听课的学习形



式，一直贯穿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时期。中共十八大后，集体学习呈现出一些新变化，如出现了自学、调研、讨论等新形式，授课地点也首次走出中南海。分析人士认为，政治局集体学习从学习内容到学习形式上的变化，反映了十八届政治局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

从怀仁堂到中关村

2015年9月30日上午8时30分，习近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志从中南海出发，分乘两辆大巴车，集体来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参观创新成果展示，并在现场进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这是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9次集体学习。

一个多小时时间里，习近平等中央政治

↑ 2015年11月23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的画面截图。

局各同志在3D打印、集成电路装备、节能环保、生物和健康等展区流连忘返，同科研人员亲切交谈，询问增材制造、大数据、纳米材料、生物芯片、量子通信等技术自主研发应用情况，现场上了一堂生动的“创新课”。

这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课堂”首次走出红墙，以往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中型会议室。这次集体学习将“课堂”安排在火热的创新一线，显示了政治局集体学习从内容到形式都比以往更为灵活。

其实，学习形式上的这种新变化自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就开始了。2012年11月17日进行的这次集体学习，内容是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就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谈体会。与以往相比,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没有授课专家,这种形式也是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确立以来首次出现。

据新华网整理的28次集体学习资料显示,第15次、第26次集体学习还出现了“中央政治局同志自学并交流体会”的新形式。

在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主题的第15次集体学习中,除自学外,孙春兰、孙政才、汪洋、韩正等政治局委员还就这个问题作了重点发言。第26次集体学习,则是马凯、王沪宁、许其亮、李建国、赵乐际就践行“三严三实”作重点发言。这两次集体学习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委员还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部级高官登上讲台

为中央政治局授课的人,基本都是各科研院所、大学的知名学者,其中,部分学者还不止一次走上中南海怀仁堂的讲台。学者授课几乎成为中南海集体学习的不成文规定。十八大后,这一默认的传统被打破,自学、重点发言、讨论等新学习形式,让中共最高“课堂”变得更加灵活,互动性更强。而“70后”年轻学者走上讲台,为平均年龄超过61岁(刚上任时)的政治局委员授课,也成为课堂一景。

《凤凰周刊》记者统计,十八大后,讲课或作主要发言的人士,在28次集体学习中,有9次是各大部委或省市“一把手”,而不再是各部委下属研究机构、科研院所或大学的专家学者担纲主讲。

比如,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学习主题的第3次集体学习,授课者是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和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第7次集体学习中,作“重点发言”的是马凯、刘奇葆、范长龙、孟建柱、赵乐际、胡春华。以往,政治局委员是听讲者、提问者,十八大后,听讲者成

为授课者和重点发言者。

在第21次集体学习中,吉林省社科院黄文艺教授作了题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公正”讲座。值得注意的是,黄文艺年仅44岁。他的学生称他为“青年才俊”,称赞他“讲课逻辑缜密”,还喜欢“窃窃地笑”。黄文艺也是把课讲进政治局的少有的“70后”学者。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向《凤凰周刊》记者分析授课者身份时说,不管是部级官员为政治局委员授课,还是“70后”登上中南海讲坛,“这很正常”。他说,正部级官员不少人都有博士、硕士学位,既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又学有专长。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者挑选,更多的是考虑问题针对性和对主题的研究深度。”竹立家说,比如第22次学习关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主讲者是京津冀三地的党政主官,因为这三地面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契机和使命,地区一体化任务空前,而对三地发展现状和面临问题最有发言权者,无疑是长期在三地任职的党政主官。同时,京津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也是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缩影,这三地的经验和做法,对全国具有示范意义,“这是挑选三人主讲的主要考虑。”

竹立家表示,中央选拔高水平学者担任讲师的标准是学者的理论深度,而非年龄。“只要学术造诣够深,将来会有更多更年轻的学者进入中南海课堂。”

两次聚焦反腐

陆媒统计资料显示,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的77次集体学习中,没有一次以反腐倡廉为主题,而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已举行的28次集体学习中,已有两次以反腐为主题。中国社科院历史学者和中纪委宣传部长先后为政治局委员授课,讲解廉政文化。政治局委员冀望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汲取反腐智慧,推动反腐事业发展。

第二次聚焦反腐话题之时,中纪委“打虎”节奏放缓,社会上颇有反腐进入瓶颈期

的议论。习近平在总结反腐形势时称,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成效是阶段性的,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就在这次集体学习前后两天时间,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乐大克先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两名省部级官员于此时落马,强烈因应政治局集体学习释放的政治信号。

反腐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的分量之重,由此可见一斑。竹立家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十八大后,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按照总体部署,未来五年是中国能否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是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习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将权力关进笼子里,政治清廉,是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所以,中央政治局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从深化改革的大背景到廉政建设的制度化,将反腐事业推向深入,是社会各阶层的共识。

此外,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首次触及住房这一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敏感领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评价这次学习时说,一方面,住房话题涉及民众切身利益,民众对于高房价问题反映强烈,另一方面,房地产业同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有较高关联度,牵一发而动全身,专门学习研究住房问题,体现最高层对此高度关切。

有学者据此评价说,政治局集体学习与民生期待紧密挂钩,体现了新一届领导层更为务实的作风。

务实与灵活,成为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风格的两大关键词。那么,以后的集体学习将会重点关注哪些领域?

竹立家预测,未来政治局集体学习,有关“十三五”规划的议题将成为学习重点。他表示,“十三五”规划建议专门将“权力建设”和“党的建设”列为一章,这在以往是没有过的。他认为,制约权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相关话题,仍将是较长一段时期的重要议题。



“超级水稻”之祸

黑龙江不少农民领种了免费发放的号称产量高的稻种，并获得“承担低产部分的补偿”的承诺，但最终稻田大量减产甚至颗粒无收。目前农民们辗转多地讨要说法，均无功而返。损失到底该由谁来埋单？

记者/闵云霄

李金华举起铁锹狠狠砸下去，“哐”的一声，玻璃门破碎，玻璃散落一地。

这是黑龙江省宝清县城里两扇新装修好的门面房，房子的主人王永录，是宝清润茂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下称润茂农业合作社）负责人，李金华是当地八五三农场的农民。

2015年4月初，李金华和另外一个农民从王永录处领了几袋免费的“超级水稻”种子，种植了30亩。李金华个人一共承包了大约60亩地，余下的种植了当地常规稻种。

按照当时的宣传，“超级水稻”每公顷（15亩）产量可以达到近20000斤，而宝清当地的正常稻田产量大约为每公顷18000斤

左右。稻种提供方甚至承诺：“如果平均产量低于每公顷16000斤，承担低产部分的补偿”，这个协议由北京世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世农科技）工作人员与润茂农业合作社约定，并对外广泛宣传。

对一个农民而言，不但可以保证正常收成，还能节约几千元的种子费，李金华何

乐而不为呢？

宝清是一个农业大县，辖区内有多个农场，肥沃的黑土地盛产大米，素有“北国粮仓”美誉。该县行政区域面积10001.27平方公里，人口仅有43万，这里人少地多，全使用机械化耕种，一些农民甚至个人承包土地达几百甚至几千亩，一年下来的种粮收入也颇为可观。据宝清县天彩富硒生态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下称天彩农业合作社）负责人魏喜贵等人的统计，“超级水稻”在黑龙江推广种植超过2万亩，除了宝清县，还涉及虎林、延寿及绥化地区的多个产粮县。

接下来，农民们早出晚归，按时除草、施肥。“除了最初长势比较慢以外，似乎没有其他不同”，一位农民告诉《凤凰周刊》。

但秋收季节到了，问题也终于暴露，种植当地常规品种的稻田开始收割，“超级水稻”的稻田还是青幽幽的。再等一段时间，所谓成熟的稻谷基本上是空壳、干瘪的。

李金华为此多次给王永录打电话，得到的解释是，这事当地农业部门已经关注了，但应该由世农科技来负责，正在等待赔偿处理。但大批农民找到世农科技，该公司却告知此事早已经处理完毕，应该由合作社负责。

“后来王永录要么不接（电话），要么

直接发放人，存在责任，但他既不愿赔偿损失，而且事发后也不到北京找世农科技讨说法，“砸他玻璃都是轻的！”

2015年11月下旬，《凤凰周刊》记者在宝清县采访期间，因砸门面房被公安机关拘留了5天的李金华刚刚获释。

获释后的李金华并不肯罢休，他扬言还要带人来再找王永录的麻烦。王永录不甘示弱，也约了一帮“兄弟”对付，“他要带20人，我就找21个”，王永录说。

不过，两边邀约的人刚好认识，于是冲突终止。最后的结果是，两人在饭桌上连续喝了几杯酒，表示“以后要做好兄弟”！

回忆当初参与“超级水稻”种子合作的过程，王永录感叹万千。他告诉《凤凰周刊》，2015年3月初，自己接到宝清县农业局副局长朱辉的电话，说哈尔滨有个关于种子方面的会议可以去参加。

3月15日，王永录约上当地人臧学良一同前往哈尔滨马迭尔宾馆，会议由光彩集团粮业有限公司（下称光彩粮业）总裁刘志彬主讲，主要介绍他发明的“超级水稻”在河北唐山种植情景，据称一公顷最多可以达到24000斤的高产，而且这种水稻的蛋白质含量甚至超过鸡蛋。

刘志彬在会上介绍了种植技术。会上会下，人们均称他为“刘志彬教授”。

宝清是一个农业大县，辖区内有多个农场，肥沃的黑土地盛产大米，素有“北国粮仓”美誉。该县人口仅有43万，这里人少地多，全使用机械化耕种，一些农民甚至个人承包土地达几百甚至几千亩。

直接挂断”，李金华怒了，于是上门砸了王永录门面房的玻璃。

“高兴得一夜睡不着”

李金华告诉《凤凰周刊》，年初他种地时在银行贷款6.9万元，现在稻田几乎绝产，他偿还不上。李金华认为，王永录是种子的

会后，光彩粮业的人找到王永录等人提出合作要求，承诺种植这些水稻“如果平均产量低于每公顷16000斤，承担低产部分的补偿”、“每公顷高于18000斤”部分则与合作社一起分成。

与光彩粮业有业务合作的世农科技副总经理尚秀和也在这个会议上，他给王永

录等人开出的条件是，他们公司也有“超级水稻”的种子，如果王永录等人帮忙推广种植，得到的分成会比光彩粮业给的更多。

“我们高兴得一夜睡不着，第二天准备签合同，但很快接到尚秀和通知，说（他们）领导不同意”。王永录告诉《凤凰周刊》，于是他们三人和光彩粮业签了合同。回到宝清县，王永录等人邀约天彩农业合作社的魏喜贵，合作一起推广“超级水稻”。

光彩粮业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曾答应3月29日将种子运到宝清，但最终却没有兑现承诺。据农民们事后了解，是因为光彩粮业没有足够经费，还拖欠世农科技的债款，无法提供足够稻种。

当时已经临近种植季节，王永录等人无比着急。这时，“尚秀和盛情邀请我们前往北京洽谈种子合作一事”，臧学良告诉《凤凰周刊》，“我们在北京见到了世农科技的法人代表白志明，白志明也叫白丹青”。

3月31日，尚秀和到达宝清县，在宝清县农业局朱辉的见证下，三方签了《超级水稻种植合作协议》，甲方世农科技向乙方润茂农业合作社以及天彩农业合作社免费提供“超级水稻”种子。提供标准为，每亩稻田4.5公斤。

协议约定，合作社必须将甲方提供的稻种实际使用到项目耕地，不得私自留存或将实际使用种子调换成其他种子，否则按每亩80元的标准支付违约金。

该协议规定，如项目耕地产出的“超级水稻”平均产量低于16000斤/公顷，则世农科技放弃稻谷的分配权，并承担低产部分的稻谷补偿。如70%种植户高于此产量，则不予赔偿。如项目耕地产出的超级水稻平均产量高于（含等于）18000斤/公顷，则增产部分70%的稻谷实物归世农科技所有，增产部分的30%稻谷实物归合作社所有。

协议还约定，合作社应按照每亩100元技术服务费的标准向世农科技支付技术服务费，但前提是确保平均产量高于18000斤/公顷，并于2015年秋收时以稻谷抵技术服务费。

臧学良所在的俄罗斯四方集团为该合

作担保方,向世农科技提供连带担保责任。

不过,《凤凰周刊》记者发现,该协议上,其他两方均签字并且盖了公章,世农科技仅仅尚秀和作为甲方代表签了字,未加盖公章。

“当时世农科技的人说补盖,但是一直没有盖”,臧学良说。

协议签署后,数车(每车40吨)种子从四川和河北唐山陆续运抵宝清县,直接通过合作社发给了周边农民。有农民亲自看到了尚秀和支付3.5万元运费的过程。

对于前述协议,世农科技副总经理井冉对《凤凰周刊》称,这协议早已经收回来了,是作废了的,而且是无效合同。

但是魏喜贵声称协议并没有收回,他手里有协议原件,并且给《凤凰周刊》记者提供了复印件。

“劣质种子”被抵制

“超级水稻”种子运到宝清县之后,陆续通过农业合作社分发给了当地农民。

不过一名农民将种子领回家后,放在水里却发现竟然漂起来的有三分之一,觉得这很蹊跷因为正常的稻种应该是全部下沉。

王永录告诉《凤凰周刊》,自己用同样的方法试验后,认为种子是假的,他马上就给朱辉打电话,于是宝清县农业局紧急召开会议部署打假。

宝清县农业局官方网站上刊发的《不要被免费假种子蒙蔽了双眼》的文章提到,此水稻种子没有任何部门审定报告、品种特性介绍、包装等证明,属“三无产品”,可能造成农民减产或绝产,危害巨大。

农业局请示县政府领导后,在该县官方微信公号上宣传假种子危害,并在该县电视台连续七天播放,并特别说明:“如果有农民

一个合作社的农民在查验余下的稻种,包装袋上没有任何厂家信息,也没有编号和适宜种植范围的说明。



已购买或领取该种子,千万杜绝种植,已装入催芽箱,建议马上更换。如果农民一意孤行坚持种植,造成损失后果自负”。

宝清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五九七农场的公安部门也对进入该地的种子车辆进行跟踪、检查并依法予以查处。

宝清农业局还印发了《致全县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印刷3万份,面向全县散发。内容为:近期农村传言农业局免费向农民发放水稻种子,在此郑重声明,农业局从没有向农民发放过任何农资。并且提醒农民,“购买农资必须从正规途径购买”。

《凤凰周刊》记者注意到,宝清县农业局的公开信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提到了世农科技,另外一个版本将该公司名字隐去,其他内容则几乎没有变化。

响应政府行动,4月2日,润茂农业合作社也给世农科技发去声明:“因为种子手续问题而引起宝清农业局干涉种植户并强制禁止播种、禁止催芽的问题,合作社不负担

何责任”。

世农科技工作人员当时的说法是,这些通过合作社发放的种子应尽快收回,如果有个别农民没有收回,造成的损失由该公司按照当年当地水稻平均产量差额部分进行补偿。

漏网的“超级水稻”

宝清县农业局执法大队一位负责人告诉《凤凰周刊》,当时扣押了臧学良等人的四车种子,因为这些种子没有出售,所以不能没收,等过了播种季节后又返回给了他们。“我们只能做正面工作动员农民不要种,是否有人在做反面工作,不得而知。”

王永录称,由世农科技提供的种子运到宝清后,由于当地春天气温低,农民需要把种子拿到催芽车间催芽再种到田里,但是他们发现发芽率只有50%到60%,有一部分农民就选择放弃,直接扔了。

《凤凰周刊》记者找到一些余留在农民家里的种子,这些种子由黄色袋子包装,但是袋子上没有任何生产厂家、标号以及适宜种植范围等信息,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相关规定。

但问题是,仍有不少农民后来种植了“超级水稻”。《凤凰周刊》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宝清县除了10个乡镇之外,境内有五九七农场、八五二农场、八五三农场等多个国有农场,这些农场隶属于黑龙江农垦局管辖,宝清政府部门对农场的管理无权过问,于是这里成了监管真空,而这些农场很多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还很大,这些农户与当地农业合作社也有多年的合作。另外,即便是宝清县政府管辖范围内,也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接到了传单,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看本县电视台和上网,一大批脱离监管的种子就这样被种下。

“我们根本就没有接到不让种的通

知!”一位农民告诉《凤凰周刊》。

魏喜贵告诉《凤凰周刊》，仅通过他们合作社发下去的种子，在多个农场一共种了4000多亩。

臧学良等人还表示，种子被查处期间，他们给“超级水稻”发明人刘志彬打了电话，对方坚称可以种，世农科技的人也说可以种。

据魏喜贵等人介绍，部分种子还通过直接分发或者农民转给农民方式散发到肇源县、虎林、绥化地区等地，很多不知内情的农民进行了种植。

《凤凰周刊》获取的多份出库单影印件显示，同一批发往黑龙江宝清、泰来，以及辽宁盘山县等地的稻种一共大约在20车、800吨左右，最后到底种了多少，不得而知。出库方为刘志彬担任董事长的四川科农种业有限公司，收货及发货方为华赢集团和北京世农科技公司，两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均为同一人：白丹青。

根据魏喜贵等人的统计，黑龙江种植的“超级水稻”，减产和绝产的超过2.5万亩。

《凤凰周刊》记者曾多次联系刘志彬，但他不接听电话，给他发去短信也没有回。

空中飞舞的稻谷

据魏喜贵等人称，从4月种植到9月收获

况下，一亩地可以产1200斤（即每公顷18000斤），但是种植的“超级水稻”分两种，四川眉山的种子出现减产，亩产大约只有700到800斤，而唐山的种子，几乎颗粒无收，属于绝产。

如今，因为要为来年的种植做准备，大量的稻草已经被割掉，当地的农俗是，10月中旬必须将稻谷收完，接下来必须进行耕地，让黑土地过冬，这样稻谷的根就会腐烂掉，病菌和害虫会被冻死，增加土壤透气，如果翻得晚，一亩田就可能减产200斤左右。

《凤凰周刊》记者走访了多个农田，发现没有收割的水稻，谷穗干瘪，将其撕开，里面只有少量白色淀粉或者完全空壳。友谊农场一位农民用铁锹将稻谷抛向空中，微风中飘到了很远的地方，该农民说：“正常的稻谷比较饱满，会从空中落下来，不会飘去很远”。

无奈的农民们只有求助政府部门，但为时已晚。

《凤凰周刊》记者曾前往宝清农业局采访，被告知朱辉不在而婉拒。此后记者多次拨打朱辉的电话也未有人接听。拨打尚秀和电话，说明来意后，被迅速挂掉，再次拨打，再也没有接通。

面对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农民找到

4月27日，世农科技的代表曾找到魏喜贵等三人，分别签下一份承诺书，承诺书内容显示：与光彩集团粮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初签订的水稻种植合作协议，光彩粮业承诺2015年3月27日将刘志彬教授繁育的水稻种子送货到位，但是后来光彩公司违约无法提供种子，导致农时延误。

这份承诺书声称，“为避免更加延误农时，我及我牵头代表的种植户系主要要求，完全自愿要求试种北京世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刘志彬教授在唐山繁育的试验稻种”；承诺书还写明：“保证个人以及我牵头代表的种植户的农事耽误、种植、减产、绝收等任何风险全部由我们个人承担，绝不瞒报虚报土地补偿数量，不会再以种子为由借题发挥，制造纠纷，否则我们将以我们全部耕种地的正常年产值数额作为违约金支付给世农公司，并且愿意接受法律应有的制裁。”

但多位种植后受损的农民告诉《凤凰周刊》，他们之前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承诺书存在，而且三个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种植的农民群体。

世农科技副总经理井冉则告诉《凤凰周刊》，这个事已经处理完了，“合作社的人这边骗我们，那边骗农民”。井冉表示，该公司发现种子出问题，被地方政府阻拦后，也专门发函和发短信通知过农民不让种。不过，记者提出请该公司提供证据出示短信时，被拒绝了。

面对不断“找麻烦”的农户，刘志彬曾邀约魏喜贵等人在北京商议处理方案。2015年9月25日，魏喜贵获得一份刘志彬签字的委托书，“在黑龙江相关地区调查核实我公司水稻高产、丰产、减产的有关情况”。但落款为北京世农科技，该公司工作人员为此表示，刘不能代表该公司。

深冬，黑龙江大雪冰封。数十位农民却冒着寒风聚集讨要说法，他们很多人已经多次往返宝清县城及北京。他们的心如同那些空中飞舞的稻谷，空瘪得难以踏实。

宝清政府部门对农场的管理无权过问，于是这里成了监管真空；即便是宝清县政府管辖范围内，也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接到了传单，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看本县电视台和上网，大批脱离监管的种子就这样被种下。

季节，世农科技的人还曾多次前往宝清。

“9月上旬，世农科技来过几拨人到宝清，看到长势很好，都很高兴。但是他们来来去去都不告诉我，怕我参与分成”，王永录如此说。

可惜，农民们最终收获的是空壳。稻谷的减产和绝产，成了他们难以接受的事实。一位农民告诉《凤凰周刊》，正常的情

当地合作社，但是合作社认为是世农科技的责任，但世农科技认为此事已经处理完毕。曾有农民前往四川找到刘志彬，但刘表示，种植技术是他的没错，但种子不是他发出的，还是得找世农科技。

“现在都不知道找谁了”。诉求无门的农民说。

《凤凰周刊》记者采访获悉，2015年

“互联网+”颠覆医疗体制，道阻且长

中国医改已进入深水区，在众多领域无往而不利的“互联网+”能否如人所愿，推动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医疗市场的社会化、市场化，答案不容乐观。

记者/钟坚

“别人只给你冷冷的榜单，微医给你最真切最全面的服务，让你一键挂上所有TOP医院，各专科前十名！”2015年江南又一个暖冬来临前，总部位于浙江杭州的微医集团开始全面热身，在内地全境招兵买马，这是近年来大陆互联网医疗创业界活跃的一个缩影。

同城的阿里巴巴集团在医疗健康产业亦浸润已久，旗下从事健康咨询服务产业的“阿里健康”不久前因推出“滴滴医生”服务，而备受关注。2014年阿里健康曾在河北省推行电子处方上网，以带动药品电商服务，但以失败告终。

“国内至少有2000多家移动医疗互联网公司存在。在互联网医疗领域，不管是我们还是对手，或是友商，其实都是从2014年才真正起步。”对这个看起来很庞大的市场，阿里健康副总裁倪剑文显得很淡然。他对《凤凰周刊》表示，对这个市场来说，没有谁具有绝对的优势，大家都在摸索互联网医疗运作的模式，遗憾的是，迄今没有一家真正大面积地实现和医疗系统进行实时、全面的对接。

移动互联网医疗创业者喜欢把传统医疗领域比作墙，墙内是大陆的近25000家医院的生态体系，墙外转悠着这两千多家互联网公司，不得其门而入。不仅如此，传统体制内的医务工作者把这些不是医生的人入侵者，视为异类，在各种可能的时间和空间处处防范。

以往的经验中，互联网改变了商业、金融等行业的游戏规则，而对尚未被开发的传统医药卫生领域而言，满怀理想主义的创业者们除了到处陈说医疗痛点之外，几年努力下

来，对医疗产业的核心几无撼动，现金流方面更没有赢者。中国医改已进入深水区，在众多领域无往而不利的“互联网+”能否如人所愿，推动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医疗市场的社会化、市场化，答案不容乐观。

没有找到医生的“骚点”

“现在任何IT人想替医生看病，一定会出大问题的！”

这样大咧咧地把话抛给对方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现任院长王杉，坐在他面前的是“春雨医生”的创始人张锐。在北京某论坛上的对话有些火药味，主持人、移动医疗产业评论者刘谦称，这是代表移动医疗界和公立医院院长难得的一次对话，此前做互联网医疗的投资人和公立医院的院长们做的看似是同一件事，往往很少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上几句。

王杉和张锐两人都是“互联网医疗中国会”16位发起人的成员，虽为“同道中人”，但完全是不同的路径。

大约4年前，大陆媒体人张锐转型涉足互联网医疗，他的春雨医生APP主做网上预诊和咨询，从大陆普通民众看病难和看病贵中张锐预感到，以后的互联网医疗可能是一片蓝海。张锐一心想把春雨搭建成国内最大的线上医疗平台，调整中国不均衡的医疗资源，他的理想是要把春雨医生变成一个让中国人免费看病和低价买药的公司。

但无一例外的，像春雨医生这样的互联网医疗企业露头没多久，便挣扎在生死线上。

在苟延残喘几年后，张锐赶上这轮互

联网医疗政策的好时机，2014年获得巨额资金注入的张锐现在又重振雄风。在不久前张锐的春雨医生宣布，从线上预诊转向线下，采取诊所模式，患者可以网上咨询后去诊所看病取药。春雨医生更是称，年底前在国内开至300家诊所，“300家不能转起来，你们怎么骂张锐都可以。”

王杉是医学界权威，又是传统公立医院的院长，王杉参与多项国家层面的医改政策，深谙传统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难点和政策桎梏。年轻又任性准备随时“颠覆医疗”的张锐的所为在他看来，“这真的是个错事。”医院这个治病救人的场所的形成和建立，已经有几百年医学的历史。

而张锐当医患中介不过瘾，居然要在线上和线下联接开办诊所，线下看病，网上卖药，有点想分解医院这个组织的意思。

“为什么有医院？不是要把大家限制在一起，而是需要质量控制。”王杉不是一个保守固执的学者，他担忧的是互联网医疗走入线下的医疗质量和病人的安全，“什么时候春雨医生能设计出一套和现有医院一样能保证医疗质量和病人安全的保障体系，那你将来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新兴的互联网医疗创业者不受传统医疗圈的待见已属正常。之前的10月初张锐也受到圈内知名写手“一医一世界”的“炮轰”，这位身在山东某三甲医院的资深骨科医生张锐认为，虽然医疗需求很大，但市场实际上却很小，因为多数医疗资源都是国有；医疗领域丘壑纵横，资本想统一市场时，必然遇到阻力；而不统一医疗市场，零散的服务获利，资本根本看不上，也就不会



大规模投资；医疗行业涉及人的健康，互联网医疗服务商们要取得患者和配套行业的信任，需要很长时间。

显见的一个事实是，现在互联网医疗创业者们同质化严重，大多做的是争抢号源、导医、预诊、健康咨询为主的一类事，对患者看病难和贵的核心问题束手无策。而好的互联网医疗APP产品对医生来说，也并非低频需求，恰恰相反，“低频主要是医生的骚点没有找到，还没有把自己摆成‘荡妇’的样子，没有撩起医生的‘骚情’！”上述业内人士戏谑地称。

互联网成拯救医改的大招？

大陆互联网医疗创业者们难以成功，不仅是源于类型和功能近似的医疗APP产

品，不能真正有效且大量地掌握医生这一核心资源，也是互联网+医疗始终不温不火的另一关键因素。这一问题是否会随着国家“互联网+”和“新医改”政策的推动，以及相时而动的巨额社会资本的涌入而有所改变，还有待观察。

互联网医疗创业者耗费心血和投资人的巨资，平台上也网罗了一些医生和患者，如微医集团号称已连接国内1600多家重点医院，覆盖三分之二的三甲医院，已有1.6亿患者实名注册。春雨医生也称有9200万用户激活，平台上有公立二级以上的医生41万名，这个数字每天还在刷新。其他林林总总的还有“平安好医生”、“好大夫在线”、“丁香园”、“大医生”等医疗APP也给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不过移动医疗圈的人也心知，问题不在于平台上三甲医生的占比和患者的注册数，而是这些医生的真正服务和服务时间，真实的数字会很难看。《凤凰周刊》记者11月初尝试以患者身份用微医预约平台上的浙江省中医院赵荣祥和杭州市中医院方伟两个专家团队，在按要求填完患者感冒等病情主诉资料后，被告知预约要一周时间，等待一周后，专家的系统显示“加号需求已满”。

如果没有这轮“互联网+”的东风，张锐这些互联网创业者离赴死或许真的不远了。互联网医疗起步已有几年，但形成气候还是2014年以来，大陆宏观政策利好无疑是主因。伴随“十三五”规划建议落地，健康中国正式升级至“国家战略”，以三医联动、医药分开、分级诊疗为核心的健康中国建设成为“十三五”期间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层面，“互联网+”成为深化医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手段。高层的酝酿更早于这个时间点，国家卫生计生委医管中心处长赵靖最近透露，2014年主管医疗卫生的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先后做过两次批示，“要了解我国的移动医疗或者是互联网医疗发展状况”。卫计委在2015年1月份专门组织过一次闭门会，请一些知名互联网医疗企业座谈。

2015年7月4日，国务院专门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消费，加快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养老、社会保障等新兴服务。9月，在卫计委全面启动健康中国建设规划编制工作的同时，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建设的指导意见》，重点强调提升远程医疗服务能力，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医疗资源纵向流动等。

看病难、看病贵，成了大陆民众普遍对政府治理不满的焦点之一，被誉为新时期“三座大山”之一。历届高层多次表态发文试图纾解医疗困境，但几无成效。本届政府总理李克强提出“互联网+”的概念后，在

网络金融、商业流通、交通领域斩获颇丰的互联网技术此时被看好助力医改，对医疗这最后一块传统的市场，互联网能否再行颠覆魔手，各方都很期待。

政策利好趋势下，资本纷纷进场，阿里、腾讯、平安等资本大鳄都以投资、参股、合作形式试水互联网医疗。从2014年开始资本在互联网医疗行业做了大规模的投入，或者说投入增长速度非常快，而2015年的数字增长率应该更高。弘晖资本执行董事姜燕桦近期给出的数字是，上半年的投资总金额是2053亿美元。

2014年5月，卓健科技的创始人尉建锋还在为团队的工资发愁，他的掌上医院APP团队已弹尽粮绝，尉建锋本来打算拿家里的20万元借给公司，去给员工发工资。四个月后，他获得上海一家公司4000万元的投资，而此后仅一月，腾讯又加投项目投资1.5亿元。

2014年以来，在互联网技术发达的北上广、成都、杭州等地，几乎每个月、每周都有各种大小互联网+医疗健康的论坛，投资人、互联网创业者天南海北地聚会，热烈地憧憬着互联网医疗的伟大前景。

马云错了！他错在哪里

众多移动科技企业如平安好医生、春雨医生、微医一般选择介入诊疗服务流程

公共医疗的政策和配套政策不改、医院 GDP 式的考核不变，不同利益纠葛冲击呈撕裂状的医改政策导向下，仅凭几个互联网医疗公司来颠覆医疗体系规则，改变资源配置错位、医疗信息不对称、医疗主体利益分配等现实问题，恐怕是痴人说梦。

前端，通过导诊、挂号、健康咨询等手段在平台上吸纳足够多的用户和医疗资源，再寻求从保险和医药等途径盈利，但这种商业模式目前仍是存疑。

“移动医疗的商业模式现在根本还不存在！”王杉的理由是，现在和医保相关的一系

列医改、药政并没有成熟。王称，2014年美国在移动医疗投了41亿美元，结果却不甚理想，就是因为商业模式根本不清晰。

而互联网巨头阿里一开始就直奔核心——传统医疗体系的重要环节医药营商而去。阿里健康的商业意图很明显，涉足医药电商，打通传统诊疗和网络的关节，民众可以通过天猫医药馆或各种网上药店购买比医院里便宜很多的处方药，实现推行多年的医药分离改革。

阿里这招可谓“釜底抽薪”，一掌瞅准医疗的命门而下，如果顺利的话，解决看病贵这一医疗痛点，就胜利在握了。

阿里选择的第一个试点城市是河北省石家庄市。2014年6月，河北省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医疗、电子商务、云计算等领域开展合作。马云当时表示，“智能药监”是合作的侧重点，希望在医疗领域能取得突破。处方电子化，是“智能药监”信息化管理体系的内容之一，阿里预想以此撬动“看病贵”医疗市场难题。

公开数据显示，万亿规模的药品市场中，处方药占八成，其中药店零售渠道只占到20%。一直以来，在药品分类管理要求凭处方购买处方药的政策下，医院对处方严防死守，厂商资源更多投在销量大的医院渠

道，药店难有更大作为。

有省级政府撑腰，当地几家知名的药店也积极配合，但几次调试后，阿里河北试点最终无法推行下去。阿里健康作为互联网医疗的领头羊，也没有真正找到出路在哪儿，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我们知道马云错在哪里，输在哪里。”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研究员事后总结，有人说医保不支付，这不是主要原因，也不是重要原因，最主要的是医院处方不会外流。对大型医院来说，门诊的药品收入构成它主要的收入来源，而且门诊不仅仅是利润来源，还是医院的前沿哨所，只有足够多的门诊才能支撑足够的住院病人。

电子处方不单是医疗体系难以攻破的内核，还有医院的内部管理和诊疗体系的HIS系统，互联网讲究的透明、高效、无碍的信息联接，以此提高服务效率，而互联网医疗服务商几乎没一家能与医院HIS系统对接，除了医院利益等问题，还有病人隐私权等法律障碍。没有连接，互联网技术无从发挥，医疗体系基本还是铁板一块。

那些互联网医疗企业的高级客户经理跟医院方对接时，需要反复做公关，即使渠道得以进去，也要免费为医院设置一个移动接入端，还要交一笔不菲的接入费，而这些下载在医生手机上的APP，有多少使用率，没人能知道。

内地估计有两三千家三甲医院，这些大的医疗机构HIS系统有多少个版本，无人统计过。卫计委官员赵靖曾经亲自问过一家医疗机构，帮助它们开发软件或者购买软件的公司有二三十家，一家医院尚且如此，何况还有上千家。所以医院即使同意互联网服务商联接医院信息体系，不同版本的端口联接费用也是异常复杂和昂贵。

公立医院的院长们对外来入场者有着天然警惕，这也是出自本能意识。大陆政府对公立医院考核采用的是类似GDP的机制，医院内部的考核指标更是条分缕析，“什么平均住院时间，什么单病人花费，什么药品占比等等，多如牛毛，”内地一家三甲医院不愿具名的医生说，医院指标的指向性也非常明确，医生要多看病，病人多多益善。

大陆公立医院目前的机制似乎是鼓励人多生病、多住院，而不是健康保健、少病为主。当然医疗收入不断增高带来的医院

收入,多数又转化为投资再生产。在大陆各地,能看到不少医院不断盖高楼,买新机器。有些县医院的设备甚至比北京协和医院还好,在河南郑州,郑大附属医院2015年已扩张为有一万张床位的超级医院。

大量的资源和病人都集聚在三甲医院,基层缺少资源。针对农村看不起病的呼声,2009年大陆新一轮医改加入了“农保”等措施,政府也向基层医院投入大量财力用于器材、设备和院房建设,但大部分资源还是继续向城市的三甲医院汇集。赵靖发现,现在不管是乡镇卫生院还是城市里的卫生服务中心,都没有接生孩子的业务了,而在十几、二十年前,农民去乡镇卫生院生小孩还是稀松平常的事。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蔡江南教授曾统计内地医院增长的情况:800张床以上的医院从2005年开始增长速度最快超过300%。三甲医院只占大陆整个医院体系的7%,但是占了整个门诊业务量45%、住院量的35%。

大陆的医疗体系呈现倒金字塔结构,位于上面的是为数不多的三甲医院,庞大的农村乡镇医院和城市社区医院处于底层,所有的人员资源都向上流动。这种现象近年来“没有改观,而且继续的加剧”。

撕裂的大陆医改

民众普遍反映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政府几番折腾,非但没改观,反而愈演愈烈。医改难以推进,阻力不止医院一家,更是错综复杂的各种因子的集合,目前已形成的中国特色的医疗体制,形成非一日之功。如果要深究医改难的顽疾,这些根子不可不察。

资深医疗人士“一医一世界”曾撰文分析,在内地,各个县城的县医院是由县财政主办,地级市医院有地级市财政出钱,国家级医院是国家资源在支撑。在早期,县城里的党政机关干部看病都是去地级市医院。普通机关干部、企业中高层、教师等县城主流阶层如果生病也会托人找关系到地级市医院看病,也就是说县医院的技术水平很难被主流阶层完全相信。

政府官僚们和富人不经意间用脚投票的举措,或许导致县级医院医生的分流,很多好的医生努力向地级医院或省三甲医院调动,而对乡镇医院和村医来说,当县城主流阶层人员都去地级市后,县城必须从乡镇上搜集病人来填满床位。在强势县医院的影响下,乡镇社区医院完全萎缩,人才匮乏。

“当各个县城较有经济收入的病人转到地级市医院后,地级市医院的病人就有两种人群:一个是本地土著,一个是慕名托关系来的县城病人。”他说,地级市医院的医生一般感觉小城市生活不错,节奏不紧张,收入也可以,很安定,而且竞争压力要小于北京、上海,那些麻烦的病人就转给上级医院了。而省会城市和北京、上海的医院重视科技领先,在乎品牌,慢慢地“一级医院一级水平”就成为行业真理了。

在内地,中央自上而下建有一套完备的领导干部保健体系,省级有专门的保健办,专为省委书记、省长们服务的保健办不仅有副省级官员兼任,一般还从三甲医院抽调数十至上百名顶级医生组成专家组,全力保障,悉心服务。省会重要城市三甲医院的形象和名气由此更加鼎立不可破了。

卫计委官员赵靖在日前的一个互联网医疗健康论坛上开玩笑地问台下广东省卫生厅巡视员廖新波,她说,“廖厅如果生病了,第一个想到的恐怕也是去大医院吧!”“领导干部都如此,我们为何要老百姓有病不要往大医院挤呢?”赵说道。

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必然导致病人流动的“抽水机”现象,病情复杂、有钱有权的病人往上走,基层医疗机构则只能做些一般的接诊工作,医护人员也自甘如此,形成恶性循环。而医生的培养机制亦有弊端,内地医学院学生往往以能进三甲为荣,进了社区医院和乡镇医院的,医技水平很难提高,也很难交流到大的医院。

但在国外却相反,美国克莱顿著的《创新者的处方》一书中提及,美国政府对医护人员工资控制很紧,所以最优秀的医生都会选择在私人医疗机构工作,因为通过向富人提

供医疗服务,他们可以赚取更多的收入,而医生仍可与大医院有诊疗合作关系。

在其他国家80%的门诊都在诊所解决,80%至90%的诊所都是私立的。中国完全是另一回事,私立医院很少,精英们除了待在三甲医院,无私立医院可去。

中央政府虽有进行大规模的医疗体系改革实验的意愿,如提出“分级诊疗、2017年大病不出县”等要求,但公共医疗的政策和配套政策不改、医院的GDP式的考核不变,不同利益纠葛冲击呈撕裂状的医改政策导向下,仅凭几个互联网医疗公司来颠覆医疗体系规则,改变资源配置错位、医疗信息不对称、医疗主体利益分配等现实问题,恐怕是痴人说梦。

大多数公立医院并没有动力拥抱移动互联网医疗,医院关注的收入、规模、科研,并不是移动医疗能解决的。“实际上是处处有难题。”数次参与医改方案的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说,医改是各个部门一起合作,都要考虑各方的利益,所以最后出台的政策可能不会让大家满意。

以电子处方试点为例,赵靖透露,该项改革由发改委牵头,几个部委参与,方案制定之初曾经试图在全国选几个城市做试点,但一直没有签出来。“当时征求了几个部委的意见,我个人是同意的”。

廖新波近期在一次论坛上也表示,广东出台的《促进医生多点执业指导意见》,最初有打破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医生的执业问题,允许医生到基层、到民营医院自己开诊、自己建立工作室。但廖新波最近得知,这些规定目前都消失了。呼吁医生多点执业、培养网上全科医生、推动医生和医疗资源下沉,是廖新波一直在干的事,但按现行执业医师法,医生只能在所供职医疗机构行医,否则是违法行为。

倪剑文预见,互联网医疗之路今后都会很难,“不能期望一次性全面突破”。而春雨创始人张锐则表示:一切新事物的出现看起来都像一个笑话,我们埋头少说话、多做事,做一些大家现在看不上的事。☉

人口政策 至少应超前一代人



梁建章

携程旅行网联合创始人、
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

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实施普遍“二孩”政策，这当然值得庆祝。

但我认为普遍“二孩”政策还是不够的。中国现在应该完全放开生育，而且要鼓励生育。

或许很多人士现在还不能完全接受这个观点，他们会担心，如果放开生，中国家庭会生多少个？环境问题怎么办？能源、水、耕地等资源问题怎么办？

其实，我们在这些方面一直有很多误解。讨论人口政策要根据二三十年后的发展水平而定，那时中国早已不是劳动密集型经济，而是效率型、创新型经济，资源环境等问题也将大幅改善。如果按照20年一代人计算，人口政策的制定至少应该超前一代人。

完全放开生育也不够

有人担心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生育率就会大幅反弹。这种担忧完全不必要。

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1.5以下，也就是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了不到1.5个孩子，远远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这意味着每一代人比上一代减少30%。上海户籍人口的生育率甚至已经降到世界最低的0.7左右。

所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需计划生育，也都伴随生育率的下降，欧美、日本、韩国等的生育率都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经济水平低于中国的越南、泰国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4-1.8。2006年中国一次抽样调查显示，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中国实行二孩政策的四个试点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都是落后地区，生育率也只在1.8左右。

所以真正要担心的是，完全放开后，生育率仍远达不到更替水平。完全放开后，乐观假设15%女性选择“一孩”，50%选择“二孩”，20%选择“三孩”，15%不孕、不婚或丁克，最终的生育率也只有1.75。

事实上，中国“80后”、“90后”生育观念已经转变，生养成

本又奇高，农村青年大多在城市工作生活，抚养压力和生育观念也正与城市趋同。韩国、日本的生育率只有1.2-1.4，同是华人社会的香港、台湾、新加坡的生育率只有1.1左右，这些地方都还鼓励生育。完全放开后，中国大陆的生育率更可能接近这些地区。

我们曾经估算（用高估法），如果2014年完全放开生育，新生儿数量将由2013年的1600万人，反弹到其后5年的2600万、2300万、2100万、2000万、1900万人，即使2014年峰值也低于1990年水平。

而且，在出生人数经历短暂补偿性反弹后，新生儿数量又会雪崩式下滑，因为“90”后育龄女性急剧减少，这背后是中国1990年代生育率的快速下滑。

就算中国能够把生育率推回到2.0，未来人口峰值也不会超过14.5亿人。

总之，完全放开生育并无风险。最关键的是，不应把孩子增加当成洪水猛兽。大多数国家都明白，孩子是最宝贵资源，自然资源可以从市场购买，唯有孩子只能自己生养。即便应对出生反弹需要一些付出，但未来的报酬将远远超出这些付出。一个不愿为孩子付出和投资的

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现在大多数低生育率国家都有鼓励生育政策。如果中国政府想摆脱低生育率陷阱，也必须鼓励生育，比如：实行生育补贴政策；增加幼儿园供给，彻底贯彻12年甚至16年义务教育；严格实行带薪产假政策等。

但以上政策也只能使生育率略有提升，因为多生一个孩子，家庭要付出太多的成本。很多国家因此不断提高奖励砝码。

所以普遍“二孩”政策还远远不够，中国政府除了全面放开生育，还必须马上研究实行各种配套鼓励政策。即便现在鼓励也早已滞后了，因为绝大多数国家当生育率降到1.6以下时，都已经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中国在10年前就已经在1.6以下了。

如果还不立即大幅调整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会继续快速下降，最终成为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人口政策的目标应该是维持人口结构的基本稳定，尤其是维持未来年轻人数量的基本稳定。

人口是资源瓶颈？

在中国，听多了“资源瓶颈”的论调，认为中国人多仍是主要矛盾。

讨论人口政策要根据二三十年后的
发展水平而定，那时中国早已不是
劳动密集型经济，而是效率型、创新型
经济，资源环境等问题也将大幅改善。



但过去40年顶级经济学杂志里，几乎找不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瓶颈关系的论文。几乎没有国家是由于资源瓶颈而发展受阻的。世界上有很多人口高密度的富国，如日本、西欧等，也有很多低密度富国如美国、加拿大，有很多低密度穷国如非洲和拉美国家，也有高密度穷国如越南、印度等。可见经济发展与人均资源多寡之间没有多少联系。

中国大多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确实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这有很大误导性，由于世界资源分布极不均匀，少数资源富国拉高了世界平均值，导致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用联合国统计署的耕地、淡水、森林、石油、煤炭、天然

气的数据来说明，以耕地为例，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人均占有量少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有167个。而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分布更不均匀。中国上述各项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处于世界中间或靠前位置。

资源丰富也许可以短期致富，却无法长期强国。靠出卖自然资源度日的国家就像依靠遗产生活的年轻人，长此以往将丧失上进的动力，如不转型，迟早会衰败。中国若能维持足够的人口，就能以人口规模和集聚效应所带来的经济效率上的优势来换取他国资源，让一些资源富国依赖中国。这种互相卡位的结果最终将有益于中国。

总之，随着经济发展，人所创造的价值相对资源的贡献越来越大。靠减少人口缓解所谓资

源压力完全是本末倒置，这会让我们一个有望靠人的才智创造高附加值的经济体向出卖初级资源的低端经济体的方向退化。

人口的环境误区

有人以雾霾、交通拥堵等环境问题以及房价高、入学难等来证明中国人还是太多了。这同样是误解。

日本、德国在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承载密度上都远高于中国，但他们的空气质量远好于中国。伦敦、洛杉矶的例子也都表明，空气质量改善和人口增长不冲突，提升环境不需要减少人口。1950-2000年，洛杉矶都市区人口增长245%，燃油也增长数倍，但同期空气质量却大幅改善。

1980-2012年，中国年能耗

增长逾400%，而计划生育只少生1亿-2亿人，相对幅度不到15%。如果能承受能耗增长400%的环境压力，降低15%人口有何实质意义？如果用同等力度提高能效，缓解环境问题的效果又岂是降低15%人口所能比拟？

有分析表明，所在国人口减少一半所对应的空气质量改善只相当于人均GDP增长9.1%。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研究数十个国家发现，几乎所有环境指标，都会在一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附近时开始好转。

城市的拥挤则是效率提升的代价，与全国人口规模关系不大。中国大城市的拥挤程度在全球只属中等水平，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低。而且经济越发达，越有意愿和能力改善拥

完全放开计划生育后的生育率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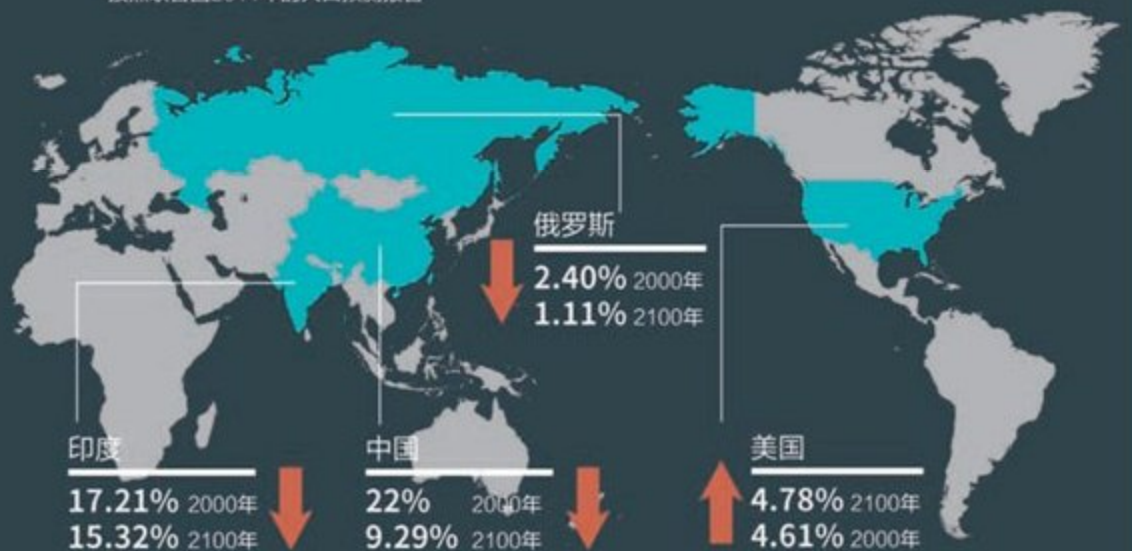
生育选择人群占女性人口比例



数据来源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中美俄印占世界人口比例预期

按照联合国2011年的人口预测报告



挤状况。分析表明,所在国人口减少一半,拥挤度降低6.8%,但所在国人均GDP高20%,拥挤度要低7%。俄罗斯、日本的经验则表明,若人口衰减,人口分布会更不均匀,大量中小城镇衰败,年轻人更会涌向大城市。

中国很多城市的拥堵更多是由于规划、布局和管理不善,比如北京至少应规划4000万人。高房价是由于发展模式、分配机制和金融政策等造成的,入托和入学难则是由于教育资源投放与教育体制问题。

总之,中国资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GDP至上的片面发展观及政绩考核体制。我们不去直面真问题,却把人口多拿出来做替罪羊,只会产生误导,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人是一切问题的解决者,任何把人本身当成问题的说辞与其说是解决问题,不如说是在为制定更不公平的、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寻找借口。

而且资源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各国在谈判中都坚定维护本国利益,又岂能通过减少本国人口来拯救自身、拯救世界?这充其量是把我们在全球公共资源上应用的份额让给其他国家。

讨论人口政策要根据二三十年后的发展水平而定,现在每年多出生几百万人正好能满足那时对中高端人才的大量需求。如果那时中国像现在的日本一样人口严重老化,只会适得其反,那样会降低国家的创新和财政能力,从而削弱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能力。

人口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

一国的经济竞争力,最终取决于人才的数量与质量。我在研究中也发现,中等以上国家的创新能力与年轻人口的比例密切相关。当一个国家人口老化时,最适合创新创业的年轻人不仅数量减少,能力也会下降,因为这些年轻人在老化

的社会和企业中得不到足够的历练机会、晋升机会和人脉关系,一国的创新活动就会减弱。日本20多年的衰退就是一例。

有人会说,创新依靠的是精英中的精英,不需要庞大的人口基数,只要集中资源培养少量精英即可。这种观念是错误的。首先,中国经济需要庞大规模的各类高技能人才。其次,没人能预测哪个小孩将来会成为顶尖人才,天才的分布是随机的,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普及中、高等教育,使天才最终冒出来,天才的数量根本上取决于年轻人的规模。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人口规模始终占据世界人口的1/5-1/4,这是中华文明雄踞世界的最基本基础,虽然单单人口规模无法保证文明长盛不衰。但是庞大的人口规模、合理的人口结构、不断提升的人口素质,与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结合,无疑是科技创新的源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

按照联合国2011年的人口

预测报告,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会由2000年的4.61%微升到2100年的4.78%;俄罗斯由2000年的2.4%下降到2100年的1.11%;印度由2000年的17.21%微降到2100年的15.32%。中国若保持1.8的生育率,2100年中国人口会降至9.4亿人,占世界人口比重为9.29%,若保持1.5的生育率,中国人口会降至5亿人,占世界人口比重只有5%,届时15岁以下人口不足10%,65岁以上人口将超过40%。

由此可见,在21世纪的大国竞争中,中国未必能笑到最后,甚至只会昙花一现。随着年轻人迅速减少,中国人才规模的世界冠军将在本世纪中叶让位给印度,如果美国能继续吸引全球人才,美国也将再次超过中国。

总之,中国人口政策到了彻底放开、鼓励生育的时候了,中国人可以多生,需要多生。

(采访整理 记者/赵福帅)

□ 编辑 王毕强 □ 美编 青年



中国首家根雕文化主题酒店

浙江开化醉根山房圆满落成

文 / 章乐一

白石曾言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开化根雕艺术之美在于尊重自然形态前提下，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和独创性，“七八分天成，二三分人工”，雕与不雕间巧妙融汇，讲究一种恰到好处的艺术表现。

近年来，浙江开化县大力挖掘、打造根雕文化，积极开展根雕工艺的传承和保护。特别是经徐氏根雕传人徐谷青的不断创新、不断开拓，让开化根雕成为在东阳木雕、青田石雕、黄杨木雕之后的浙江第四雕。2001年，开化县被授予“中国根雕艺术之乡”。2006年投入亿元资金打造中国根博美术博览园，暨后来的根宫佛国文化旅游区。2007年“开化根雕”被确立为省级非遗保护代表作名录。“世界根雕在中国、中国根雕看开化”，根雕已经成为开化县的一张金名片。

根宫佛国文化旅游区，是由工艺美术大师徐谷青先生精心创作。这里山水灵秀、人文丰厚，景观独特，是让人震撼的世界唯一的根文化主题旅游区。开化县交通便捷，处在黄山、三清山、千岛湖等旅游区的旅游金

三角中心，是皖浙赣闽四省旅游集散中心之一。根博园是由千年树神铸就的神秘艺术殿堂，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园”。是一处寻根探源山水文化旅游胜地，有福门祥光、云湖禅心、集趣斋、天工博物馆、根雕佛国、醉根宝塔、历史文化长河等近三十个景点，陈列有世界上最大的根艺释迦牟尼佛造像和680米长的巨型根雕五百罗汉阵，以及根艺文献资料、根艺名家名作，工艺流程和醉根文化展示等，是一部根艺美术的四库全书。目前，根宫佛国文化旅游区已经成为中国最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胜地、国家5A级旅游景区。

作为根宫佛国三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醉根山房主题酒店是全国唯一一家根雕主题酒店，由衢州醉根艺品有限公司投资建造，董事长、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徐谷青亲自设计。酒店依山而建，林木荫郁，占地面积1999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3300平方米，主体布局参照北方四合院的围合结构。内部装饰与根艺巧妙的融为一体，以根雕、

禅修、养生文化为主题。酒店设计取自然之势，溢自然之趣，在树木葱茏间依山而建，沉稳大气的汉唐风格彰显出卓然不凡的皇家贵气。穿过酒店大堂入口“福门祥光”，便进入了根雕大千世界：仿古花篮艺术制作的大型根艺“宫灯”高高悬起，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根雕身上的窟窿、疤痕、瘤结、裂痕等肌理，在经过艺术大师妙手雕琢后，展现出沧桑、古朴、野趣等多种艺术美。在这里，代表东方传统文化的根雕艺术和现代酒店时尚风格如同血脉相溶。

醉根山房主题酒店有客房145间，其中包括总统套房、家庭套房、豪华套房、豪华亲子间、豪华大床房、高级双人标准间等。有不同风格的餐厅3个，餐位500余个。为接待商务和会议客人，酒店单独设计建造了醉云阁会议中心，共有大小会议室和接待室9个。酒店餐饮利用浙西山区丰富的山珍食材资源，借鉴本地农家手法，烹饪最生态、最健康、最地道的山珍土菜，推出醉根山珍菜系特色品牌。

一座优质酒店，除了给人舒适、豪华的放松享受外，独居匠心的设计是酒店吸引消费者、立足市场的根本。醉根山房是座有着自己“魂”的酒店，其将根雕艺术、禅学文化、国学文脉、中国古建筑艺术结合在一起，运用根雕作品、老房老木、园艺小景等精巧布置，和现代化酒店设施相结合，呈现出一个令人震撼、别开生面的根雕主题文化酒店，这在全国而言当属“孤本”。

酒店在环保技术在浙西首屈一指的，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客房配备低调奢华，独具根雕特色的床具及配套设施，古朴典雅，清新自然，充满了诗情画意。住在这里可一览浙西群山，鸟瞰开化全城，远观岚霭蒸腾，近赏葱茏绿意，细品奇根异木，漫谈闲适人生，令人心旷神怡，陶然中产生一种繁华如梦、淡泊澄心、回归宁静的高隐情怀。

开化根宫佛国巧妙地以根雕艺术、盆景艺术，赏石文化与园林古建为载体，融华夏上下五千年历史璀璨的文化于奇根异木，构建了一幅恬静优雅、天人合一的画卷。景观资源独一无二，在国内外旅游旅游区中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是艺术之根，文化之根，民俗之根，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

给中国的“扎克伯格”们 打开做慈善之门

慈善捐赠是一种完全自发自愿的活动，
应出于个人本心而非强迫，行善应受表扬，
不行善不应被惩罚。而当我们
强迫别人行善的时候，其实是在作恶。



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2015年12月1日，美国社交网站“脸书”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宣布，他和太太普莉希拉·陈的第一个女儿麦克斯诞生。晒出全家福的同时，扎克伯格表示将家庭所持“脸书”股份的99%，约450亿美元捐于慈善用途，此举再次掀起人们对中国企业家慈善捐款的热议。相对于关注企业家如何使用巨额财产，建设怎样的慈善环境，令公众不分阶层，皆乐意参与其中，或许更为切题。

为何美国人更慷慨

慈善捐赠是一种完全自发自愿的活动，应出于个人本心而非强迫，行善应受表扬，不行善不应被惩罚。而当我们强

迫别人行善的时候，其实是在作恶。中国慈善事业的制度环境尚不健全，存在很多约束。如果让捐赠人觉得捐款像割肉一样痛苦，那他还怎么会愿意捐赠呢？

中国企业家的财富积累还没有到达美国的阶段。更重要的是，要想让企业家们慷慨捐款，首先需要有一个有利于创造财富的制度环境。美国每年慈善捐款约有3000亿美元，超过芬兰、葡萄牙、秘鲁等国的GDP，其中3/4来自私人捐款，1/4来自公司和私人基金会。70%—80%的美国家庭每年都做慈善捐款，平均捐款额超过1000美元；50%—60%的美国人每年都提供志愿者服务，平均接近50小时。以人均算，没有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的慈善捐款和志愿者服务时间接近美国，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了。

为什么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慷慨？原因不仅仅是美国人富有。富人确实给出更多的捐款，但按占收入的比例计，在美国，有工作的穷人的捐款比例高于富人和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数据显示，慈善行为与人们的意识形态和对政府作用的信念高度相关。

有调查显示，相信自由市

场制度的人比相信大政府主义的人更慷慨，无论用捐款额还是志愿者服务时间衡量都如此。2002年有一个调查显示，与认为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钱太多的人相比，认为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钱太少的人更不愿意献血，更不愿意为陌生人指路，更不可能返还收银台多找的钱，也更不可能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品和金钱的帮助。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原因在于，主张大政府主义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政府的责任，和自己没有关系；而相信自由市场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每个人的责任。

慈善源于私有财产制度

我想纠正大家一个误解，就是私有财产和人的慈善活动的关系。我认为慈善本身就是私有财产制度下的一种产物。如果没有私有财产制度，慈善亦不会存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阐明此观点。

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主张公有制，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划清了各人所有的利益范围，人们相互间争吵的根源就会消除，人们的博济公益精神反倒会增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施舍、

节制和慷慨是人们对待财产的健康的态度。但这些品德的培养以人们占有私有财产为前提：“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欣悦；只有在财产私有的体系中才能发扬这种乐善的仁心。”而在财产公有的条件下，“人们就没法做出一件慷慨的行为，谁都不再表现施济的善心。”

亚里士多德讲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在实行私有财产制度的社会，人们不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有了慈善的心；而在一个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中，人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慷慨之心。道理很简单，人首先得有能力才有慈善之心，公有财产制度下没有任何人有财产，所以也就不可能有慈善之心。更重要的一点是，公有财产制度导致了严重的不公平，在这种不公平的情况下，人们对社会充满了怨恨，也就不可能真正去做慈善。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史学家司马迁也讲过类似的话：“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也就是说，过于贫穷不太可能有慈善，人富了以后才会乐善好施。其实整个社会也一样，极度贫穷时，人们可能为了吃一点东

西而争斗;富足以后,人们就会产生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需求,去做一些“我认为正确的事情”。现在国际社会正在兴起社会企业运动,这是慈善事业发展趋势。企业家把企业做好,就是对社会最大的慈善。如果比尔·盖茨没有把微软做成功,哪来的盖茨基金会?就社会而言,一个人捐款越多未必是一件好事。如果马化腾把财富都捐出去,然而公司垮了,腾讯的用户都会受到影响。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并没有实现同等程度的提升。我当然不赞同那种认为现在的道德不如改革开放前。那时随便抓人、斗人、甚至杀人,大家都习以为常,甚至欢呼雀跃。现在大家看到见死不救,已是群情激奋地谴责,这应该说是进步,至少说明我们的道德意识在复苏。

应该说,今天的道德问题既有历史也有现实的原因。今天的病许多是几十年前埋下的祸根发作。道德破坏容易,恢复则需很长时间,最重要的原因仍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对私有产权制度的破坏。如前面提到的,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一定会引起人的道德堕落。

给慈善松绑

中国慈善事业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和宗教一样,就是不自由。连和尚都有局级方丈、处级住持等行政级别,一个人如果不是出于信仰去当和尚,那怎么



扎克伯格全家福

可能还有宗教的力量?慈善事业也一样,必须是有使命感的人来做,吸引愿意投身这项事业的人来做这项工作,并保证其资产按照既定的使命去运作。这和政府的运作逻辑是完全不同的。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无论是商业公司还是慈善事业做起来都不太容易,共同的原因在于政府长期以来对资源的垄断。在西方国家,很多属于正常的自由的市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只有通过慈善的方式来解决。就像所谓的小额贷款的问题,因为西方相对金融比较自由,所以美国有几万家银行,大银行负责大企业,小银行、地区银行、社区银行,就可以负责社区企业的融资。但是在中国,金融垄断比较严重,很多服务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有需求的普通人,稍微冒一点险就可能踏上非法集资,所以这个时候就迫使茅于軾教授不得不用慈善事业的形式来运作小额贷款项目。

但是现在有些人打着小额贷款旗号放大额的贷款,一贷就是200万以上。好多人申请到小额贷款的牌照后做的不是真正的小额贷款,把小额贷款的名声搞坏了。所以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是商业事业还是做慈善事业,其实都面临很大的挑战,我们相互之间信任度比较低,机构很难靠自己的声誉成长起来。这是很可悲的。这是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简单地说,公益活动应该更加自由化、市场化,而不是政府管辖。最近几年好多官办的慈善机构都出了丑闻,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它就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变成安排官员的地方,所以名声也越来越差。所以还是要用市场的方式去发展慈善事业。真正的慈善一定是自由市场体制下产生的。

当然,市场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不要因为某一个公益机构出了一点问题,就去否定它,如果市场一出点问题,政

府就赶快管起来,市场就老出问题,最后就没有市场了。在有些情况下,市场可能没办法正常运作,所以就会出现非市场的或者说半市场的体制,但是必须要尽快恢复市场体制的运作,这才使得慈善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汶川地震时,灾区方便面、矿泉水、牛奶等各种食物浪费得不得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市场不工作,好心不一定办成好事。你捐一百万块钱,可以通过市场需求有效地运作,如果市场失效,只能盲目地到处送方便面、矿泉水,并没有效率。

总之,慈善事业应该是市场的事业、个人的事业,而不是政府的事业。中国的慈善事业要想真正脱胎换骨,一定得依靠民间力量。政府不应该介入,那些政府机构应该尽量退出来,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以那种错误的方式应对,还是要以法治的原则去解决问题。



一位母亲的迷雾

王朝抢劫疑案后续

记者/郭天力

王朝的母亲杨惠贤。

轰动一时的王朝抢劫疑案4年中先后经历10次裁决，王朝的申诉于2015年10月中旬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河北高院）正式受理。此前媒体披露，此案主办人为“我爸是李刚”事件中的主角——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刚，舆论再次聚焦于此。

王朝入室抢劫案的多个疑点，自案发9年来被律师和司法学者反复质疑，在法院的判决和律师的辩护中，王朝呈现出完全撕裂的两种不同面目：他是处心积虑、手段残忍的持枪抢劫犯，还是无辜落入无尽黑幕的倒霉蛋？多年的法律较量，结局何去何从？一如笼罩在石家庄这座城市的雾霾一样，尚难捉摸。

再揭谜团

河北高院受理申诉后，多年来为儿子奔走“洗冤”的杨惠贤看到了希望。63岁的杨惠贤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她额上横着的皱纹，刻进去似的再也舒展不开，左眼眉毛上还有一道清晰的疤痕，这疤痕是3个月前留下的。

那次她去保定太行监狱看望儿子王朝，听到一位狱警说“你们这些犯人……”杨惠贤觉得心里被猛抽了一下：“我的儿子不是犯人，我更不是犯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口气和我说话？”但她心里的辩驳无济于事。王朝的“罪行”写在了多份法院判决和裁定上——尽管河北省高院两次审理均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自从王朝2006年被抓走以来，杨惠贤孤身一人为了儿子奔走呼号，“抢劫犯”的标签依然死死钉在儿子身上。那天，杨惠贤在监狱门口失声大哭，只觉得眼前一黑，整个人面部朝下摔倒在地，顿时鲜血直流。她已感觉不到疼痛，只挣扎着站起来，跟

踉踉跄跄来到附近的一个小诊所做了简单包扎——袋中空空，已没有钱做缝合手术了。

2006年8月11日中午12点10分，河北保定发生一桩抢劫案，王朝被警方认定为劫案凶手，然而各种硬伤备受律师和舆论的质疑，最为醒目的疑点是，王朝“没有作案时间”——一份交通事故处理文件显示，当天上午和下午，王朝都在石家庄处理交通事故。但审判环节中，法院并没有采纳这一证据。2007年12月，保定市北市区法院一审认定王朝犯抢劫罪，判其有期徒刑13年。从那时起，王朝和母亲杨惠贤开始反复的申诉。

原审裁决认定王朝犯抢劫罪的核心证据是手机通话清单，警方认为此清单可以证明王朝在劫案现场。然而保定北市区法院在一审中，未将北市区公安分局出具的通话清单列为证据——该清单并非移动公司原件。北市区公安分局在一份说明中称，该局办案人员曾多次找到石家庄市移动公司，要求其在这份清单上盖章，但移动公司始终拒绝盖章。北市区公安分局称，这份通话清单“与原件无异”，但蹊跷的是，河北省高院在王朝案的审理报告中介绍，高院曾就话单问题询问北市区公安分局办案人员，办案人员称该话单是调取移动公司存储器内数据后“加工整理而成”。

王朝的律师也没能拿到通话清单原件，因为他们没能及时见到王朝。曾担任王朝代理律师的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振荣回忆，北市区警方一直拒绝安排会见。

**对突然改口的原因，
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邢世平
委婉地向媒体透露：
“不这样说，不让你走。”**

保定北市区公安分局王朝案一位办案人员称，这是因为局领导未批准，个人无权安排律师会见。而时任北市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的李刚则告诉王振荣：王朝不认罪，不能会见律师，这是市局领导意见。

为此，王振荣先后多次给保定市检察院和保定市政法委写材料，要求尽快依法安排会见，但直到王朝被抓两个多月后，他才与另一位律师一起见到了王朝，随后立即赶到石家庄移动公司打印王朝的手机通话记录，但当时的移动公司只能保留3个月的通话记录。

“如果北市区公安分局遵守法律，律师得以及时见到王朝了解事件原委，还能赶在3个月到期之前拿到合法的通话记录，但由于耽误了最有利的时机，日后，辩护律师只能质疑保定警方通话清单来源，自己也拿不到真正的话单。”杨惠贤至今对此难以平复，“这个案子，从最开始的律师会见环节就开始出现他们所谓的‘瑕疵’。”

此后不久，王振荣和杨惠贤在王朝的抽屉里意外发现两张处理交通事故的票据，票据上明白无误地显示：8月11日。看到票据，王朝一下子回忆起来，当天他和河北省地税局科级干部邢世平等人在石家庄市桥西区事故处理大队处理交通事故。“他当天根本没有在保定！”拿着票据，杨惠贤的手都发颤。

这一意外的收获让杨惠贤和律师们兴奋起来。2007年3月，他们第一时间找到了邢世平，为其做了第一份笔录，5个月后，又做了第二份笔录。邢世平在两次谈话中详细说明，他和王朝在8月11日上午在处理车辆验损问题，“一块儿办的车损鉴定，一块儿办的调解，一块儿提的车。”此外，王朝的朋友孔令某、赵铁某等人均签字证实，8月11日中午，王朝曾借钱交验损费用，并在



← 王朝早年和母亲在旅行中合影。

朋友家中吃饭。但不久后，这些重要证人要么彻底改口，要么改称“不知道”。

办案人员给邢世平等多名人证做的笔录时间显示，录口供时间为9月2日凌晨两点至四点之间。这些笔录竟然是在北市区人民法院最后一次开庭当天取得，而按照法律规定，此时公安机关早已过了补充侦查的期限。对突然改口的原因，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邢世平委婉地向媒体透露：“不这样说，不让你走。”他同时承认，不管是给王朝律师的签字，还是给公安的签字，都是他签的。

这样矛盾的表态一度让杨惠贤难以接受，“作为共产党员怎么可以这样？”曾做过单位党委书记的杨惠贤始终不明白，为此，她曾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寄给同城的邢世平，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复。王朝被判刑后，杨惠贤接到了孔令某的电话：“阿姨，公安成天到单位找我，领导觉得影响不好，不让我干了，我现在也没工作了。”不久，孔和赵先后换了手机号。

“我理解他们。”杨惠贤眼圈红了，“他们摆脱了警方的压力，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到我们家。”

祸起商业纠纷？

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的证据也曾被保定市北市区人民法院质疑，2007年，当时一位主审法官出具了一份详细的审理意见，题为《指控王朝犯抢劫罪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除了采纳王振荣对邢世平等人的笔录外，还认为，公安指控王朝有罪的一份重要证据——通话清单，来源不明，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同时，对关键物证指纹的来源也提出质疑，认为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此外，一审阶段法官提出，华电小区发生的抢劫案受害人是保定市二院的医生陈英茹，时年50岁，文化水平高，头脑清楚，但是保定公安始终未让受害人直接辨认王朝，而仅仅让陈英茹辨认照片、衣服等物品，但陈英茹全都未能辨认，“为什么不让受害者直接辨认王朝真人？”身处狱中的王

朝连写多封信，恳求陈英茹对其辨认。“因为得不到回应，王朝近乎哀求：如果陈英茹认为当天抢劫的就是他王朝，那王朝死也认了。”杨惠贤说，但是，身为医生和知识分子的陈英茹拒绝当面辨认。

杨惠贤也通过各种关系找到陈英茹，“有一次，她的丈夫、华北电力大学体育教学部教师李全化几乎同意了辨认，最后关头，对方忽然反悔，说受到外界压力。”媒体记者也曾多次要求采访陈英茹，但李全化以“别再骚扰我们”为由，拒绝接受采访。陈英茹报案后，数次向警方提及，持续作案40分钟的抢劫者操保定口音，但王朝自小在石家庄长大，一直说普通话，并不会说保定话。

认为判王朝有罪“于事实不符、于科学无据、于法律无缘”的法官，很快被换下。杨惠贤两次找到北市区人民法院要求给出中途换法官的理由。“第一次，院方说要让年轻有为的法官上，但新换的法官与被换的法官年龄相当，我不认可这种说法，法院又改口称，原来的法官不利于被害人。”听到这样的表态，杨惠贤不能理解，难道法院审判不是以法律为依据，而是以被害人的好恶为依据？“这是哪门子法律？”此后，北市区人民法院对外宣称，该法官面临退休，所以被撤换了，实际上，这位法官是在王朝案一审宣判后一年才退休，而且未到法定退休年龄。一年的时间完全可以审完该案。

最终，新换的法官将原来的审理意见全盘推倒，王朝一审获刑13年，并处罚金2万元。到底是什么力量左右了主审法官被替换？为何有这么多人先证明王朝当天在石家庄，后来又陆续改口？杨惠贤认为，这起飞来横祸早有端倪，杨惠贤多次向媒体陈述，王朝被抓前，曾因一笔涉及鹿泉钢铁厂的160万工程款与合作伙伴李氏兄弟发生了

纠纷,李氏兄弟曾找到杨惠贤,称王朝如不给钱就找公安抓他。

杨惠贤提供的资料显示:李氏兄弟籍贯保定,原为河北省交通厅下属公司干部,后双双辞职下海,和王朝一起合作电力工程。该兄弟二人有一亲哥哥,为河北公安系统一基层单位领导。杨惠贤进一步解释,王朝承揽了鹿泉钢铁厂的一项工程,李氏兄弟也在这一项目中有投资。当时钢厂与王朝约定,工程完工打款只打给王朝。工程临近结束,公司会计发现有一项65万的开销没有票据,为此,李氏兄弟要求王朝承担此项开销。王朝拒绝,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在工程款即将拨付前一周,王朝蹊跷被抓,而鹿泉钢铁厂拒绝将款项支付给李氏兄弟。

鹿泉钢铁厂后来宣告破产。一份2010年1月的鹿泉法院文书显示,已破产的鹿泉钢铁厂债权人名单中,有三项与王朝有关,其中,与李氏兄弟有纠纷的一项涉及160余万。这160万的工程由石家庄市易和丰科贸有限公司承接。《凤凰周刊》记者查询发现,易和丰公司如今仍在运营,李氏兄弟仍任职其中。该公司法人代表许某向本刊记者承认,王朝是易和丰在鹿泉钢铁厂业务的介绍人,2006年8、9月间,易和丰与王朝发生商业纠纷,“后来报了公安,公安那儿有备案。”

杨惠贤告诉记者,2007年一审结束后,几位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的民警找到

她,塞给她一封信,这封打印在A4纸上的信件题为《关于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刚为朋友泄私愤办理冤(冤)假错案的举报材料》,信中称,李刚为朋友李某报复,将无辜公民王朝投入监狱,特向领导反映此事,望引起重视,依法查处。但此信并无落款签名,当事民警亦无法接受采访。

舆论一度质疑李氏兄弟与李刚有关联,但李氏兄弟均否认认识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刚,李刚亦向媒体称,从来不认识石家庄易和丰公司的人。

狱中吞钉

王朝与李氏兄弟发生纠纷时,杨惠贤说,她将20万存款转给了李氏兄弟的大嫂,之后又送去了10万现金。至今,她仍然保留着当时的转账凭条。王朝被抓后,杨惠贤四处聘请律师,又陆续花费了20万。小区物业了解到她家的情况,也不上门收物业费——杨惠贤已负债十几万,囊空如洗,把能借到钱的朋友都借遍了。

如果王朝没有被抓,杨惠贤一家仍过得安逸富足——9年前,王朝在石家庄开着两家公司,做电力设备安装生意,生活富裕,儿媳也乖巧孝顺。“王朝被抓后,鹿泉钢铁厂也不再结款,即便李氏兄弟找了各种关系去要那160万,也分文未得。”杨惠贤淡淡地说:“两三年后该厂破产,总共数百万工程款都打了水漂。”

杨惠贤多方寻求媒体关注,希望透过媒体的审视呈现“王朝抢劫案”的另一面。

《河北日报》内参版确曾在2007年10月报道了案件详情,当时的河北政法系统高层官员对此内参批示,要求审慎处理,但并没能更改判决结果。

杨惠贤记得,2011年9月8日,王朝案在北市区法院再审,她被保定法院挡在门外,但关注此事的记者们还是向她描述了庭审的过程:长达10个小时的庭审中,律师洪道德和孙莹取得了上风,以致于部分旁听记者提前走出法庭,准备向编辑部发出王朝案将被改判的稿子,但最终结果仍然是维持原判。“庭审结束后,我走进法庭,看到洪老师趴在桌子上,很久没有说一句话。”杨惠贤一直记得当时的绝望,洪道德团队所提的所有辩护意见法院全未采纳,而公诉方意见全部采纳,“证明王朝无罪的证据全部无效,包括邢世平等人做的多份笔录,而法院只采纳证人改口后的口供。”

判决结果让北市区法院一位工作人员都感到震惊,“这个人本来挺乐观,开庭前不断安慰我。他听到判决,长叹一声对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杨惠贤告诉《凤凰周刊》,庭审结束后,北市区法院在短短几十分钟内就做出一份长长的判决书。

对此判决,河北媒体大篇幅进行了报道,站在法院的立场将辩护一方所有质疑全部驳斥。一位曾参与报道的河北媒体记者向《凤凰周刊》记者回忆,对此事件没有自选空间,只能按照通稿报道。没有一位当地媒体记者采访王朝母亲。在这样的报道里,王朝被描述成死不认罪的抢劫犯,杨惠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的抢劫犯形象在城市里到处流传。

王朝不服判决,当庭提出上诉。2011年12月,保定市中院未开庭审理,直接作出维

2011年3月

保定市北市区人民检察院主导补充侦查王朝抢劫案,保定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予以协助。

2011年9月9日

保定市北市区法院判决王朝犯抢劫罪,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2万元人民币。

2011年
9月19日上午

王朝正式委托其代理人孙莹律师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向保定市中院提起上诉。

2011年12月15日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朝抢劫案”依法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人王朝被判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杨惠贤由此开始了申诉之路。几年来她往返北京、保定和石家庄的火车票有厚厚一沓子，绝大多数都是K字头的慢车。每到探视的日子，杨惠贤都会赶凌晨4点钟的一趟慢车。2013年3月13日凌晨3点，她从靠近火车站的亲戚家步行到火车站，一位民警过来询问她是否是杨惠贤，在得到肯定答复后，这位民警告诉她，她是闹访人员上了黑名单，“今天别想走成。”

“我的儿子被抓走后，一直通过法律渠道上诉、申诉。有媒体听闻此事过来采访，怎么就成了闹访？”当天，从凌晨一直僵持到上午8点，附近派出所、居委会工作人员都来了。“一个月只有一次的探视机会，我必须见到儿子。”杨惠贤态度坚决，居委会工作人员最后驾车将其送往保定监狱。

“王朝见到我后还不住地问，以前妈妈都是第一个来，为什么今天迟到了，妈妈，你今天是不是有事？”杨惠贤含着泪安慰儿子：“妈妈今天有事，今天来晚了，对不起。”

2015年，服刑中的王朝得到一次减刑一年零四个月的机会，杨惠贤不断打听，这次的减刑申请能不能被批准：听说在监狱系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断通过媒体喊冤的案子，减刑申请都被谨慎对待，甚至不予减刑，杨惠贤怕这传闻是真，不由得谨言慎行。

然而到了9月，意外发生了。杨惠贤去保定探监时没有见到儿子，狱方拒绝告诉她详情，杨惠贤只得悻悻地返回石家庄。当晚，杨惠贤一夜无眠，她隐隐觉得，儿子出事了。第二天凌晨，她再次坐火车来到监狱，这才有人告诉她，王朝进了医院。

距离监狱最近的医院是保定市第七医院，杨惠贤从这家医院顶楼找起，一层一

当着狱警的面， 杨惠贤批评了儿子不该 乱打电话。王朝没有反驳， 只是哭得像个孩子。

层、一间屋一间屋看，终于在楼道最边缘的房间里看到了王朝。“他戴着手铐脚镣，脸色青黑。旁边坐着五六个狱警。见到我过来，那五六个人噌地站起来，如临大敌。”杨惠贤轻轻地喊了一声：“朝子，你怎么了？”王朝哭丧着脸说：“妈妈，我肚子疼。”

旁边的狱警告诉杨惠贤，王朝用监狱一位队长房间的固定电话，给某监狱主管部门打电话咨询减刑事宜，结果打到了一位领导办公室。这位领导勃然大怒，要求狱方严惩王朝越级打电话的行为。狱方关了王朝禁闭，他冲动之下吞了两枚钉子。当着狱警的面，杨惠贤批评了儿子不该乱打电话。王朝没有反驳，只是哭得像个孩子。

最后的申诉

当天，杨惠贤几乎一路哭回石家庄，深夜枯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一个想法挥之不去：到了申诉的时候了。2015年10月12日，杨惠贤在洪道德和孙莹两位律师的陪同下，向河北省高院递交了长达122页的刑事申诉状，并被省高院正式受理。11月18日，王朝的辩护律师到省高院阅卷时，没有在卷中找到判王朝有罪的关键证据——手机通话清单。

对这最后一次申诉，杨惠贤满怀信心：“我看到了体制内正义力量的滋长。”杨惠贤始终记得北市区法院那位“不听话”的法官。“他已经退休了，但晚年并不顺意：他的儿子也因为他坚持正义受到影响。我向省高院提出申诉后，这位法官委托别人联络

我，祝福案子早日取得突破，也委婉表达，他当年冒了很大风险坚持真相，最终也尝到了苦头，他不希望媒体再提他的名字。”

她也收到过各种暗示：有人给王朝悄悄带话，只要认罪，刑满释放后就给他在定州搞一套大别墅。王朝回复：“认罪？我真的想认罪，可是，就目前这些证据，我怎么能认？”杨惠贤支持儿子的选择：没有什么比尊严更重要。

几年来，杨惠贤时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十天半月不出门，看卷宗、学习法律知识，如今她对很多法条和法律程序已非常熟稔。“我们家原本经济条件不错，从来都觉得法律纠纷相隔很远，但是王朝莫名其妙被抓，让我们意外走进了这样一个层层叠叠的黑幕里。”

石家庄的夏天很热，但杨惠贤舍不得开空调：“我的儿子在监狱受罪，我怎么能在家里享受？”为了省钱，她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过后又责备自己不懂得爱护身体，她喃喃自语：“我得活着，我要是死了，我儿子就得永远背抢劫犯的黑锅。”她曾经多次突发心脏病，倒在路边不省人事。每当想起这些，她都后怕，下定决心养好身体。有生命在，才有翻盘的希望。

杨惠贤家中今年8月19日的日历空隙处，写着一句话：“今天是儿子38岁生日，也是儿子被带走3215天的日子……妈妈连句祝福的话都不能给儿子说，多么的可怜。”13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切还是9年前的样子。这个房子当年是王朝亲手操持装修的，在杨惠贤的眼中，到处都是儿子的回忆，却没有一点儿子的声音。三年前，杨惠贤的一位亲戚搬家让她去挑喜欢的东西拿走，杨惠贤只挑了一个写有“家”的装饰画，挂在了自家客厅的墙壁上。

□ 编辑 路琰 □ 制图 黄静 □ 美编 虎妹



(澳门航空公司)



(港龙航空公司)



(厦門航空有限公司)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本刊为此版所列航空公司航班和酒店商务客房指定读物



鑫海锦江大酒店
XINHAI JIN JIANG HOTEL
(北京东城区金宝街61号)
订房电话:(86-10)58163388

(鑫海锦江大酒店)



城市名人酒店集团
CELEBRITY CITY
HOTELS & RESORTS
400-826-6333

(城市名人酒店集团)



CROWNE PLAZA
HOTEL & SUITES
LANDMARK SHENZHEN
深圳富苑皇冠假日套房酒店
THE PLACE TO MEET.

(深圳富苑皇冠假日套房酒店)



CENTURY PLAZA HOTEL
新都酒店
www.szcphotel.com

(新都酒店)



MARCO POLO
SHENZHEN
深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
Tel:(86-755)8298 9888

(深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



銀座泉城大酒店
YINZUO Plaza Qianjiang Hotel
(山东省济南市南大街2号)
TEL: (86-531) 86921911

(銀座泉城大酒店)



香榭丽宫酒店
Palace Hotel
Tel: (86-0755) 82891111

(深圳香榭丽宫酒店)



丹枫白露酒店
Royal Suites & Towers
Shenzhen

(深圳丹枫白露酒店)



福州西湖大酒店
LAKESIDE
HOTEL
★★★★★

(福州西湖大酒店)



SEAVIEW
O-CITY HOTEL
SHENZHEN
深圳海景奥思廷酒店

(深圳海景奥思廷酒店)



北京友谊宾馆
BEIJING FRIENDSHIP HOTEL
★★★★★

(北京友谊宾馆)



岷山饭店
Minshan Hotel

(四川岷山饭店)



天恒大酒店
HORIZON HOTEL
★★★★★

(云南天恒大酒店)



假日酒店
Holiday Inn
杭州国际假日酒店
特价直连: 0571-88946588

(杭州国际假日酒店)



麗江官房大酒店
GUANFANG HOTEL LIJING
★★★★★

(丽江官房大酒店)



天元大厦
TIANYUAN TOWER
H 0 1 1 1
天恩塔一零一
H 0 1 1 1

(杭州天元大厦)



富盈酒店
CHINESE HOTEL
★★★★★
Tel:(86-769)8858 8888

(广东富盈酒店)



NARADA
Boutique Hotel
君亭酒店

(君亭酒店)



金龙建国温泉酒店
JINLONG HOTSPRING HOTEL
★★★★★

(北京金龙建国温泉酒店)



中心大酒店
CENTRAL HOTEL
Tel:(86-025)8315 5888

(南京中心大酒店)



METRO Park
HOTEL
深圳维景酒店
Shenzhen

(深圳维景酒店)



CROWNE PLAZA
QINGDAO
青岛颐中皇冠假日酒店
THE PLACE TO MEET.

(青岛颐中皇冠假日酒店)



井冈山中泰来国际大酒店
ZHONGTAI
INTERNATIONAL HOTEL
井冈山中泰来国际大酒店
1954年 1954-1954 1954-1954

(井冈山中泰来国际大酒店)



珠海怡景湾大酒店
HARBOR VIEW
HOTEL RESORT
★★★★★

(珠海怡景湾大酒店)



珠海度假村酒店
ZHUHAI HOLIDAY RESORT HOTEL
★★★★★

(珠海度假村酒店)



帝豪花园酒店
ROYAL GARDEN
HOTEL
★★★★★
广东东莞市大朗镇黄旗大道700号
Tel:0086-769-83122222

(帝豪花园酒店)



華駿大酒店
HOTEL JUMBO ZHUHAI
★★★★★

(珠海华骏大酒店)



中泰来深圳戴斯酒店
Days Inn Shenzhen
预订电话: 0755-82203333

(深圳戴斯酒店)



常州大酒店
CHANGZHOU GRAND HOTEL
★★★★★

(常州大酒店)



虹桥宾馆
RAINBOW HOTEL
★★★★★
Jin Jiang Inn

(上海市虹桥宾馆)

韩国政府如何“打老虎” 韩首次追回海外贪腐款内情

特约撰稿 / 启笛

1997年4月，韩国爆出一则轰动世界的新闻，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一同被带上法庭接受审判。其中，韩国大法院以军事叛乱、内乱罪和贪污受贿罪判处全斗焕无期徒刑，并追缴2205亿韩元（约合12亿元人民币）。

然而，这个判决后来没有完全执行。同年12月，全斗焕被时任总统金大中特赦并获释。但他拒不缴纳罚金，并声称其全部资产仅有29万韩元。

直到2015年11月10日，美国政府将2014年追缴到的全斗焕藏匿在美国的超过120万美元赃款归还给韩国政府。这笔数额巨大的财产包括全斗焕儿媳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公司投资的50万美元，以及次子全在庸出售加州海岸住宅所得的72.6万美元。根据美国公布的查封诉状，全在庸向韩国检察官承认，这笔资金来源于他的父亲。

至此，长达18年的追讨终于告一段落。按照韩国法务部的说法，这是美国迄今首次将追缴的韩国前高官不法所得返还给韩方。美方则说，此次归还的113万美元显示了美国清查外国腐败高官在美藏匿赃款的决心。

18年，只追回一半

“18年的追讨持续太久了，十分艰难。这些钱之前一直没有被讨回

来，直到2013年才开始有眉目”，持续报道全斗焕案件的韩国《民族新闻》记者崔贤俊告诉《凤凰周刊》，“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让韩国国民重新看到了一线希望。”

自上世纪80年代韩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来，总统这一职业似乎陷入怪圈：多位总统在任期间或卸任之后遭遇腐败调查，或受到牵连、或锒铛入狱……这当中，全斗焕的评价则是最为负面的，至今大部分韩国人谈及他时会不假辞色地严厉批评，称其“独裁”以及“爱哭穷”。

2013年，这位拒不缴纳非法资产的前总统在韩国引起公愤，被检方直接“抄家”。检方没收了大批文件、账簿以及电脑硬盘等，甚至动用金属探测器搜查全斗焕宅邸院子的财物。全斗焕多名亲信和亲属也被禁止出境。鉴于这个案件法律追诉时效截至2020年，所以韩国加紧联合美国政府一起追查全斗焕家族在美资产，包括家庭成员和各类相关的空壳公司以及登记人账户，搜寻洗钱和藏匿资金的情况。

目前距离追诉时效仅剩五年，现年84岁的全斗焕拖欠的贪腐款只被追回一半，剩余1084亿韩元则显得更加艰难。“韩国检方正在尽最大努力追查隐藏资产，如果五年内还不能将贪腐金全部追回的话，到时候很可能会迫于无奈，无法追回剩下款项了。”崔贤俊说。

非法“政治资金”成为痼疾

在韩国，高官因腐败问题被追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除了全斗焕、卢泰愚，还有因儿子涉及不法财源和政治资金问题而备受困扰的两位前总统金泳三和金大中，以及令很多韩国人落泪的悲情总统卢武铉，再到因受贿罪入狱的韩国首位女前总理韩明淑。今年4月，韩国前总理李完九也因外交贪腐案被迫下台接受调查。

回顾这些高层领导涉贪事件，大多都因获得非法“政治资金”问题受到牵连。该问题似乎成为韩国社会的一个痼疾。就连1995年因非法收受巨额政治资金被查出的前总统卢泰愚也说，政治资金是韩国政坛上一个长期的习惯做法。他在被查处任期内非法收受巨额政治资金5000亿韩元时曾辩解说：“政治资金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各党派都存在问题！”

韩国总统任期为五年，周期性的选举和激烈的多党派竞选需要一笔庞大的活动资金，而这笔活动资金常被称作“政治资金”。这笔资金的多寡往往成为政党及其候选人能否在竞选中胜出的决定性因素。“韩国作为多党制国家，很多党派竞选时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募集多种多样的选举资金、党派活动资金，成为高层腐败的直接动因之一。”韩国庆熙大学

法学院教授郑泰浩 (Jung Taeho) 告诉《凤凰周刊》。

一般来说, 候选人或者政党要在党内筹集资金有很大局限, 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就需要依赖外部支援或者“捐赠”。每到这时, 各大企业、财团均会积极地为一些政党及党派捐助资金。然而, 这些看似无偿的捐助往往并不是无偿赠予, 大多数的捐助者期待的是有朝一日的“红利回报”。当竞选者或者党派获胜, 执政者也因“政治资金”与从商者联系更加紧密。而回报的方式则有很多, 比如制订有利于财团的政策等。

对于政治资金的使用, 韩国《政治资金法》有着明确规定: 韩国法律保障正当合法的政治资金, 为确保政治资金的透明度, 政治资金需要公开收入和支出明细。但是, 关于何为合法政治资金, 却很难确切限定。加上接受政治资金在很多时候与受贿界限模糊, 只要没有明显的利益交换和对价关系, 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受贿推到合法政治资金上, 以此脱罪。

而由于难以界定何为合法资金, 其监管也就一直处于“灰色地带”。虽然《政治资金法》规定了经费限额, 但巨额的资金很容易诱使人专门“做手脚”, 因此隐性的政治资金大量存在, 每每直到东窗事发才被曝光。

韩式“打老虎”层层递进

虽说不断被爆出的政治腐败案让外界为韩国捏一把冷汗, 韩国人却乐观地将其看成是韩国民主化改革的发展与延伸。

韩国前总统金泳三执政期间, 将全斗焕、卢泰愚这样的“大老虎”送上法庭, 他也开启了韩国民主政治的改革, 如公务员公开个人财产、实行金融实名制等, 这些对于韩国的反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韩国前政要涉嫌贪腐情况

 <p>全斗焕 (总统) 1980-1988 受贿 2205 亿韩元</p>	 <p>卢武铉 (总统) 2003-2008 因卢武铉自杀, 韩国检方宣布结束对其涉嫌受贿的有关调查</p>
 <p>卢泰愚 (总统) 1988-1993 受贿 2838.96 亿韩元</p>	 <p>李明博 (总统) 2008-2012 儿子李时勋涉嫌非法买地, 并在买地过程中受贿 6 亿韩元; 兄长李相得涉嫌收受非法政治献金 7.5 亿韩元</p>
 <p>金泳三 (总统) 1993-1997 儿子金贤哲收受受贿 33.2 亿韩元, 逃税 13.5 亿韩元, 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p>	 <p>韩明淑 (总理) 1993-1997 受贿 8.8 亿韩元</p>
 <p>金大中 (总统) 1998-2002 次子金弘业因涉嫌受贿 22.8 亿韩元, 被判处 3 年 6 个月的监禁; 三子金弘杰被指控收受 35 亿韩元现金和股票贿赂, 被判处 2 年监禁, 缓期 3 年执行</p>	 <p>李完九 (总理) 1998-2002 被指受贿 3000 万韩元, 仍在调查中</p>

随后的金大中政府成立了腐败防治委员会,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他的政策起到很大作用。2001年韩国政府制定了《腐败防止法》, 并成立国家清廉委员会, 强化之前反腐机构的职能, 此后继续修订了《政治资金法》。同时, 反腐败的主体也由公职人员向民间逐渐扩大, 诞生了如“透明社会协约”等民间反腐机构。

后来的李明博与朴槿惠政府延续了金大中时期的反腐政策, 即主要以揭发与处罚为主, 但加重了对受贿罪的处罚力度。韩国今年还通过了反贪法案《金英兰法》, 旨在根除公务人员贪污腐败行为。

今年3月, 朴槿惠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全面向腐败宣战, 要铲除韩国社会各领域的腐败现象, 将腐败连根拔起”。韩国中央检查厅随后展开对韩国国企的反腐清查, 包括浦项制铁等重要大型企业接连被调查。5月, 朴槿惠还提名资深检察官、韩国前法务部长黄教安担任新一届总理。当时适逢李完九卷入官商贪腐案引咎辞职, 朴槿惠选择黄教安接任, 舆论认为意在显示打击贪腐决

心, 争取民意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 中韩两国很早前也展开了反腐合作, 1998年两国共同签署《中韩引渡条约》和《中国和韩国刑事司法协助条款》, 这两项重要的条款为两国打击跨境腐败犯罪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韩国圆光大学韩中关系研究院学者许在哲不久前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还表示, 近一年多很多韩国人都知道中国在进行反腐行动, 中国政府能够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 对于韩国来说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值得中韩在反腐方面加强合作, 交换意见。

“政府的腐败将夺走我们的生命和未来。”这是很多韩国人挂在嘴边的话。在他们看来, 层出不穷的“打老虎”现象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性, 也表明国家的社会透明度在不断改善。不过, 强有力的反腐行动并不是韩国国民的期待, 也不会是最终目的; 韩国社会如何通过制度改革和有效的管理再次实现经济腾飞, 创造又一次的“汉江奇迹”, 才是他们拭目以待的。

历届气候大会成果



巴黎气候大会： 为何如此悲观

巴黎会议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并非制定更多的一次性排放目标，而是克服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即经济发展必然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相冲突。

特约撰稿 / 张竹林（发自巴黎）



“我们处于自杀的边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即巴黎全球气候大会召开之际，越来越多人像梵蒂冈教皇方济各这样，对全球环境问题发出严厉警告。“如果此次气候大会失败，地球将变得不再适宜居住。”巴黎气候大会主席、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在大会前夕向媒体传递这样的信号。

在被视为残缺不齐的《京都协定书》即将到期、而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完全失败的情况下，巴黎气候大会被认为是人类挽回全球气候灾难的最后一个机会。它的目标非常明确：找到一个能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的，由195个参与会议国家共同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

然而，本次气候大会的举办方，对环保问题相当重视的法国人却对此显得悲观。最新的民调显示，72%的法国人认为，即使大会最终达成协议，也仅仅是一个表面上的协议。

1.1万双“游行的鞋子”

11月30日，气候大会开幕前一天，巴黎600幅广告招贴被一个叫做Brandalism的英国组织偷梁换柱。包含法国航空公司、法国天然气和电力巨头Engie等气候大会赞助方的广告，被该组织换上了一些带有嘲讽性质的宣传画。更换后的德国大众汽车“广告”上写道：行驶得更清洁，至少是在表面上这样。这600幅宣传画由19个国家的80位艺术家创作，Brandalism宣称，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揭露这些巴黎气候大会赞助商的谎言。

“只是表面上这样”，正是全球环保组织所担心的问题。他们首先抨击作为组织方的法国政府表里不一——在确定气候大会赞助商的时候，法比尤斯曾对外宣称“此次大会的所有资助方，都是气候的朋友”，但结果，众多来自化石燃料领域的高污染企业，如法国电力公司EDF、

中国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

二氧化碳排放

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
并争取尽早达峰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排放 **60%~65%**

比2005年下降



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达到

20% 左右



森林蓄积量

比2005年增加

45 亿立方米左右



雷诺尼桑集团、苏伊士环境集团、法国航空公司都成了所谓的朋友。

加拿大女记者、环保活动者Naomi Klien质问：“当世界卫生组织在谈论烟草问题的时候，烟草工业是无权涉入的，因为涉及到显而易见的商业利益问题。为什么到了气候问题上，我们就不明白这点呢？”

大会组织方受到民众质疑的另外一点来自对游行的禁令。巴黎气候大会期间声势最浩大的、最能让普通民众直接参与的游行计划原本要在11月29日进行，但因为半个月前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而被政府禁止。成千上万位为此准备了几个月的全球各地环保组织和活动者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最终，他们在原计划的游行地点——巴黎共和国广场上摆放了1.1万双鞋子，用无声的方式来呼

吁全球一起关注气候危机。

发起这场鞋子收集活动的全球性组织机构Avaaz的负责人埃玛·鲁比-萨赫斯表示，名为《游行的鞋子》的这件作品意在表现法国民众在气候问题上的坚定。

由130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CoalitionClimat21还发起了一个名叫“替我游行”（March4Me）的平台。巴黎人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与国外的人联络，让其代替自己参加游行。11月29日，柏林、伦敦和墨尔本等地均举行了游行。

美丽的宣言并无约束力

自二十多年前首届全球环境峰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以来，缔结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协议的尝试一直受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

公平分担责任问题的困扰。印度总理莫迪在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前夜指责富裕国家的“生活方式”。他称，这些生活方式必须被重新审视，否则“（此次会议上达成的）最佳政治和技术措施将起不到作用”。

然而，对于印度在本次气候大会中的姿态问题上，法国严肃杂志《视点》周刊却质疑道：“在对气候问题的处理方式上，西方国家和印度的虚伪程度有多大？”

从总量上看，印度目前是全球仅次于中美两国的第三大碳排放国。但如果按照人均排放量，印度人每年每人排碳量为1.7吨，仅为美国人的十分之一。让人担心的是，印度在未来几年内经济高速发展中的能源消耗模式。1990年-2012年印度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增长了67%，如继续按照这个标准，到2030年此数据将翻倍。

尽管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但印度始终坚持一个口径：发展经济第一。10月1日，新德里方面做出承诺，到2030年，印度会将非石化能源在发电总量中所占的比例提升到40%。

“这样的目标是非常高的。但政府希望发出这样一个信号，鼓励未来企业的投资往这个方向发展，”来自新德里的能源顾问Arunabha Ghosh如此分析。但与此同时，印度并未做好放弃煤炭消费的计划。更糟糕的消息是，印度用来发电的煤炭消费预计将在2035年翻倍。

和印度的高调承诺一样，在此次大会召开前，197个缔约国家中的160国向主委会提交了自主减排贡献方案。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90%，碳排放量也占到全球总量的88%。

按理说，这都是令人欣慰的消息。关键在于，如果巴黎气候大会最终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定，这

些美丽的宣言还存在吗？就在大会前夕，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顺势指出，

“在巴黎达成的协议，将不会像《京都议定书》一样，它不具备法律约束力。”这意味着，195个参与气候大会的国家所做的承诺没有太大实际意义。克里无疑给巴黎气候大会泼了一头冷水，但至少让对其抱有过多美好幻想的人有了一个心理准备。

而在欧盟委员会看来，巴黎气候大会的协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涉及到所有国家的信誉问题，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生活的地球不能再等”。

然而，法国《世界报》指出，环保优等生欧盟关于大会最终“签署一个形式适当且具有约束力的条约”的愿望，与众多国家的真实策略南辕北辙。报道引述一些参与国代表私下的话说，如果事情按照欧盟所说的方向发展，他们将削减此前预计在巴黎大会上作出的承诺。

作为气候大会最关键的国家之一，美国民主党政府明确表示不支持大会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目的是为了避免因共和党的反对而使其承诺失去兑现基础。美国总统奥巴马清楚，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无法通过美国参议院的批准，后者由在席位上占有明显优势的共和党人控制。而代表保守理念和石油能源产业利益的共和党认为，温室效应的问题完全是左派科学家臆想的以此用来削弱美国经济的招数。

最大挑战并非制定一次性排放目标

如果巴黎大会签署了一个根本没有约束力的协议，又有哪些国家会真实地遵守诺言呢？

今年10月，英国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和国际石油变革组织公布的报告指出，20国集团(G20)政府每年依然花高达4.52亿美元来促进石化燃料产业。以美国为例，尽管奥巴马呼吁废除化石燃料补贴，但全国津贴依然达到200亿美元以上，俄罗斯的花费将近230亿美元。这些国家都清楚，要达到将全球气温增温控制在2摄氏度，必须放弃至少80%的化石燃料，他们同时也公开承诺要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以便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吊诡之处在于，倘若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所有的改善也只能都是幻影。

早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就承诺，以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一直持续到2020年，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几年过去，事实与承诺相差巨大。以联合国创建的绿色基金为例，截至2015年6月初，在102亿美元的资金承诺上，只有40亿美元到账。代表发展中国家阵营的77国集团始终坚持，发达国家务必在2020年之前落实所承诺的资金，才能有效帮助他们。

以沙特为首的海湾产油国，对任何可能性的协议都持敌视态度。他们不愿意从资金上援助发展中国家，也拒绝淘汰化石燃料的任何提议。法国媒体称：这些阿拉伯国家部长们不过是来巴黎散步而已。

就在159位国家领导人汇聚巴黎、对全球环境作出生死决定的时候，远离巴黎9000多公里的北京，民众正用智能手机密切关注身边的PM2.5数值。不过，来自中国的承诺仍被大会主席视为极为欣慰的好消息。

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中，中国宣布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以

便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大会开幕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演讲备受关注。习近平指出，中国将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重要内容，并提出中国将于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他还引用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的话说，“最大的决心会产生最高的智慧。”

地球另一端的巴西则带来了另一项重要承诺。相对于2005年的碳排放量水平，到2025年将减少37%的排放。法国总统奥朗德则在会议的第二日宣布，到2020年，法国将给予非洲国家20亿欧元的帮助，用于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

欧盟委员会称，如果找不到获得资金来源的方案，巴黎气候大会将不会有协定。早在今年1月，欧盟就开始部署2015年气候外交行动计划。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巴黎气候大会开始之前，欧盟发动一系列名人以及9万名外交官，通过3000项任务进行游说，目的是向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关键国家施加“最大的压力”，以赢得温室气体削减的新承诺。

然而更多的分析认为，巴黎会议面临的重大挑战并非制定更多的一次性排放目标，而是克服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即经济发展必然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相冲突。《金融时报》12月1日发表的社评认为，该会议能做到的是建立一个框架，定期检查全球为避免气候变暖达到危险程度而取得的进展；它也可以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在低碳转型方面所蕴含的机遇，同时提供开启技术变革所需的融资方式。

“如果齐聚巴黎的各国领导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很了不起了。”文章结尾如此说道。🌀

□ 编辑 漆菲 □ 制图 美编 虎妹



击落苏-24的土空军实力几何

从飞机数量上看，土耳其空军称得上是北约第三，但一国空军实力并非仅由数量决定，地面防空、作战经验、航空工业等都是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恰好是土空军的薄弱之处。

特约撰稿 / 谢瑞强

或许由于表现的机会太少，土耳其空军给世人留下的印象一向是“默默无闻”。实际上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纸面”上的土空军实力在北约成员国中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实力不可小视。

然而，11月24日，土耳其空军击落俄罗斯苏-24战机的惊人一举，让低调的土耳其空军立刻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击落苏-24战机事件造成俄罗斯一名飞行员死亡，俄总统普京将这一行为怒斥为“背后捅刀”，同时批评称，虽然土耳其声称打击“伊斯兰国”，但实际上却成为作为其主

要资金来源的石油走私的通道。俄罗斯还启动一系列对土耳其的制裁措施和应对方案，这不但给俄土关系蒙上阴影，也给早已乱成一团的中东局势增加了新的变数。那么，击落苏-24战机的土耳其空军实力究竟几何？

名不副实的北约第三

草创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土耳其空军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空军之一。1909年，奥斯曼陆军打算建立一支航空兵部队，当时离莱特兄弟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首飞成功仅不

到6年。当时一些军事强国在建立航空兵方面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可见奥斯曼陆军的眼光还是比较敏锐的。

1945年之前，土耳其空军浮浮沉沉，发展比较缓慢。冷战开始后，得益于加入北约组织，土耳其空军才正式步入快速发展阶段。由于地缘位置的重要性，土耳其开始加强军力发展，空军实力也逐步增强。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土耳其空军目前总兵力超过6万人，空军总部位于安卡拉，下设第1和第2战术航空司令部、航空训练司令部及后勤司令部等。两个战术航空司令部是土耳其空军的主要作战力量，一共下辖7个防空战斗机中队和8个战斗轰炸机中队和2个侦察中队。

目前，土耳其空军拥有的作战飞机和直升机数量达到930架左右，其中包括230架F-16C/D战斗机。要知道，战斗机是一国空军争夺制空权的主要力量，战斗机性能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空权的归属。

自1987年开始，在“和平玛瑙”计划下，土耳其空军开始装备美国研制的F-16C/D战斗机。从技术角度上讲，F-16C/D作为世界上一款经典的第三代制空战斗机，其机动性能、机载电子设备和机载武器的水平都排在世界先进水平的前列。进入21世纪后，土耳其空军对批次较早的F-16C/D进行了升级，换装了新型火控雷达和机载武器，作战能力进一步提高。

除了F-16C/D战斗机，土耳其空军还装备了近200架F-4E战斗机。虽然F-4E属于第二代战斗机，作战能力逊于第三代战斗机的F-16C/D战斗机，但庞大的装备数量，实力也不容小觑。

现代战争中，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和加油机等特种飞机在战场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预警机为

例,这种特种飞机装备了大型雷达和一定数量的指挥人员,可对敌方空中目标或水面目标进行远距离探测并指挥己方飞机展开相应的行动,被称为“空中指挥所”。

2000年,土耳其空军开始实施“和平鹰”计划,并从美国购买了4架E-737预警机。2015年2月,波音公司宣布为土耳其制造的4架E-737全部交付。E-737预警机配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最大探测距离超过400千米,可同时掌握数百批目标。在数据链的支持下,E-737与土耳其其他军机形成联合网络作战系统,提高了土耳其空军的整体作战能力。除了预警机,土耳其空军还装备了十几架加油机和侦察机。

从飞机数量上看,土空军的确称得上是北约第三,从作战装备构成来讲,其也算得上是一支比较完善的现代化作战力量。但一国空军实力并非仅由数量决定,地面防空、作战经验、航空工业等都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恰好是土空军的薄弱之处,北约第三的“赞誉”显得名不副实。

自主发展 层层推进

正是意识到上述不足,近几年来,土耳其开始有针对性地弥补短板。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购买中国红旗-9导弹搁浅一事,就是土耳其增强地面防空能力的重要举措。土耳其空军目前装备的地空导弹主要是“奈基”、“霍克”和“轻剑”,这些导弹大部分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产品,性能早已落后。

在发展航空工业方面,土耳其通过“和平玛瑙”计划(土耳其空军装备的240架F-16C/D战斗机中只有8架是美国制造的,剩余的232架按生产许可证由土耳其宇航公司生产)接

触了第三代战斗机的部分技术,航空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土耳其又参与了美国的F-35项目。

土耳其国防采购官员表示,军方打算购买大约100架美国洛·马公司牵头研制的F-35战斗机。F-35属于第四代战斗机,采用隐身设计和相控阵雷达,作战能力强于第三代战斗机。采购F-35战斗机是为了巩固其北约第三空中力量的地位,提升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

在继续参加美国牵头的F-35国际战斗机生产项目的同时,土耳其还打算同步发展国产TF-X战斗机。西方航空界人士称,研制TF-X战斗机显示了希望成为航空强国的勃勃雄心。2015年1月,土耳其政府决定为TF-X战斗机装备欧洲的EJ200发动机,飞机计划在2023年首飞,2025年服役,采购数量约250架。

不过,军用飞机、机载武器等硬件设备只是空军实力构成的物质基础,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的素质更是空军实力的重要部分。由于土耳其空军飞行员大多去美国接受训练,又经常参加北约的各种演习,常态化的高强度训练使其保持着比较高的训练水平。近年来,土耳其空军还与非北约成员国举行演习。

据外媒披露,2010年土耳其邀请中国空军参加“安纳托利亚之鹰”联合军演,中国的苏-27也参与了此次空战演练。虽然中方没有透露任何消息,但由于中国国旗出现在土方更新后的“安纳托利亚之鹰”官网上,此传闻以这种方式获得证实。这也被外界视为中国首次与北约成员国举行联合军演。

为何不怕俄罗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空军一直在走下坡路,战机更新换代缓慢、飞行

员训练水平下滑一直困扰着空军。借伊拉克战争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俄罗斯经济复苏,空军的境遇才有所改善。俄罗斯空军目前总兵力约16万人,各种作战飞机约200架,其中第三代战斗机数量超过700架,预警机、电子战飞机等特种飞机也一应俱全。

从总体实力来讲,俄罗斯空军要强于土耳其空军,但由于俄国国土面积太大,空军不能将所有作战飞机放在一个战略方向。比如,驻叙利亚空军作战的伞机只有30-40架,其中用于争夺制空权的战斗机只有16架左右。从公开报道来看,驻叙利亚的俄罗斯空军战斗机的机载武器与土耳其空军有一定差距,并且如果没有预警机的支援,根本无法与土空军抗衡。

俄驻叙利亚空军的现状只是其空军整体实力下降的一个缩影。目前,俄罗斯空军大部分装备是苏联的遗产,性能跟不上时代且机体老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以第三代战斗机为例,其装备的苏-27、米格-29和米格-31只有一部分进行了升级,大部分仍在使用的半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国际先进战机配备的中距空空导弹主要是性能更好的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只有近几年装备的苏-35S和苏-30SM才配备了先进的机载武器。

当然,在体系对抗的条件下,进攻能力更强的俄罗斯空军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摧毁土耳其空军的机场,覆巢之下无完卵。不过,俄土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非常低,毕竟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全面开战牵一发而动全身。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土耳其才敢有恃无恐地击落俄罗斯苏-24战机。

◀ 2015年8月30日,安卡拉,在庆祝土耳其“胜利日”93周年的阅兵式上,土耳其空军飞越国旗。



银川市市民大厅

“双创”银川： 以银川速度打造塞上智慧之巅

记者/马军

如果将一幅中国地图左右对折，银川恰好位于中间的子午折线上。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银川，这座位于中国地理中心的都市有着“兴庆府”、“宁夏城”、“凤凰城”、“塞上江南”等不同称号。

银川作为宁夏首府，位于“呼包银榆经济区”的中心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地，既是辐射“宁蒙陕甘毗邻地区”的中心城，也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城，是西北地区“最适宜居住、最适宜创业”的现代化城市。虽然身

处中国西北，虽然曾是重度依赖资源的都市，但如今的银川无论是从生态环境还是经济发展，都改变了人们对西部城市的传统印象。

而这背后，则是银川近年来在“双创”工作上付出的努力。在国内其他资源型城市遭遇转型困境的时候，银川已经通过卓越的“双创”工作迈入了“智慧型”城市之列，并在通往智慧之巅的道路上越走越快。“双创”工作已经成为银川的另一张名片，这座塞上明珠，正在以银川速度将自己打造成塞

上智慧之巅。

励志创新：促进传统产业大转型

“资源型城市生命长度究竟能延续多久？如何能延续得更久？”这道世界难题，长期以来考验着世界，更考验着快速发展的中国。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国内不少资源型城市已经显露出不同程度的发展疲态，严重的一些城市，经济已经出现了负增长。资源型城市转型之困的难题，考验着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城市管理者。

作为曾经的资源型城市,银川却在同样的大环境下逆势崛起。2014年,银川在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依旧实现了GDP9.5%的高速增长,地方财政增长12.7%,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1%,创下了“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好势头。

更令人欣喜的是,银川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依旧能够保持绿水青山的“塞上江南”清新生态。“十二五”以来,银川能耗居高不下的局面在创新工作的引导之下得以扭转,这座城市传统的六大高耗能产业占比下降4.5个百分点,万元GDP能耗更是下降17.55%,领先全国。

银川市发改委主任张晓明称,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银川以煤炭为主的能源工业占比一度超过50%,在传统行业普遍面临危机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发现并培育新的增长点。

换句话说,银川之所以能够摆脱传统资源型城市转型之困,靠的就是两个字——创新。

正如张晓明所讲,曾几何时银川是一个依赖煤炭、发电、化工、纺织为主要经济增长点的城市。但是在传统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银川的传统产业发展并未因此失速,不仅依旧保持着强劲的成长势头,而且成长质量也越发提高。

无论是煤炭产业、传统制造业还是纺织业,银川都试图在原有的发展基础上进行产业升级,而不是走西部一些“春蚕型”资源城市的老路,放弃原有产业。近年来,银川组织实施了一批国家“863”计划、“星火”计划、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取得了“精密高效数控衍磨机床的研究与开发”等科技创新成果;大型铸钢、生物发酵、羊绒分梳等技术在国内外领先,宁东基地50万吨煤基烯烃项目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先进,干煤粉气化技术和甲醇制丙烯失活问题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百万千瓦超临界蒸汽轮机球墨铸铁件的成功研制,打破了中国高效蒸汽轮机基础部件长期受制于发达国家的局面。

今年下半年,银川还和恒天集团签署了

中银绒业战略合作协议,涉及金额达到110亿元,中国纺织巨头与羊绒行业巨头就此强强联手。用银川市委书记徐广国的话说,这就是银川近年来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银川在传统产业方面积累的独特资源和能源优势,不能丢,一定要借助新科技和外界的资金、人才与管理优势,助推银川的经济转型升级。

鼓励创业: 打造城市增长新动力

如果说创新工作让银川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摆脱了困扰中国资源型城市多年的宿命,那么鼓励创业则为这个传统资源型城市打开了另一扇大门。目前的银川,已经成为中国西北最具潜力的创业城市,在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国字号”高新区的带动下,在新技术和“互联网+”领域走出了自己的一条特色道路。在调研银川iBi育成中心之后,国家工信部部长苗圩甚至称赞:“银川作为一个内陆城市,能有这样的产业,能做得这样有声有色,真是了不起!”

走进iBi育成中心,各个办公室中统一配备的电脑一体机引起了记者的特别注意。中心管理人员非常自豪地向《凤凰周刊》介绍,这种在国内领先的电脑一体机就是位于iBi育成中心的一家公司独立研发的。这家土生土长的银川企业,已经逐步在

创新、创业不仅为银川传统产业转型提供了强大动力,同时也为银川提升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挖掘经济增长潜力提供了广阔空间。

银川乃至宁夏站稳了脚跟,并在中东等海外地区开疆拓土,培育市场。

在这家名为乾瞻科技的公司,记者发现该公司的技术团队非常年轻,公司负责人王磊只有27岁,毕业于宁夏大学。王磊告诉记者,他从大学期间就自主研发计算机,2010年由他自己设计并制作的无噪音、无灰尘的全封闭新型电脑一体机就已经获得三

项国家专利,并成功在国际会展中心展示。

毕业后不久,王磊创业的故事就被银川市政府和市创业办发现。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王磊和他的大学生团队成立了银川乾瞻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乾瞻最艰难的初创阶段就是在政府和iBi育成中心的扶持下走过的。

“公司刚刚起步的时候,就是创业办联合其他部门以贷款的形式为团队申请了5万元的青年创业资助金,此后我们电脑的第一笔生意也是和iBi育成中心做成的,正是银川对青年创业者的这种扶持力度,才让我们一路走到了今天。”谈起公司发展的最初,王磊对银川政府各部门的支持仍非常感恩。

实际上,在王磊创业之前,银川相关部门就已经出台了不少针对大学生创业的政策,不管是注册费用还是资金支持,银川都给予青年创业者丰沃的优惠条件。《凤凰周刊》在银川市政府采访时,短短半小时的采访就至少被上门咨询创业政策的青年人打断三次,创业已经成为银川最炙手可热的潮流。

创新、创业不仅为银川传统产业转型提供了强大动力,同时也为银川提升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挖掘经济增长潜力提供了广阔空间。针对创新、创业工作,尤其是青年创业工作,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经提出,“要把发挥人的创造力作为推动科技创

新的核心,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使青年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吸引广大海外人才创新、创业”。作为土生土长的银川人,王磊和他的团队也是银川创业工作、人才工作和科技工作的一个缩影。

2013年,在银川考察工作的李克强总理听说王磊的事迹之后,专门来到王磊家中探望。李克强表示,“年轻人要用坚定的意志和



↑ 市民大厅为银川市民提供各项服务。

团队的合力来创业,通过不断的努力和不懈的奋斗来改变困难,用智慧创造美好的未来,为国家、家乡争光”。同时,李克强也对银川的创新、创业工作给予极大的肯定。

如今,王磊的公司走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在政府的帮助之下,已经有投资人向乾瞻注入了资金。而乾瞻自主研发的电脑一体机也已迈出坚定的第一步,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的中阿博览会上,乾瞻科技研发的

项,企业利润总额达到4亿元,税收总额达到2亿元。

另一个数字或许更能体现银川“双创”工作的“科技含量”,仅仅iBi这一个园区,预计2015年末,网络交易额达到4500亿元。在这一年之中,iBi走出了10家上市公司。2010年,银川被中央评选为国家创新型

传统行业通过技术创新得以提升,新型领域通过鼓励创业得以发展。在银川通过“双创”工作强势崛起的背后,却是党委、政府各部门的自我创新与革命。

电脑正式参展。

像乾瞻这样的高科技含量的创新型初创企业,在银川大地上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号称“西北高新产业高地和智慧之巅”的iBi育成中心,已经成功聚集了一批高科技、新经济领域的产业,实现了核心业态的裂变式聚集和主营目标的几何级增长。

目前,该园区入园企业达到520家,大数据、电子商务、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金融、生物工程、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企业应有尽有。2015年末,取得自有知识产权700

试点城市,5年时间不到,银川专利申请量就已经翻了三倍,用卓越的成绩向中央上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目前,银川大地上创业的热潮已经形成星火燎原之势。2015年7月20日,银川建成了“8+X金融电商创客空间”,通过提供8项免费功能,为创业者和投资人搭建信息对称、项目对接、资本对接的创新、创业孵化服务平台,为更多的青年创客实现梦想添砖加瓦。

在该空间的启动仪式上,银川市金凤区新型创业创新服务平台也就此揭牌,宁

夏首家众创空间投资发展平台就此落户银川。这对银川来说,只是其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小小成果,但却可以承载无数在银川奋斗的青年的创业梦想。

近年来,银川大地上各式众创空间雨后春笋般崛起:有宁夏版“车库咖啡”之称的必胜创业咖啡馆、宁夏大学众创空间、银川梦工场大学生创业孵化园区(基地)等创业服务设施相继开张,为银川创业提供了创业培训、风险评估、股权众筹、银企对接、新三板上市辅导等全方位的创业服务。可以说,在贺兰山下的银川大地上,一个完整而又开放的创客商业圈已经正式形成。银川这一中国西北的塞上明珠,正在向西部“双创”高地的目标大步迈进。

简政放权:磨炼城市发展新内功

传统行业通过技术创新得以提升,新型领域通过鼓励创业得以发展。在银川“双创”工作强势崛起的背后,是党委、政府各部门的自我创新与革命。可以说,在银川创新、创业不仅仅是市场主体和个人的行为,政府也在每时每刻对自己的行政职能进行着创新与创业,也正是通过自我“壮士断腕”式的创新发展,银川市委、市政府才能推得动市场主体的创新、创业工作,才能带得动银川这一塞上明珠向更高巅峰的攀登。

刘成是银川普通的一名个体户,经营着两家牛肉面馆,虽然生意不大,但是需要打交道的政府部门却不少。

“因为开的是餐饮业,工商、税务、卫生等部门都要打交道,以前这些部门分布在银川的各个地方,虽然银川不大,但一天也就只能办成一件事”。但是自从今年银川市民大厅建成之后,刘成不再有之前的烦恼。

就在银川著名的“中阿之轴”不远处,一栋崭新的大楼就是新建成的银川市民大厅。目前这座大楼由十二个近2000平方米的办事大厅组成,700多个窗口为企业和银川市民提供400多项审批和其他公共服务。在市民大厅,办护照、医保、车辆违章处理、经济项目审批,所有企业和群众需要的服



务,几乎都能一站式办齐。

“市民大厅修起来之后,我给店里办点事就太方便了,上次来办理税务的事情,我一看这么方便,顺便上楼就把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办了”。刘成笑着对记者说。

虽然看上去只是办事方式的一个小型的创新,但市民大厅建立的背后则是银川一次简政放权大手笔的试验。为了响应国家号召,通过简政放权的形式打破限制经济发展的制度桎梏,银川市委市政府将原先散落在各个部门的行政审批职能集中在一起,成立了专门的行政审批服务局,从体制上彻底打破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的局面。

在新市民大厅成立之前,银川也进行过类似的尝试。但是在没有统一审批权的情况下,很多要害部门、实权单位不愿意进驻市民大厅,即使进驻也“只挂号不看病”,没有从根本上达到便民利企的作用。

银川市委书记徐广国表示,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授权不到位、不彻底,一些审批事项仍在原部门审批和流转造成的。

为了彻底打破制度藩篱,银川从去年11月正式组建行政审批服务局,把以前分散在发改、环保、交通等26个实权部门的153大类的行政审批事项,一次性的转入到审批服务局,真正意义上做到了“一局一章管审批”。虽然在全国范围内,银川并不是成立专门的审批服务局的首创城市,但不管是改革力度,还是实践效果,银川这一西北地区的城市,已经可以给国内其他一线城市树立榜样和标杆。

在银川市委市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革之下,银川153类527项行政审批的办理时限由法定的4080个工作日减少到了880个工作日,审批效率平均提高了75%,50%的审批事项一天之内就能办完。

而这还远非银川“简政放权,修炼内功”的重点,接下来银川还会充分发挥自己

在新经济领域的成果,通过信息化的改革推动“智慧政务”。银川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杨兆华表示,接下来,银川打通信息孤岛,加大网上审批的工作力度,让很多审批事项实现网上审批。目前,已经实现了审批事项由过去的27项增加到现在的177项,最终达到不见面即可办事的网上审批服务。

“贺兰岿然,长河不息”,银川人在银川精神的指引下,已经成功地在转型之路上大步前行。然而创新、创业没有尽头,银川的发展之路也没有尽头。目前,银川市“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之中,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仍是规划的重点内容。在银川市委市政府和企业、群众看来,高耸的贺兰山和不息的黄河水才是银川“双创”工作的标志:银川人追逐创新的高度没有极限,银川人对于创业的热情也不会止息。🌀

千亿市场虚位以待 第三方征信牌照难产 催生灰色业务

记者/曹蓓

大陆首批第三方征信牌照发放时间已推迟近5个月。

2015年7月底,首批8家获准的个人征信机构就已经通过央行的正式验收,但到目前为止,发牌之事却一直杳无音讯。《凤凰周刊》致电央行相关负责人,得到的回复是“目前没有更新消息”。

此前,一家获准机构的相关人员也表达了不解,“我们也等得很辛苦,牌照迟迟不下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他表示,目前各家都很低调,公测跟得到牌照毕竟有很大的不同。

拉卡拉信用相关负责人回复本刊称,预计牌照下来的时间将延后,原因出在国家部门方面,资格已批,但是牌照还在相关部门流程中,目前并无变数。

然而在官方允许的第三方征信机构牌照迟迟未能下发的情况下,央行征信系统的独大功能难以被分担,才会让一种隐性行业悄然蔓延,他们的噱头就是,消除个人不良记录。

催生灰色业务

大飞(音)金融公司是一家地级市的小额贷款公司,除了无担保无抵押贷款、商品小额分期付款服务、互联网金融等日常业务以外,他们还有一项隐

藏的业务,洗白不良记录。

“除农行、建行、中行、工行外!其他银行征信不良、信用差、有逾期的一律抹平,删除!让您从此贷款无忧!”李超(化名)是这家公司的职员,近期,他在各个微信群、QQ群里,发布这样的消息。

据李超称,除了四大行以外,如果在当地其他银行办了信用卡,出现逾期等各种情况导致个人征信中有不良记录,都可以通过该公司的“运作”来消除。

如果一个客户有一张一万元额度的信用卡出现不良记录,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客户向信用卡内存入不低于其额度,即1万元的现金,然后在该公司“运作”期间,保持卡内金额不变,不超过10天即可办理完毕。

至于费用,李超说,前期先交50元,通过查询央行记录,如果不良记录得以消除,另付600元。

“这个业务主要是针对我们公司自己的客户。因为跟很多中小银行都有长期合作的关系,如果客户由于不良记录无法向银行贷款,我们就会通过合作银行,与央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联系,最终消除不良记录。”李超说。

“现在我们把这个业务推广,主要也是希望吸引更多的客户。”

前期50元的预付款,简单的方法,消除记录后付全款,在普通客户看来十分简单也没有过大风险。而如果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中显示不良记录,则会面临无法向银行申请房贷、车贷的结果。两者相比,很多人愿意试一试。

但官方却是另外一套说法。

多家银行信用卡中心客服称,正常情况下,如果是客户由于自身原因导致的不良记录,如认为情况特殊,可以向银行申请,再由总行交由各地分支行处理,但绝大多数不会被允许。另一种情况是由于银行系统,比如没有录入记录等非客户原因造成,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向银行申请,通过的几率大很多,但过程非常繁杂。

“但每家银行评估的标准不同,所以是否能消除记录还需视情况而定。”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凤凰周刊》,“如市面上所说可以消除不良记录的情况,大多是骗局,即便真可以操作成功,也是有个别工作人员违反工作条例操作的个别行为。”

央行石家庄中心支行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解释称,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和《信用信息基础数

据库个人征信异议处理业务规程》的规定:个人认为信息错误、遗漏的,可以向征信机构或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异议受理部门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处理。如经金融机构确认,确为金融机构在数据采集、录入等环节出现错误导致的不良信用信息,金融机构应予以消除。

一位央行分支机构相关人员对记者表示,通过企业的这种“运作”消除不良记录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消除不良记录的过程很复杂,比如一家银行的分支行要消除一位客户的不良记录,首先要将申请报到这家银行的总行,再由总行报到人民银行总行,而如李超所说通过央行地方分支机构消除征信记录,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正规牌照为何迟迟不发

长久以来,央行的征信中心,几乎是所有金融机构评价和判断个人信用情况的唯一渠道。但是对比发达国家80%以上的个人信用体系覆盖率,中国央行征信系统收录的8.64亿自然人中,仅3.61亿人有信贷记录,占所有人口的比例不到27%,大多数没有信贷记录的自然人信用记录几乎为零。不仅如此,另有将近5亿人群是没有被收录在央

行个人征信系统内的。

也正是由于个人征信来源的单一，且覆盖程度不高，许多人的真实信用状况并不能被确切体现。所以才会出现原本信用比较好的自然人，可能会因为一次偶然或意外的逾期还款，而导致个人信用错判，进而被金融机构拒之门外的情况。

于是，类似于大飞(音)公司的灰色生意，无论是否是骗术，才会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大陆监管层显然早已开始酝酿改变。

2015年1月5日，央行发布《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芝麻信用、腾讯征信、深圳前海征信、鹏元征信、中诚信征信、中智诚征信、拉卡拉信用和北京华道征信八家机构做好个人征信业务的准备工作，准备时间为6个月。

距离市场推测发牌的时间已经超过4个月，但央行至今并未有明确的时间表。与此同时，在7、8月份大家预测即将发牌的时点，十分活跃的8家获准机构目前也少有消息。

“各家在最近都比较低调。”首批获准的一家机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也很着急，因为毕竟现在都是公测阶段，跟持牌经营还是有很大差别。”

至于迟迟未能发牌的原因，并未有机构给出官方回复。而此前业内就有猜测称，监管层没有在6个月准备期结束后立刻发牌，原因就在于监管层和业界对第三方个人征信机构在保护隐私和数据安全方面仍存担忧，因此更为谨慎。



↑ 2015年10月15日，上海，2015中国国际金融展现场，参观者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展台前咨询。

也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央行征信局近期将发布对征信业务的一项监管指引，包括对个人信息如何采集、授权、使用用途等作出规范要求，预计在牌照下发时一起发布。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发表文章称，在现有的制度与政策设计中，对于互联网征信的战略定位、发展思路、问题与挑战，还未进行有效的“顶层设计”，同时相关概念还需要进一步阐释。

这或许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个人征信牌照推迟的原因。

竞逐千亿征信市场

虽然首批8家发牌时间一再推迟，但这并没有阻挡大陆征信市场对于机构的吸引力。有消息称，目前已有三十多家企业有意申请第二批征信牌照，包括百度、京东、快钱、小米金融等公司。

不止一家机构和个人提出对未来征信市场规模的预测。

平安证券发表的征信行业

专题报告《计算机行业征信市场系列研究》预计，中国征信行业未来市场规模将达千亿元，其中企业征信市场规模有百亿元，个人征信市场规模有千亿元。

安信证券报告预计，按征信市场规模测算，短期超过300亿元，长期超过1500亿元。

中诚信征信董事长孔令强在公开场合表示，整个征信市场规模难以预估。他指出，美国除去三大征信中心以外，有400到500家数据公司，如果按照征信机构所做的市场计算，一万亿元也不为过。

央行征信管理局局长王煜并不那么乐观，他认为，征信服务只是为信息使用者管理和决策提供外部信息参考，只是在主体决策中起辅助作用，征信市场的容量有限。

即便是前景广阔，在众多机构参与的竞争中存活也并非易事。

从目前获准的首批8家个

人征信机构来看，以鹏元、中诚信、中智诚为代表的传统征信企业已经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深耕多年，并拥有坚实的地域和行业背景。

而芝麻信用、腾讯征信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虽然在此前并未过多涉及个人征信领域，但强大的互联网基因，提供了大数据、多场景等优势，也难以小觑。

即便如此，征信机构要跨越个人征信业务在个人数据采集、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等方面的障碍，并非易事，更何况还有不断涌入的不同背景的竞争者。

11月末，大陆一家媒体报道称，央行征信中心以及其控股的子公司上海资信有限公司均有望取得个人征信机构的牌照。此前的官办机构市场化，机构称，将使得征信市场格局更加清晰。

根据征信行业的产业链，平安证券总结出个人征信公司经营成功的关键：一是数据来源的范围和准确性；二是数据处理能力；三是数据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客户要求、是否具有多样性。

当然，所有基于目前市场的推测和判断似乎都为时尚早，首批8家牌照发放和细则出台后的方向，可能更具参考价值。

一家首批获准的机构相关负责人对《凤凰周刊》称，很可能如同互联网世界一样，先入者比后来者的优势要大得多，一旦占据某一细分的优势领域，其他的竞争者将很难参与进来。●

资金链紧绷 大陆企业债务风险加剧

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资本市场大幅波动，让大陆民营企业的资金链紧绷，企业债务风险加剧。如处理不当，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记者/赵福帅



“愈”演愈烈的温州民间借贷风波已经蔓延至整个制鞋产业链，对行业的侵蚀越来越严重，由于银行贷款没有有效增加，导致越来越多的行业企业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停产倒闭。”温州鞋革协会日前如是表示。温州市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两链三险”（资金链、担保链和企业风险、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依然错综复杂。

温州不是个案。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近期在大陆各地普遍存在，内地黑市有的利率达到20%、30%甚至更高。

另一方面，通过与美、英、

德、日四国比较，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已经最高，其隐含的风险值得关注。因为在中国，企业风险很容易传导给银行、财政，最终导致整体经济风险。

目前一些内地企业已经出现利润不足以支付利息，资不抵债。银行担忧被传染，出现对企业“挤兑”即抽贷行为。

2008年后全球杠杆率上升主要归因于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认为，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下一场债务危机的主角。

中国资产负债表风险最高的非金融企业部门如何去杠杆，同时缓解融资难、融资贵，这看似矛盾选项，是对中国

的一大考验。

脆弱的资金链

“温州很多企业目前的困境并不是纯粹的经营不下去了，而是被联保牵连，导致的资金链问题。”温州汽摩配协会秘书长章金木告诉《凤凰周刊》，企业的“担保、互保链”问题仍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章金木表示，原本靠自有资金周转的一些温州企业近期日益依赖银行贷款度日。

温州民间借贷风波让大批企业因联保被牵连，陷入经营困境。比如参与联保的10家企业中有1家企业出问题，其他9家就会被牵连，这9家企业又会

通过联保牵涉到更多企业。虽然被牵连致倒闭的企业很少，但这些企业帮助弥补出问题企业的资金缺口后，原本的自有资金已不足以周转。

温州企业的银行贷款需求因此增加。更多使用需要支付利息的银行资金，最终推高了企业运营成本。同时，参与联保企业的信用等级也受到拖累，银行虽迫于当地就业与经济而继续发放贷款，但仍会减少贷款额度等，以规避不良贷款风险。

在章金木看来，温州企业的资金困境是源于当年“4万亿”的宽松信贷环境。

“当时，各家银行都送上

门来要给企业贷款,跟老板们说,你的工厂这么好,干吗不贷点,连这点利息都付不起吗?老板碍于面子,就借了。眼见一家银行贷款成功,其他银行都冲上来了,老板就彻底晕头了,借了大量资金,工厂根本用不完。就搞多元投资,地产、矿山之类。这个过程中,就需要企业间的担保。结果形势一变,血本无归。”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温州市房价从2011年底的均价21000元/平方米,一路降至目前的13000元/平方米,几近腰斩。

“借贷风波对实体经济冲击很大。前几个月的股市上涨行情,温州老板们没大参与,没人敢炒股了,没有当年的劲头了。”章金木说。

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严峻的下行趋势对温州企业更是雪上加霜。

今年上半年,温州汽摩配行业总产值增长5.02%,销售额为-3.48%,出口额为-9.53%,利税-3.74%,这是10年来第一次三个指标同时负增长。一些年产值2000万元左右的小企业出现负增长,有企业订单下降20%-30%。企业利润率逐年下降,2012年52家统计企业利润率11%,2014年为9.4%,减少1.6%,差企业利润率只3%左右,一般企业7%左右。

1-7月,温州鞋革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产值增长3.1%,利润增长1.2%。

“50%的企业没赚没亏,30%的企业亏,20%的企业还赚钱。”人民电器集团董事长、

温州电气协会会长郑元豹告诉《凤凰周刊》。

他介绍,电气行业近年由于产能过剩,核心技术缺失,劳动力成本、财务成本的不断上涨,价格与渠道的恶性竞争逐步升级,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减弱,这也导致了目前的资金困境。

“已经是恶性循环,一些企业欠款越来越多,还款越来越难,诚信越来越差,因为行业长期处在低迷状态,企业就一直缓不过来。”

温州电气协会认为,温州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未能从根本上得到破解,“担保、互保链”问题仍是影响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据调查,温州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资金短缺,而真正能贷到钱的约只占10%。“贷不到资金除企业本身的问题,主要是银行方面对中小微企业用老政策、老眼光看问题,如利率上浮造成企业融资成本过高,在贷款的同时要求企业买理财产品、一定量的转储、手续费等更使贷款企业雪上加霜,这样就严重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温州电气协会表示。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丁益在一次论坛上表示,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近期在全国普遍存在,即便优秀的民营企业也借不到钱,或成本非常高。“我调研一家石化企业,银行会给中石油、中石化6%利率,给民营企业却是12%,300亿元的债务,一年36亿元的利息成本,可是央企只需18亿元。”

实际目前内地黑市的利率达到20%-30%甚至更高,可见实体经济的融资困境。

全国政协委员、时代集团公司总裁王小兰认为,除了利息高,造成中小企业资金问题的一个原因是银行大量信贷资源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占压;另一重要原因是三角债,“央企占着中小企业几万亿元资金,现在不是我们缺钱,是他们缺钱,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没法过。”

企业债风险承压

类似温州企业的资金困境恐怕短期难以解决。在内地现有的金融结构与政策下,解决

企业资金问题,可能意味着杠杆率继续上升。

目前,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风险最大。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编制的《中国资产负债表2015》,截至2014年底,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由2007年的54%上升至2014年的60%,远高于美国、英国,与日本、德国接近。非金融企业负债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195%上升至2014年的317%。总和杠杆率由2008年98%上升至2014年149.1%,猛增了51%。扣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杠杆率也上升了25%。

通过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国比较,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最高。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极小,因为即便发生问题,也有足够的资产去覆盖。

截至2014年底,按照宽口径统计,中国主权资产为227.3万亿元,主权负债124万亿元,资产净值103.3万亿元,超过一年GDP的规模。窄口径统计,中

2004-2015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国主权资产净值为28.5万亿元，大概是GDP的一半。

但李扬也提醒，随着全球经济进一步下行，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行，一些潜在债务可能变成实有债务，中国主权净资产的增长动态有可能逆转。

“企业的债务问题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因为在中国，企业出问题马上就是银行出问题，银行出问题马上就是财政出问题，财政出问题立刻就是整体经济出问题，中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传导链条。”李扬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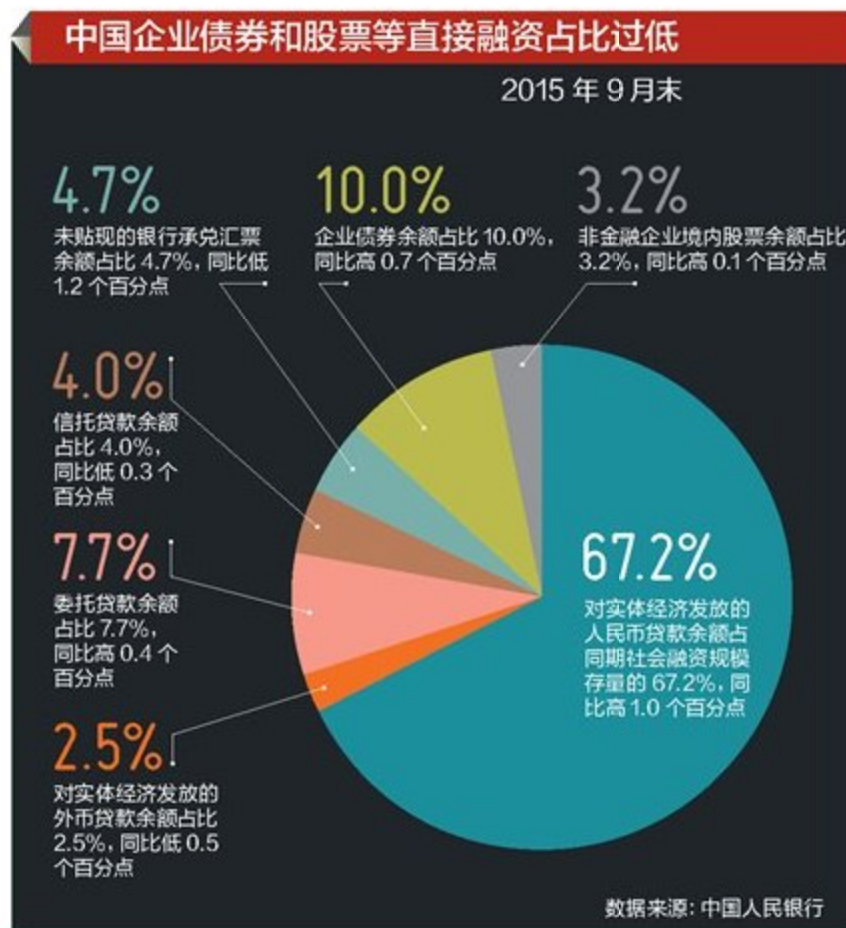
目前中国实体企业的利润率普遍只有个位数，一些企业甚至不足以支付借款利息，频现资不抵债、债务违约事件。银行由于担忧被传染，已经出现对企业的“挤兑”行为，一些运行良好的企业也受到波及。王小兰就表示银行抽贷非常普遍。

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业也在承受经济下行和债务风险压力。截至三季度末，内地银行机构不良率仍处于健康水平。不过，除宁波银行外，其余15家上市银行不良率较2014年末均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其中，招行、农行、兴业银行不良率上升幅度较大，均上升近0.5个百分点。农行不良率最高，为2.02%。不良率2%是衡量银行业健康状况的重要界限。

“去杠杆”化解债务风险

中国的非金融企业部门如何缓解融资难、融资贵，同时减去高杠杆，这一看似矛盾的选项，对中国企业、政府、金融机构都是极大考验。

李扬表示，从“债务率=债



务/收入”这个公式出发，去杠杆策略可有“分子对策”和“分母对策”两类。

分子对策即对债务进行调整，手段包括偿还债务、债务减记、政府或中央银行承接债务、降低利息支出等。

其中，偿还债务是去杠杆的基本途径，用出售资产的方式偿债更是去杠杆的正途。但是，这种方式可能产生严重副作用，导致在本次全球危机中比较常见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因为在经济下行时，资产卖不出价钱，而且出售的是优质资产，从而进一步加速经济下滑。

债务减记则不具有足够可行性，因为一旦减记发生，就造成软约束，企业都会形成赖账预期，最终冲击社会信用体系。

政府或央行也可以暂时承接债务，但是未来终究会退出，“现在美国就是投鼠忌器，因为卖哪个哪个跌，相关行业就会

受到影响，危机的恢复阶段可能更复杂。而且政府购买会加重税收负担，也会产生债务。”

分母对策实际就是增加GDP，具体路径是推动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提高经济效率。“想来想去，所有可行的办法，最终只有一个就是发展经济和改革，并以此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同时控制债务增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李扬说。

不过，中国企业部门不仅要降杠杆，更重要的是缓解资金压力，杠杆转移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比如把一部分企业的债务变成银行债务或者其他企业的债务，通过债转股把债务变成股份等。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在“新供给圆桌论坛”上建议，为降低中国企业部门的高杠杆，同时缓解企业资金压力，首先要将企业债权融资形成的负债通过股权融资而

减少；其次是将企业银行贷款中偿还压力较大的部分转化为优先股，为企业债务提供降杠杆的时间；而后是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偿还银行贷款，有效降低债务利息压力，提高债务资产的流动性和标准化，通过直接融资也能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银行贷款利率一般在5%-7%左右，而债券利率在3%-5%）。

目前，中国企业有超过33万亿元的中长期贷款，姚余栋计算，若能将30%即10万亿元转化为公司或企业债券，这将有效提高银行信贷空间，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预计共节省利息2000亿元。

实际上，中国非金融企业负债率过高，与中国的金融结构密切相关。银行贷款仍是中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截至2015年上半年，作为间接融资的贷款仍占社会融资总量的67%，作为直接融资的债券和股票融资，分别仅占9.58%和3.16%。由于贷款只能形成债务，从而推高了中国企业的杠杆率。

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就提出，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这也是在中共文件中首次提及“去杠杆”。

李扬同时认为，应重新审视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活动的规定，“银行掌握了最大规模的资金，不许投资，只能都形成债务。”

□ 编辑 王毕强 □ 制图 美编 虎妹

链接

百城住宅均价连续七个月环比上涨

自今年5月份房价止跌回升后,百城住宅均价已经连续七个月出现环比上涨。同比来看,在经历连续十个月下跌后,目前已连续四个月呈现上涨态势。



从涨跌城市个数看:

- ★ 41个城市环比上涨
- ★ 56个城市环比下跌
- ★ 3个城市持平



与上月相比:

- ★ 11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减少7个
- ★ 其中涨幅在1.00%以上的城市有8个
- ★ 较上月减少9个

1.00%

11月价格环比下跌的城市数量增加4个,其中跌幅在1.00%以上的城市有15个,较上月减少6个。



同比来看:

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均价较去年同期上涨2.93%,涨幅较上月扩大0.86个百分点。



按中位数计算:

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价格中位数为7063元/平方米,环比下跌0.74%,同比上涨1.26%。



另外,北京、上海等十大城市(新建)住宅均价为20391元/平方米,环比上涨0.99%,涨幅较上月扩大0.34个百分点;同比上涨7.63%,涨幅较上月扩大0.98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中国指数研究院

解读

社科院:明年房价或断崖式下跌

【本刊综合】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3日发布的《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5-2016》称,房价在经历较快上升后,2016年第二季度后,有出现一波断崖式下跌的可能;但商品房投资有望缓慢回升,对经济增长带动有望增强。报告认为,2016年住房市场回暖基础不稳,波动风险较大,分化趋势严重。在整体经济趋势没有重大变化和没有重大举措出台的情况下,有鉴于2015年商品住房销售接近2013年的峰值,改善性需求大幅释放,商品住房销售增长比较乏力,库存压力缓解有限。2014-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呈现俯冲式下降。商品住房投资增速从2014年的9.2%下降到2015年1-10月份的1.3%。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直接贡献几乎为零,与2014年相比较对经济增长率降低0.21个百分点。报告认为,在当前市场环境和预期影响下,金融机构资金供给结构的不均衡,是导致“销售增加,库存增幅减低,但价格明显回升,投资增幅剧降”的主要原因。

房价明年或继续上涨

【本刊综合】2015年以来,深圳、北京、上海、苏州等城市房价上涨明显。业内人士预计,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预计明年银根会继续放松,货币政策继续量化宽松是大概率事件,加上今年地王频出,明年房价可能出现新一轮上涨。据统计,全国房价已经连续7个月上涨。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对100个城市新建住宅的全样本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11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0899元/平方米,环比上涨0.46%,涨幅较上月扩大0.16个百分点。业内人士预计,未来,一线、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将保持住珍贵的销量回暖势头,部分经济发达的三线城市楼市成交量也有望步入上行,而库存过高的四线、五线城市,在人口外流、产业空心化的背景下,仍需经历一个较长的库存去化周期,楼市供过于求的矛盾才能逐步得到缓解,因此,政策需要有针对性,这样才能根据不同城市房地产发展情况,有的放矢。

7个月

焦点

房地产政策定调,促进持续发展

【本刊综合】“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11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为中国的房地产政策定调。

目前,《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送审稿)》已公开征求意见,拟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包括可以公积金购买地方政府债券等,实施后有望进一步促进住房消费。

近日,住建部已经确定,在“去库存”成为稳定住房消费政策的背景下,2016年城市棚户区改造的任务目标或将创下历史新高。随之而来的,则是城市棚户区改造及其货币化补偿安置,将成为2016年楼市去库存的最主要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山西、四川、甘肃、安徽4个省份明确发文取消了限购政策。而多数城市限购的松绑是在去年下半年,在46个限购城市中,目前仅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一线城市在坚守。

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对于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依然重要。但是今年以来,投资比较疲软,是经济下行的最主要原因,而投资下行中最重要的还是房地产投资的下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2.4%,降幅比9月份收窄了0.7个百分点。前10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78801亿元,同比增长2%,增速比1月份至9月份回落了0.6个百分点,继续呈回落走势,但回落幅度比上个月收窄了0.3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大幅回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GDP,为经济增长蒙上了一层阴影。在稳经济的前提下,通过提振楼市信心来拉动房产投资和消费,将成为最直接有效的手段,由此需要加大去库存、改善房企投融资环境、多方位刺激企业投资,助推楼市平稳发展。

外国记者 镜头里的西藏

青藏高原海拔超过4000米，是地球上最远离尘世的地方之一。这里自然环境严酷，像南北极一样并不适合人类居住，但许多人为听寺钟一鸣，闻熏香一缕，或嘬上一口腥味十足的酥油茶，看一眼远离污染世外桃源般的景色，朝圣般沓来。

金色的阳光洒落在藏区白雪覆盖的高山上，东亚的几大河流皆发源于此，冬季里雪山冰封，等待春天消融后浇灌远方的土地。蓝白色的天空下，或有卡车孤独地行驶在藏区冻土带的公路上，或有野马和藏羚羊在雪原中呼啸飞奔。穿过青藏高原的铁路开通后，藏区高原的旅行更令人着迷。那些海拔超过5000米的山口，现代技术的发展令氧气直接通过管道泵送进旅客的鼻孔，也使得高原反应不再成为游客好奇心的阻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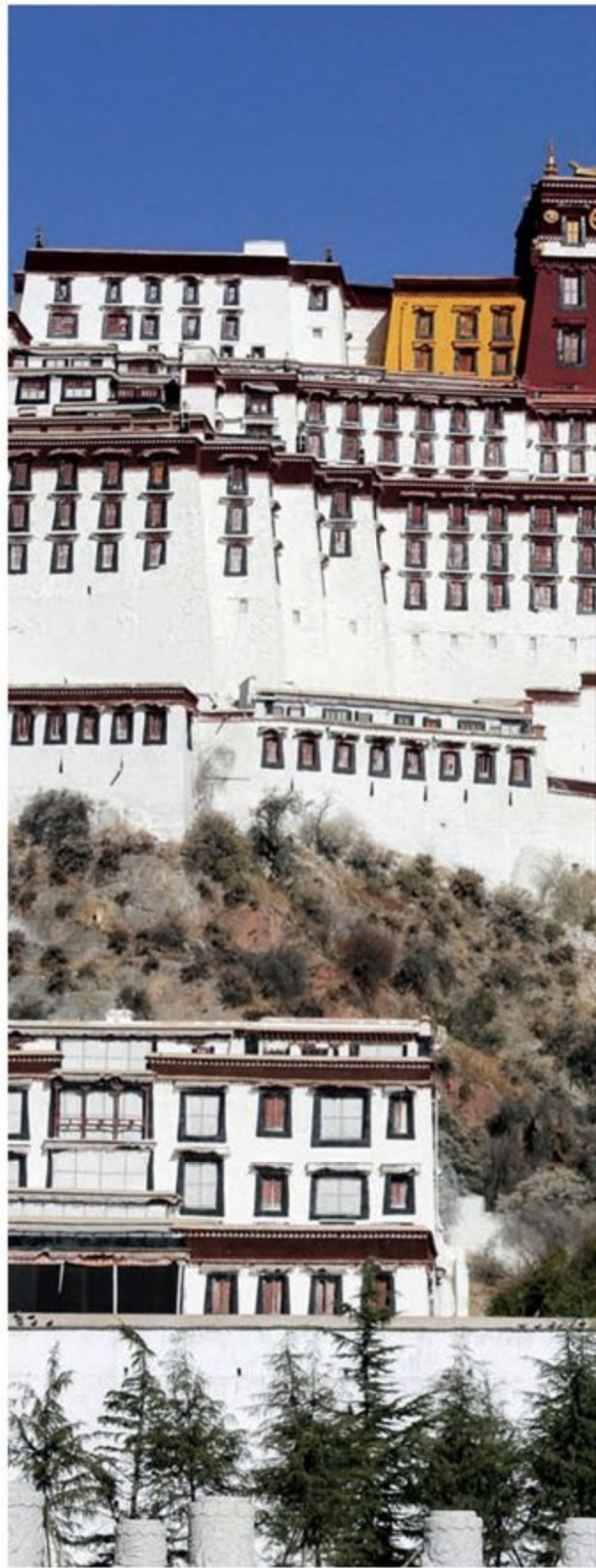
西藏吸引人的不仅是自然风光，更有历史文化。佛教据称从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地区。它吸收了西藏本土宗教——苯教及民间宗教的大量内容和形式，并受到周边地区多种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的藏传佛教。它拥有浩繁的藏文经籍，丰富的教理、教义，完整

的寺庙组织结构，严格的学经制度和修习次第以及独特的活佛转世制度等。近代以来，藏传佛教流传到世界各地。有数据称，西藏自治区现共有藏传佛教寺庙1700多处，住寺僧尼约4.6万人。

在西藏，某个角落的时光仿佛凝伫不改，转身又看到繁华巨变。这里风物出尘，又处处显现独特的凡俗细节，动人心怀。磕长头这种以性命为献祭的奇特朝圣之举，放在这样的环境里，看过去自然平和。

2015年11月16日至20日，中国外交部外国记者新闻中心打破常规地组织驻华外国记者团赴西藏采访，来自路透社、美国彭博新闻社、英国《金融时报》、俄罗斯全国广播电视公司、法国《费加罗报》、德国《时镜》周刊、意大利安莎通讯社、西班牙《阿贝塞报》、韩国联合通讯社、日本《每日新闻》、哈萨克斯坦“24KZ”电视台等11家媒体的14名记者参加此次活动。这是近年来外国记者在西藏最大规模的公开采访，本文筛选了此行当中，路透社摄影记者Damir Sagolj镜头下记录的西藏。

（曾鼎）





2015年11月17日，一名武警在拉萨布达拉宫前站岗。布达拉宫依山而建，气势雄伟。这座规模宏大的宫堡式建筑群最初由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兴建，后来被毁重建，日后成为历代达赖喇嘛的冬宫居所。整座布达拉宫现存有房屋近万间，全部为木石结构，布达拉宫现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拉萨市当雄县藏民Lob Sang, 他的家中墙壁上装饰有中国历届领导人的画像。在2015年11月中国政府组织的这次访问中, 外国记者们拜访了他的家庭。西藏政府曾广泛开展送国旗、送领袖像进村入户进寺庙的活动, 此前有报道称已赠送国旗、领袖像100余万面(张)。西藏人大原主任向巴平措曾表示, 对西藏而言, 送领袖像,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是西藏特有的一种方式, 有历史传统。



2015年11月16日, 拉萨老城, 人们在一家商店里打麻将。有藏族作家曾感叹麻将文化给此地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拉萨除了农村和牧区, 打麻将将在城区已经蔚然成风。“一个藏人, 不会说汉语却会说所有麻将牌的名字, 在今天已经普遍。”



2015年11月18日，一名藏族妇女坐在纳木错湖旁边的家中。外媒记者团在政府组织下前往拉萨市当雄县纳木错自然保护区，走访农牧民家庭，体验西藏传统文化。纳木错湖周边的牧民一度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旅游开发以前，这里没有旅店，鲜有车辆，只有来转山转湖的信徒。现在，很多当地牧民做起游客的营生——出售民族手工艺品，办餐饮，还有牧民在湖畔牵着自家的牦牛，供游客拍照留影。



2015年11月16日，拉萨的老城区，一名藏族男子在转动转经筒。西藏几乎随处可见转经的人，人们认为转经就相当于念经，是忏悔往事、消灾避难、修积功德的最好方式。转经筒一般用布、绸、缎、牛羊皮包裹，也有用木、铜制成。依据藏传佛教的教证，凡转动经筒一回，等于诵读了一遍内藏经文，转经筒一般为顺时针方向转动。



2015年11月18日，一名藏族男子俯卧在地上朝圣。“磕长头”是藏传佛教信众最至诚的礼佛方式之一，磕头朝圣之人五体投地是为“身”敬，口中不断念咒是为“语”敬，心中不断想念着佛是为“意”敬，三者得到统一。这名信徒的前方是一片湛蓝的湖水，在远方的天地间舒展开来。它是纳木错湖，藏语意为“天湖”。这里距离拉萨4小时的车程。纳木错湖面海拔4718米，不仅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也是每年信徒们朝拜的圣地。



2015年11月18日, 22岁的李静(音)与她23岁的丈夫许可(音)穿着藏族传统服饰, 在念青唐古拉山脉的经幡前拍摄结婚照, 画面中的经幡在藏传佛教里是为平安祈福的象征。这对新人并不是游客, 他们来自湖北十堰市, 已经在西藏居住了3年, 并于10月成婚。在西藏, 藏族人口目前占据大多数, 常住汉族人口将近10%。



2015年11月17日, 一名藏族妇女沿着布达拉宫的围墙祈祷。“布达拉”为梵文“Potalaka”之音译, 意为“佛教圣地”。布达拉宫几乎所有宫殿、佛堂和走廊上都绘满了佛教壁画, 周围还有各种浮雕。这些壁画和雕塑大都绚丽多彩, 题材涉及高原风景、历史传说、佛教故事和布达拉宫建造场面等, 历史和艺术价值极高。

消失的“红色联盟”

华沙条约组织诞辰60年祭

文/李星



2015年是华沙条约组织(以下简称华约)诞生60周年,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东欧各国,都未举行公开纪念活动。但这个已烟消云散的庞然大物,仍然隐藏在东欧各国的集体记忆中,牵动着东欧各国的敏

感神经。

2015年5月23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出一部纪录片重提旧事,宣称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是为了制止西方帝国主义发动军事政变,苏联领导的军事联盟

即华约仅仅是面对北约侵略性联盟的一个防卫性组织。这一立场不仅与叶利钦当局曾经为入侵道歉的既往表态不符,也引发了捷克外交部和斯洛伐克外交部的一致抗议。

在更早的2015年3月,于东欧参加军演归



1955年5月13日，八个东欧国家在华沙政府宫秘密开会，筹建一个军事联盟对抗北约。翌日，华沙条约组织宣告成立。

来的美国陆军第2骑兵团第3中队，选择取道捷克返回自己在德国南部的驻地。当“斯特拉克”装甲车等美军车辆隆隆经过布拉格街道时，部分民众自发走上街头，挥旗欢迎。同样的欢迎仪式，也发生在车队经过波兰、立陶宛

等东欧国家时。如此一幕能够产生，固然与这些国家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转换阵营，并且属于北约的“优等生”，人民深受西方思想影响有关；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如实反映了一部分东欧人的心理。

诞生是手段，解散是目的

华约是二战的女儿，各国军队先于国家诞生，它们是苏联亲手缔造并直接指挥的武装。1943年，考虑到反攻东欧的前景，苏联将手中掌握的波兰人与捷克斯洛伐克人组建成了民族军队。次年，随着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各国先后脱离轴心国并转入苏联阵营，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军队进行了改造，清洗了苏联人眼中的“反动分子”，派遣了政委予以指导。二战结束时，苏联掌握的东欧盟军已有50万之众，这些军队都被纳入苏军方面军的指挥序列内作战，并有大批苏联“顾问”和苏联籍指挥人员占据关键岗位。

如果说北约的同盟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共同的恐惧之上，那么华约更像是捆绑而成的夫妻。苏联之外，华约的成员国几乎都是苏军进占半个德国时的附带战利品。它们不仅为苏联赢得了战略缓冲区和意识形态防疫带，也为苏军进行《国际歌》中所唱的“最后的斗争”提供了跳板。

用斯大林的话说，这次大战与此前的战争都不同，谁占领了哪里，谁就可以实行自己的社会制度。苏联正是这么做的，它的国家机器像一台巨大的剪草机一样，对东欧这块长短不一的草坪，按苏联的需要用锋利的剃刀进行统一塑造。赫鲁晓夫曾清醒谈道：“这些国家（东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十分心甘情愿做我们的盟国……战争结束以后，斯大林对待这些国家十分粗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在他的心目中，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只得把斯大林为我们准备好的这碗汤喝下去。”

存在着强烈的排异反应，苏联维持东欧帝国的成本相当高。且不算将东欧格式化所

需的成本，驻外苏军每师的军费开支至少是驻扎本土时的两倍。战后短暂的窗口期，苏联高层围绕如何处理东欧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争论。贝利亚提出将东德从代价巨大的“苏维埃化”转向“芬兰化”，虽然被否决，但能看出经济花费是东欧问题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奥地利共产党提出仿效东德，建立独立于西方占领区的奥地利苏维埃国家的提议，于1948年被莫斯科正式否决。理由是，将奥地利的苏占区作为和西方的谈判筹码，要比创造一个高度不稳定、需要花卢布和刺刀去维持的卫星国更为有利。

苏联最初并不需要华约这一工具。驻扎在东欧的苏联坦克；东欧各国军队中的苏联顾问和苏籍指挥官；仿照克格勃建立并与克格勃保持密切业务联系的各国内务部门这“三驾马车”，足以将东欧牢牢控制在苏联手中。1950年代中期，西德的再次武装化并加入西方同盟，使得苏联人惊恐不已。莫洛托夫甚至提出两个德国同时举行大选、统一后的德国非武装化的条件，来换取西德停止武装。在这一提议失败，西德于1955年正式加入北约后，苏联转而成立了华约。

但这更多只是权宜之计，华约并不具备像北约那样完善的内部组织和决策机制，苏联只是将华约作为筹码不断呼吁同时解散欧洲的军事集团。原因很简单：一旦苏联的提议实现，东欧的状况不会有任何改变，而面对苏联坦克尖刀的西欧只剩下一片散沙般势单力薄的国家，美国的救援力量又远在大西洋彼岸。

东欧国家最初就跟随着苏联的外交指挥棒起舞。随着苏联的中东外交政策在1940年代至1950年代的急剧转向，捷克人先是向刚独立的以色列国运去了武器，又在1950年代为埃及训练米格-15飞行员。在1970年代之后，随着苏联活动的触角逐步向非洲、中东和拉美伸展，东欧开始对诸多新“人民民主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援助。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是苏联的主要代理人，它们主要负责提供苏式



武器装备、零配件和人员训练。它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包括北越、安哥拉和尼加拉瓜。此外，它们还在本国为第三世界国家培训军事人员和安全机关人员。匈牙利和波兰履行自己国际主义义务的方式，则主要体现为提供经济援助和派遣专家顾问。

苏联国防部的延长手臂

1950年代初，随着冷战边界逐步凝固，苏联进一步按照自身面貌对东欧军队予以整编：逐步使用工农出身的军官取代此前的职业军官；将战前的各国共产党人充实到政工岗位上；同时大量取消东欧军队中的传统特色符号、服装、编制，在各方面尽量与苏军看齐。在这一过程中，波兰陆军军官失去了起源于18世纪的四角野战帽，罗马尼亚军队也失去了他们引以为傲的喀尔巴阡山地师。

随着东欧各国的非斯大林化，苏联对东欧的直接控制有所放松，如召回大批驻东欧各国军队的顾问和指挥官。苏联此时

才开始认真考虑，如何使用华约这个工具来加强对东欧军队的间接控制。例如，华约总司令和总参谋长都由苏联单方面指派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与第一副总参谋长出任。苏联外的每一个华约国家首都皆有一名苏军上将坐镇，充当华约常驻代表。他们级别与驻在国的国防部长相当，权限则有所过之，他们有权监督和指导所在国的军队训练与政治教育，以确保该国军队与苏军保持高度一致。

1960年代初，苏联又一手促成东欧各国军队的机械化，苏制T-54/55坦克、自行火炮、近程常规弹道导弹、米格-21战斗机、苏-7攻击机逐渐成为华约军队的标配。经过这两轮整编，使用苏械、按照苏联条令训练、采用苏式国防学说的华约各国摩步师、坦克师，成为可以任凭苏联上级调遣、编组的标准模块。

东欧各国军队是无法脱离苏联而作战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像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军队一样，是没有独立性的，关键部门

都有苏联军官，它的装备和技术设施（如军事通讯联络、密码等等），苏军不仅熟悉，而且是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捷共中央委员兹德涅克·姆林纳日回忆，“军队的部署情况也使我们根本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来抵抗华约集团的盟国对我国的侵犯。这支军队的指挥员的情况也不能确保在发生上述冲突的时候，不站到苏联方面去。”

此外，东欧军队也不具备独立的国防政策。捷克总理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吐露，根据苏联的定位，捷克军队的作战方向主要向西、部分向南，面对苏联和其他华约国家的后方基本不设防，所以面对来自华约的袭击时毫无抵抗能力。

武器装备上也有类似的情况。苏联提供给华约国家的武器装备往往要比本国落下一代。当驻东欧苏军已经全面换装T-64、T-72坦克与BMP-1步兵战车时，华约国家还在使用T-54/55和BTR-50、BTR-60装甲人员运输车。1971年投产的米格-23战斗机，直到1970年代末才开始装备东欧空军。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1970年代末,苏联转向富裕的中东国家出售武器换取外汇,本该装备东欧的苏式武器被大批卖给了在赎罪日战争和贝卡谷地空战中损失惨重、亟须武装的阿拉伯各国军队。1980年代,苏联的第三世界盟友如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叙利亚都收到了诸如米格-25战斗机等最新装备,而东欧国家却没有。苏联即便允许华约国家按照图纸生产苏式武器,这些武器也多为落后型号,或者仅为武器装备系统的组成部分。

与北约的标准化只体现在枪弹口径、通讯设备等少数几个方面不同,华约的一体化程度极为彻底。可以说,离开苏联的供应,华约国家的军队就无法维持。唯一的例外是罗马尼亚,由于担忧出现前述情况,罗马尼亚设法“请走”了苏联驻军、苏军顾问和常驻代表,并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自主研发装备,但仅限于少数轻武器和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武器,此外进口了如英国的运输机、法国的直升机和中国的62型护卫艇等装备。

华约缺乏战时指挥机构,其武装力量

受歧视的盟主

看似划一的东欧草坪之下,潜伏着高低不平的地形。一个奇特的现象是,越接近“铁幕”的国家,经济社会就越发达。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回忆,1970年代他访问苏联和东欧,当从莫斯科来到索菲亚和华沙时,感觉就像从静止的黑白照片进入彩色电影一样,社会气氛明快了许多。

东欧人自己的观察也如此,捷共领导人早在1952年看望捷克留苏生时表示:你们在这里看到了苏联人的生活条件,你们也知道,我国人民在这样的条件下是活不下去的。当你们内部谈论这个问题时,不要把它当做什么大问题,要努力去理解这种现象,理智地解决问题。

正是存在这些地区性差异,华约内部形成了一条歧视链。苏联在1980年代初对波兰报刊进行检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1980年代末对东德和匈牙利报刊进行检查。

华约组织中经济最繁荣的当属东德,以至于苏联军官把派驻东德的调令视为最

一名苏军军官回忆,他们是第一支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但当他们撤出捷克时,部队旗帜、参谋人员和主要的高级军官都返回了东德的驻地,部分作战装备也送了回去,同时,数万名新的官兵也被从波罗的海军区调入第20近卫集团军。但原属该集团军的绝大多数士兵和年轻军官,都被从捷克斯洛伐克直接送往遥远的中苏边境驻守,并接受再教育。

在成立的数十年间,华约除了占领自己的成员国或是威胁对其动武之外,军事行动主要就是各项名为“战友”、“联盟”、“友谊”、“西方”之类的大小军事演习了。此类军事演习对苏联有着—石多鸟的妙用:它能使东欧各国官兵习惯于在苏联指挥下作战,演习大多数时候是由苏联将官指挥,并能使苏联注意到各国军队指挥官的思想动态,还能防止东欧各国效法南斯拉夫的道路,制定独立于他国的本土防御方针,从而减少苏军对东欧的控制力。更直接的是,演习能使苏军熟悉东欧各国的地形,以便日后用兵。看出这一端倪的齐奥塞斯库,一再拒绝苏联在本国领土上举行军事演习,并拒绝参加华约多国军事演习,甚至不允许华约军演部队经过本国领土。

盟主苏联受到的歧视,另有不少原因来自于不愉快的军队驻地关系。一位曾经派驻德国的苏联军官愤愤不平回忆:当时德国有着英法美苏四国的军队,不知为什么只有我们被德国人视为是“占领者”。东德最后一任军职国防部长特奥多尔·霍夫曼或许可以为他提供答案:遇到东德居民反映苏军西部集群的违法建设直升机场、飞机训练扰民、实弹射击超出靶场界限等问题,和颜悦色来解决问题的苏军高级指挥官不是没有,但很少,反而是摆解放者资格,认为德国人不知感恩的多。

世易时移,1991年3月31日,华约宣布停止一切活动。7月1日,华约正式解散。作为苏联主导的国际秩序象征,它比“牢不可破的联盟”多生存了几个月。

□ 编辑 陈祥 □ 制图 美编 黄静

如果在欧洲发生了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的进攻,每一缔约国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个别地或通过同其他缔约国的协议,以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装部队,立即对遭受这种进攻的某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给予援助。
——华沙条约 第四条 第一款

预示了苏联总参谋部才是东欧这些国家武装力量的真正指挥者。例如,战时东德人民军将与苏军驻德集群合编为方面军,波兰和东德人民海军也被编入苏联波罗的海舰队。华沙条约组织大楼设在莫斯科郊外,孤零零地立于大片森林之中,与其说是国防中枢,不如说是一栋乡村别墅。苏联解体后,被从俄罗斯国防部大楼中逐出的独联体军队司令部随后入驻此地办公,充分说明了两者的类似定位。

幸运的事情。他们在那里可以购买到各类质量远胜于国产货的水晶灯、收录机、家具、地毯等物品,可供自己消费或赠送上级。购物并非最大的诱惑,苏军在东德还可以大大改善物质条件,不仅住宿和饮食远胜于苏联国内,而且军官夫人可给东德人打工赚取外快,如成批悄悄溜到德国人那里去帮助收获草莓以赚一点东德马克。

在东欧,与消费品一并输入的还有有害的西方思想。驻东德第20近卫集团军的



二战美军在英国的趣闻

“占据英国的美国兵，我深爱的古老英格兰已与往日不同，恐怖入侵已然到来。但不是，不是残忍的匈奴人，而是美国佬军队的来临。”这段歌词来自二战时的英国民谣《一个英国少女的挽歌》，表达了一部分英国人对美军的一丝吐槽。至1944年5月，驻英国的美军达到历史最高峰，人数超过150万。他们占据了1100多个地点的十多万幢英国房屋，大都集中在英格兰南部。按照自己的习俗，英国人觉得美军举止粗鲁，而且美军让交通变得臃肿，从而严重影响日常生活。让英军最讨厌的是，美军收入普遍比英国同行多五倍，英军眼睁睁看着物质充裕、消费能力高的美国兵用丝袜、香皂、香水等紧缺物资赢得许多英国姑娘的芳心，而英军拿不出这些奢侈品。一个

伦敦腔的喜剧演员，戏谑美国兵只有三件事做错了：“他们薪酬过高、性欲过剩、来到此地。”

吐槽归吐槽，英国人很感激无数美国青年前来和英军并肩作战，他们真诚邀请美国人来自家做客并享用紧张的配给物资，当然美国人会回赠很多战时买不到的食物。美国人也给英国小店、舞厅、乡村带来轻松自由的气氛。众多美国兵纠缠长官，申请就地娶英国姑娘，战后有7万名英国女人作为战争新娘远渡美国。美军的风流韵事愈演愈激烈时，一切戛然而止，美军营地被封闭，美军必须与英国女友暂时断绝联系，因为诺曼底登陆日即将开始。未几，英美军队在西欧见证了血与火的友谊。



1943年9月8日，伦敦的一家美国红十字会俱乐部门前，美军正庆祝轴心国成员意大利在当天的投降。意大利退出战争，有力鼓舞了正义阵营的士气。

福柯赞美伊朗革命

1978年9月，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以《意大利日报》特约记者身份，来到动荡中的伊朗。目睹巴列维国王被赶下台的福柯，拜访了霍梅尼，被伊朗革命和霍梅尼深深吸引、感动。他撰文赞扬：“对于伊斯兰政府，没有哪个伊朗人想过让神职人员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发挥监督或控制作用。”“对于自由，他们会加以尊重，不使他们的运动伤害到其他人；少数民族会得到保护……男人和女人之间，双方的权利都会得到尊重，不会出现不平等。政治方面，决策应由多数人来决定。”擅长晦涩后现代理论，对历史现实知识毫无积累的福柯不知道，霍梅尼早在几年前就把施政理念集中写进《伊斯兰政府》一书里。

短暂记者生涯期间，敌视西方的福柯写了15篇有关伊朗时局的文章，1994年在法国出版，作为他四卷本零碎作品的一部分。他的判断一直被法国的批评者取笑，而福柯本人早在1979年5月底就悄然放弃对霍梅尼的赞美，因为事实发展与他的预期有严重偏差。福柯还是一位同性恋且恋童癖，毕生追求性解放，嗜好性施虐受虐游戏，享受吸毒。他赞美艾滋病，并最终死于艾滋病。



福柯

文革之蜗牛事件

“康宁公司为了讽刺挖苦中国的‘爬行主义’，送给考察组每人一个玻璃蜗牛。”1974年2月，江青收到四机部宣传干事何文彬的告密信，信中除了强调对江青的忠诚，肆意制造了一个政治事件。为引进彩电生产线，四机部组织考察小组赴日本和美国考察，有意引进美国康宁公司的玻壳生产技术，康宁公司送给考察组每人一个玻璃小蜗牛工艺品。在美国，蜗牛是顽强与力量的象征。

江青回信给何文彬：“我很欣赏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已经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绝不接受任何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屈辱，我们要坚持独立，自力更生。”江青随后赶到四机部大楼，劈头盖脸骂一群负责人：“什么礼品？！这是帝国主义的挑衅，他们是在侮辱我们是‘爬行主义’！什么生产线，我们不要他的！我们要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我们要自己搞！那个蜗牛在哪里？拿出来！把它退回去！对帝国主义的挑衅，我们要坚决回击！”

四机部在内的国务院各部门紧急召开“声讨大会”，四机部向全国通报“蜗牛事件”。一时间，各部委和各省市严查收到的外国礼品中是否有“蜗牛”这类辱华物件。有单位查出“黄牛”，这可解读为“老牛拉破车”；有单位查出日本送来象征长寿的乌龟，乌龟也是爬行动物。江青的动怒直接终止了大陆与美国的彩电技术合作，成为红人的何文彬受命去南京741厂研发“争气管”，当然不可能成功，他在文革后写了七十多份检查，并被开除党籍。

↑
存放在国家博物馆的玻璃蜗牛。

黑吃黑，有人专骗人贩子

民国时期北京存在一个隐秘的犯罪群体，他们专门骗人贩子的钱，江湖人称“左事由儿”。人贩子从事非法事业，被骗后无从“维权”，只能自认倒霉。这群骗子中的“战斗机”通常有两大招数，“抓定吃皮儿”和“放老鹰”。

前者是有夫之妇装作家庭不和，引诱人贩子心生歹意，哄骗带你去关外开始新生活。假装被骗的女人动身前跟人贩子要一笔安家费即“抓定”，继而索要几套漂亮衣服以方便动身，当然最终在约定出发的时间消失了。人贩子就算能找到对方，她和你装傻到底，死不认账。

后者是被拐卖的女人和她的男人或母亲一起坑人贩子。这类女主角往往是颇有姿色，年龄正好，她的男人或母亲装作生活无以为继而高价卖掉心爱的人。女人就由人贩子带到关外，但会找准机会熟练逃回北京，然后搬一次家，或者去外地躲避一段时期。日后人贩子再遇到她，她肯定死活不承认。

日军曾流行假装肺结核逃离部队

二战日本陆军中，假装肺结核是最有效的逃离部队方式。首先你得不停干咳，接着诉说自己身体上的痛苦。一个最有效的方式，是假装在放哨时晕倒。这样一来，你会被送到后方野战医院，等候卫生兵的简单处理。过关后，被送往更后方的医院，等待军医来检查核实是否为肺病。在军医离你还有两三个床位时屏住呼吸，最终在军医面前慢慢呼吸，以便让脸色潮红、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身体发热。

军医分两种人。曾是实习军医学生、靠陆军奖学金成为军医的人，会注意到这种装病现象，他们会讽刺你：“哎，你作

→
日军二战时的护士。



为皇军士兵做出这样的事情，难道不感到羞耻嘛！”给你几个耳光，把你送回前线。从一般大学医学部毕业被征召入伍的人会同情装病者，劝慰装病者回家养病及养家是更重要的

事。所以，预先知道这所医院的军医是什么立场，乃至至关重要的情报。只要有军医写的一张重度肺结核诊断书，你就再也不会被第二次征兵了。

□ 文 陈祥 □ 编辑 段宇宏 □ 美编 黄静

导演王小帅： 时代忏悔无门，故乡温柔犹在

记者 / 刘荣



王小帅

导演王小帅的2015年冷暖自知。上半年，“有意栽花花不开”。4月30日，他的电影《闯入者》上映首日，国内院线排期不足1%，上映十天票房仍不足800万。而就在2014年，该片作为唯一一部华语影片杀入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提名金狮奖，在30多个国家展映。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王小帅有点懵，他在微博上问：“我的观众们，你们在哪儿？”

下半年，“无心插柳柳成荫”。除了短片《玉米人》在釜山电影节首映外，一不小心，他还半只脚踏入了出版界。他的第一本书，自传体随笔《薄薄的故乡》入选2015“中国最美的书”，还获得了台湾“金点设计奖”，并将代表中国图书参加2016年德

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评选。

与楚尘文化、重庆出版社共同策划这本书时是2014年底，半年后新书出版，王小帅做得似乎挺开心，以至于提到本书写作，眼睛弯弯带点笑意。为整理这本笔记，他打捞回忆，重新翻阅了与刘小东等好友的书信，收集了拍摄电影以来的珍贵资料，和设计师孙晓曦一起搞创意试验，用手写体在已经印好的纸页上批改和修订回忆，完成本书的第二道制作工序，如同一个游戏，跨界又好玩。

电影批评学者王小鲁发现，《薄薄的故乡》和《闯入者》之间关联甚大。作为一个“三线子弟”，王小帅肩负着一段历史，用“三线建设”三部曲（《青红》、《我11》和

《闯入者》）回望故乡——贵阳。从这本书出发，抽丝剥茧，最终能抵达王小帅22年影像创作的源头和母题。

手写体像在记忆中重新书写历史，而书封用一层薄薄的硫酸纸，亦真亦幻，隔开了王小帅身处的现实，抵达了他回忆与想象中的故乡。

漂泊少年：政治改变人生轨迹

黑格尔说，“故乡不是在这里或是哪里，故乡在你心里，或者说，无处是故乡”。

那么，一个出生在上海，几个月大就随家庭内迁去贵阳，13岁去了武汉，两年后去了北京，毕业后分配到福建，迄今为止户口落在河北涿州，籍贯填写着辽宁丹东的中年男人，他算是哪里人？

生于1966年，圆脸圆眼镜光着头的王小帅站出来说，这个人是我。

2003年，为了拍摄自己的第八部电影《青红》，在离开故土贵阳长达20多年后，王小帅重回自己居住了13年的“三线故乡”——贵阳新添寨。

一声贵阳乡音把他的想象击得粉碎。发小儿们讪笑：“你算什么贵阳人啊？”他愕然发现，印象中的故乡“在别处”，而半个世纪前“三线建设”者漂泊千里外的异乡，已实实在在地成为了“三线人”新的故乡。漂泊感随之产生，无论是在贵阳、武汉还是上海，都没有一种属于故乡的真实归属感。他在书里这样写道，“时间走了，童年就结束了。”

因为不可左右的政治运动，“大三线”历史上的工业迁徙，让漂泊感过早地降临在少年身上。1979年，他随父母前往武汉，

从贵阳军工厂的“上海来的外星人”，转变为工业城市武汉的“贵州来的乡下人”。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少年内心充满疑惑，心灵意义上的漂泊开始了。

在王小帅旅居武汉的两年，他时常蹬两小时单车，去长江边写生。长长的汽笛声穿过港口上空带着咸味的空气，客船载来了天南海北的江湖人，他们和王小帅一样，都经历着漂泊。

于是，王小帅反复画那些挑担的“扁担”、码头上的船工。18年后，用自己人生中的第二部电影《扁担姑娘》重现了那段记忆，讲述几个在城市底层生活的乡下人，面对现实如何充满绝望又潜藏希望的故事。看起来，这是现实主义创作美学的产物，究其源头，依旧是关联着个人成长和生命体验。看到了“漂泊”主题的王小帅在想：是什么造成了我们没有归属的命运？这个没有故乡的人还问，精神故乡在哪儿？后来他自问自答说：电影里才有薄薄的乡愁。

他在自传《薄薄的故乡》中自嘲“没有故乡”。而他用三部电影力图还原的是故乡作为军事机密并被官方语境遮蔽的历史：1960年代的支援“三线建设”的普通人和他们的第二代与第三代的命运。11岁的少年王憨，19岁的少女青红，生命暮年的老邓。王小帅用闭合式的“三部曲”讲述生命轨迹的故事，更看到了抹不去的“政治创伤”，它覆盖了数代“三线建设”者无可回避的过

去，与仍然延续的家族历史。

在“三部曲”中，虚幻的上海与现实的贵阳，破败的贵阳与安定的北京，形成了鲜明的空间对比，王小帅作为一个曾经真实穿梭其间的人，深刻体会到时间给生命带来的漂泊动荡。

边缘青年：体制外的艰难成长

早年，在第六代导演群像中，一个光着头、直接瞪视着你的王小帅，像个孩子，也隐隐出现了几分先锋与反叛气象。

虽然，今年上映的《闯入者》票房不佳，但这不影响“王小帅制造”的口碑——提名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作为中国独立影像先行者，此前他以毫不妥协、坚持个人思考与“作者电影风格”的独立精神，把22年的创作人生在海外电影节的一片叫好中铺开。2001年，《十七岁的单车》获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2005年，《青红》获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2008年，《左右》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

很难相信，青年时代，反叛者王小帅有着学院派经历和在体制内工作的前史。

1981年，他进入中央美院附中学习绘画，狂热地迷恋上了油画。1985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接触到了璀璨的电影大师群：安东尼奥尼、费里尼、侯孝贤、北野武、阿巴斯……1989年，他被体制安排，进入福

建电影制片厂。科班出身的经历并没有让他循规蹈矩，相反，他认为“知道传统是什么的学院派才会更会充满探索精神。”他还多次回顾自己青年时所经历的1980年代，“那是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黄金十年，很自由，我们很幸运。”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电影体制仍是一个庞大的、主流的存在。他用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冬春的日子》划出了与时代的界限，退居边缘。1993年，在艺术家好友刘小东的帮助下，他独立完成了这部无体制内拍摄指标的个人化电影，仿佛是一个自由主义宣言。两年后，他的《极度寒冷》更将行为艺术家这一当时极度边缘的人群摆在了世人面前。

两部讲述边缘人群的电影引发巨大反响，前者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被BBC选入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之百部最佳影片；后者则获得1997年鹿特丹电影节费比希国际影评人奖，被《纽约时报》评为最勇敢的中国独立电影。

即使“墙里开花墙外香”，他始终知道自己还是边缘的。书中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曾经同样被时代裹挟和挤压的王小帅，如何一步步被迫走上了个人抗争之路。

1989年他从电影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福建电影制片厂，面对这个自己无力改变的结局，他爬上长城，围上崔健式的红布条，对着大山喊，“再见，北京”。

“三线建设”三部曲



在福州的两年，他写了五六个剧本，却一直没有机会拍摄电影。1992年初，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一个宣告：要独立拍摄还要至少五年。绝望的他背起背包转身离开了电影厂。回到北京后，短暂失业让他再次被边缘化，他学习和恋爱过的城市视他为外来人，他的户口至今落在河北涿州。于是，一切推倒重来的无望，反映在他早年的电影主人公身上。

1993年到2003年，对王小帅影响至深。源自计划经济时代的指标制和审查制，使得他和张元等人的每一部电影都无法在国内上映，地下电影和独立电影的称呼自此出现。《扁担姑娘》的审查拖了足足三年；《十七岁的单车》则因为过审问题，差点耽误了柏林电影节的参选。因为《十七岁的单车》和《二弟》，王小帅干脆被明令禁止拍片。十年间，王小帅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立制片人，深切地感受着何为边缘，不知不觉被时代推上“斗士”的位置。

不过，暗流涌动的市场化悄然改变着一切。王小帅永远记得2003年那个针对独立导演的解禁会议，他被通知可以拍片了，与会者还有贾樟柯、张元和娄烨等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

他在书中记录，会后，“娄烨、贾樟柯和我，我们仨找了个酒吧坐下。”没有人乐观，但从那一天起，王小帅决心做《青红》，娄烨决定做《颐和园》，而这并不是一个迎合市场的决定。

愤怒中年：市场是新一轮的较量

从《薄雾的故乡》划出一道生命轨迹，即将进入知天命之年的王小帅，一步步走上严肃反思之路。

作为一个创作觉醒者，王小帅坚持当“愤怒中年”。他的影片，时常被电影批评者张献民、王小鲁和郝建等人拿来作社会学意义的解读样本。

他曾对外表达过，“导演是一个有灵魂、有自己的态度和主张、有自己的愤怒的一群人。他还拿电影当成武器，还知道至少能够帮助



《闯入者》的拍摄现场。

这个社会开刀治病，自己不要缺席，可以像诗人一样去剖析这个社会。”在《日照重庆》里，他反思家庭温暖缺失与犯罪的关系，在《左右》中，他更像新闻记者一样，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婚恋观念和伦理观念的变化及尴尬。

在始自2005年的三部曲中，摄影机像冷酷的手术刀，剖开了真实的历史——第一代思乡，第二代青年以武斗发泄青春，第三代少年的性萌动……被时代裹挟的“大三线”人，面对政治主导的一切，身不由己，成为相互戕害的施暴与受害者。

直到第一代的“老三线”人背负心魔在《闯入者》死去，王小帅依然不肯原谅时代留下的创伤，他认为“没有警钟长鸣，也没有救赎”。因为他知道，忏悔无门的时代不能重蹈覆辙。

不过，惨烈的政治创伤谋杀了时代中的个体人格，他心中却保有一个“温柔之乡”，在新书的《镜中无光》一章，他开启记忆之门，仿佛回到了那个11岁少年打量世界的视角，怀念那些最简单纯粹的事物——“门前小河里的鱼、山上丰收的板栗树、油辣喷香的牛肉粉，还有被丢弃在墙角的镜子，上面落了厚厚的灰，从未有人用过。”

除了无法抹去的历史伤痕，这些年，新的愤怒源头来自独立影片与市场与资本的较量。

王小帅记得，《冬春的日子》在柏林上映时，评委会酝酿发一笔奖金，给最穷的影片和导演，他险些拿到了这笔钱，后来被一个行乞到柏林的俄罗斯导演拿走了。

拍片没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自2003年以来，私人资本全面引入了电影制作和院线建设，“真正的市场化”时代似乎到来了。2014年，中国电影票房总收入逼近300亿元，这无疑会形成票房到资本的新一轮繁荣，然而由于院线排期不公正、前期宣发不给力等一系列原因，《闯入者》用自身的高口碑和低票房遭遇巨大尴尬，王小帅发现，商业片的春天或许已经到了，而独立电影的“黄金时代”还没来。

“我没办法去评判工业，因为工业只要把原始积累和钱扫进来就算成功。”王小帅认为，新的电影市场乱象已经出现，“一个是票房在提高，院线数量在增加……另外，独立电影却再次进入到一个类似于地下的状态……你的电影没人看，你自然就该消亡。上个十年独立电影还有人关注，但是这个十年里，大家看到大好形势之后，就很主动的把独立电影思考方式压制掉，这其实更危险！”在新书的一次研讨会上，他这样同好友王小鲁说。

这也许会王小帅未来某一本书中的新故事。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专访导演王小帅： 商业片和独立电影如何共存？

记者 / 刘荣

最美的书：手写体像是做书实录

记者：《薄薄的故乡》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被评为2015年“中国最美的书”，还将去参选2016年度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你对此有无期待？

王小帅：这是一本关于我的家庭演变史的书，有我的成长经历、父母的故事。我生长的地方贵阳是个“三线建设”的西南城市，而我的11部电影里有3部是关于三线建设的，这也可以视为我对故乡的一种遥望和回想。

关于参选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这件事，我觉得评委们不会仔细看书的文字内容，因为书还没翻译。他们应该更多考虑的是书的结构、装帧和设计，所以我觉得这个奖项是颁给设计师孙晓曦的，当然作为一个跨界的试验，我参与其中也很高兴。如果说这本书在创意上有什么突破，就是在铅字中插入手写的补充、批改和划记。一般情况下，书有错误都要来回校正，看不到创作和完成的过程。

记者：这本书的创作和你的电影有关吗？手写体设计很有趣，像个创意试验。

王小帅：我从2014年底开始构思这本书，书的制作是独立的，和电影没关联。完成这本书时，我更像个演员，设计师像个导演。他想找手稿，但是现在大家都用电脑，手稿不多，所以我们就在书里做出手稿的感觉。这本书最有趣的是回忆部分。

首先，回忆不是日记，难免有误差，我要把这样的误差感记录下来。其次，这本书里，记忆有错误就可以修改。书在排版印制前，有一个月时间我们都在设计手写体怎么

加进来，注解怎么摆放好看并有趣，也就是说这本书一边在印，一边加手写体。

记者：曾见过你的阅读书单，你对中欧知识分子很感兴趣，比如帕慕克，还看到你看社会学方面的书，比如《乌合之众》，关于阅读，你有什么可分享的？

王小帅：帕慕克是马尔克斯之后影响我的又一个巨人。上世纪80年代的阅读特色是“瞎读”。我们这代人很幸福，整个青春期跨越了80年代的黄金时间。我起初读杰克·伦敦和罗曼·罗兰，后来随着视野的开拓，诗歌、哲学和以前见不到的西方历史都进入了我的世界，比如说70年代前接触不到的西方绘画史、西方哲学史等等。我看书比较随性，遇到好书榜上的书，有时也会买来看。在学校时看书有点囫圇吞枣，现在是有时间看一本书就觉得很幸福，尤其是当你成长到一定阶段，开始阅读反刍，就做到了开卷有益。比如《乌合之众》，发现它时，我觉得里面的一切和我当下的思考都很接近，这就是开卷有益了。



三线建设：历史在个体中延续

记者：什么是三线建设？电影批评学者王小鲁说，这本书里有你的人生轨迹和电影的创作母题。你用十年创作了三线建设的“生命三部曲”，它们是否完成了一个对生命轨迹闭合式的讲述？

王小帅：王小鲁看完这本书比较兴奋，他觉得这本书的出现，可以从源头去思考我这些年的三线建设电影。以前他觉得三线建设和大多数人没关系，观众会有疏离感。看完书后，他觉得自己误会了，原来三线建设和社会很近。在这个“大三线”中，除了贵阳之外，还有陕甘宁、云贵川和青海等地的很多城市。而且，在我的三线建设电影里，始终有“家庭”的概念。

一个人的成长除了社会影响外，潜移默化的家庭影响也非常重要。这本书是与电影平行的世界，印证着一个人的家庭观念。在这三部电影中，主人公从少年到青年到老年，完成了一个闭合的讲述。从三线建设到现在，部分第一代“三线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就是完成了一个生命的故事。三线建设对一个人和一个家庭来说，是有完整性的。它作为历史概念已经结束，但是家族受此影响，生命和血缘上的延续一直存在。

简单说，三线建设是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政府认为美国及周边国家危及国防安全，国内在13个省和自治区进行的大规模工业迁移和基础设施建设。整个西南部和西北部基本都是军事工业。回顾那个特定时期，个体命运是随着社会政治的需要而变动的，大家普遍知道文革红卫兵、生产建设兵团和北大荒知青，但是三线建

设因为是军事机密,多年来一直被屏蔽。三线建设经历者虽然多至上千万人,但是由于特殊原因,在历史过程中很少被提及。一直到我2005年拍《青红》之前,这个概念都没有人公开谈论。

记者:三部曲中,能明显感觉到你在借家庭关系思考传统。《闯入者》中的老邓、《青红》里的父亲,他们代表的传统是否与时代一致,形成对子女的迫害?在特定时代里,时代对个体有迫害,个体之间相互迫害,人人受害,谁是施暴者?

王小帅:很多代人都曾因爱之名,把意图强加于人,尤其是家人身上。但在实施爱的过程中,他本身是缺乏自我意识的。《青红》中的父亲和《闯入者》中的老邓这一类人物,虽然对时代给自己安排的命运态度强硬,但是并没有觉醒。青红父亲认为自己是上海人,被强制安排在贵州,很不舒服,想回上海。老邓更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他又提不出自己的遭遇不公平在哪儿。

三线建设史中有很多问题,很难说哪个人能承担全部责任,就像《乌合之众》这本书里,当个体处于集体中,就容易变得智商下降而盲目从众。作为大众群体来说,除了经常成为独裁或政治的受害者之外,有时会不经意地成为其中的参与者、施暴者,每个人都应该反省自己。你可能是此事的受害者,却可能是另一件事的施暴者。

记者:三部曲的完成,通常代表一个阶段性话题的完结。十年的跨度里,你的拍摄过程中,社会现实是否发生了变化?针对三线建设的反思和忏悔出现了吗?

王小帅:我清醒地知道,改变不会在瞬间发生。有时候有些纪录影像被媒体曝光后,局部上确实会改变现实。但是我相信随着影像的成长,会慢慢地激发观众的反思意识觉醒。虽然这段历史无法立刻被下定论,但是对几代三线建设者以及更广泛的大众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触动。

《青红》上映时,上海的部分老三线建设职工想做一个大的游行。我劝这些父母辈不要因为一个电影形成政治上的事件,后

来这事没有做。但我相信,虽然没做这件事,却会让更多三线建设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人谈论这个事情。《闯入者》拍摄时,就有几个老红卫兵出来,向学校的老师道歉。人走向暮年时,突然意识到当年自己也是施暴的一分子,这是一个自我良知上的审视。良知产生了一种内在的恐惧,引发的忏悔很人性化。随着未来的发展,还会有更多人反思。

创作立场:镜头不回避现实政治

记者:可以说,1949年至今的历史是文艺创作的富矿。很多“50后”导演关心宏大叙事,有人完全跳入历史。一些“60后”“70后”导演则忙着拍个体命运,或创作故乡三部曲,比如你和贾樟柯,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选择?

王小帅:这个问题特别值得深入研究。为什么“50后”一代的创作视角往往是从家国和大历史出发?家国教育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导向,是不是会造成一种影响,把家庭和自身屏蔽掉?相比来说,“60后”很幸运,没有过早体会政治生活,不会被弄上山下乡,文革十年也来不及当红卫兵。我们的记忆更多来自个人和家庭经验。进入青春期后,赶上80年代宝贵的十年黄金期,对个体解放体会得更深。

电影学院的上一辈导演,1982年可能已经毕业了,虽然当时也有了安德烈·巴赞的现实主义美学,但他们之前受到的苏式教育可能更多。十年时间,两代人的些微差别就会产生巨大变化。国家确实有很多历史是创作富矿。而作为创作者个人来说,他的视角在哪儿,他的视线落在富矿的什么位置,这是更重要的。

记者:三部曲呈现的是特定时代的政治创伤。但是,人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模糊文艺创作中的政治概念,认为要“去政治化”。如何理解?

王小帅:其实,“去政治化”的正确理解,是因为我们曾经被政治化的语言淹没和包围,所以不想再用它去表达。中国人确实被政治搞得有点焦头烂额,十年怕井绳,以至于到现在只讲娱乐。所以经常听说,现实太复杂,

不谈政治,弄弄小文艺就行了。我觉得,大众可以用自身的语言和视角来看世界。但是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无法脱离政治,国家施行的任何政策对每个家庭都是有影响的,鱼在水中,跳出水面只有那么一瞬间的脱离。摄影机就在那里,为什么要无视社会和政治带来的一切,避而不谈它呢?

记者:《闯入者》的口碑很好,但票房不太理想。反观这二十多年,独立电影和艺术片市场的整体环境,有没有出现过回暖?

王小帅:从市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时候。如果说有回暖,应该是大家可以越来越公开地去聊这些独立电影,没有什么地上、地下的区别了。地上、地下,体制内外,本来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荒诞产物,过去大家觉得搞出一个地下电影不得了,现在我觉得都无所谓了,因为市场全面转向金钱。相反,如果说排除对市场的期待,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有这些电影,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并研究这些电影,我觉得这方面是有进步。

记者:你对电影市场有过一些很尖锐的批评,比如“假资本之手扼杀独立电影”“现在是商业片的春天,独立电影的冬天”,怎么得出这些结论的?

王小帅:我们进入了一次新的“集体无意识”当中,变成用金钱、物质消费或追名逐利来给人们洗脑。创作者也面对着个人意志和集体无意识之间又一轮较量。

其实,现在投资一直在向好的电影靠拢,独立电影面临的主要是出口问题。现在的最高智慧,应该去思考商业片和独立电影如何共生并存,而不是谁代替谁。娱乐工业现在是主流,这种有趣的作者型电影(独立电影或艺术电影)不是主流,且处境过于艰难。

现在只能民间传播,小范围的资金循环做不到持续,导演无法心无旁骛地好好创作。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现状不健康,大的环境下很难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每部电影都在寻找自己的发展出路,却无法形成一个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个问题有待电影人的集体智慧去解决。

旧学问和新学术

中国人做学问，讲究书读得多，腹笥宽，肚子里的料要多。而西方人做学术，形式上讲究有体系。自胡适之后，人文学科的西洋学术形式，总算进入了中国。

文 / 张鸣

近代中国，百事需变，百事愁变，学术界亦莫能外。

西洋的学术进来，不同的学科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声、光、化、电等自然学科具有太强的实用性，而这些领域中国原本就是空白，接受起来比较容易；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也需要跟人家接轨，硬着头皮也得引进。

然而，人文学科则不同，西洋有文史哲，我们有经史子集。中国传统的史学、经学、考据和训诂，谁也不能说它不是学问。讲西洋的历史或者哲学，中国的学者也许不行，但讲中国的，多少还是有些自信的。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长校之前，中国的学界基本上是老派学者的天下。哲学系讲中国哲学史，要从三皇五帝、三坟五典开始，讲一年，才到商朝的《洪范》，孔夫子什么的连影子都还没见着。今天我们知道，在甲骨文之前的中国典籍，其实并不可靠，大多为后人伪托的。但是，当年的老派学者，却不能不这么讲。不讲足中华五千年，政治上就不正确。

胡适先生回国之后，如果讲西洋哲学史，毫无问题，谁也不会说什么。但是，他偏要讲中国哲学史，一上手就是老子、孔子，而只把此前的诗、经，作为中国哲学的胚胎。讲到荀子，也就结束了。这样的讲法，在今天司空见惯（实际上所有中哲史学者，都是胡适的余绪），但在当年，却让老派的学者受不了。学生也大吃一惊，用顾颉刚的话来说，就是“惊得挤舌不能下”，即张口结舌。

同样也讲中国哲学史的陈伯弢老先生，听说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摇头晃脑地连说不通，说是哲学史就是哲学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

的大纲，哪里有大纲之上还有大纲的道理？而瞠目结舌的学生们，受到了震动，臧否不一。最终还是由于学问最大的傅斯年，在认真听了胡适的课之后，做了肯定的评价，大家最后才认账。傅斯年的评价是：虽然胡适没有陈伯弢有学问，但路子是对的。我想，学生跟老先生不一样，英文不错，多少看过一些西洋人写的东西。

其实，正如唐德刚的考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底子就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的博士论文。但是，这个论文在答辩的时候，是“大修通过”的，所谓“大修通过”，近乎枪毙。

所以，胡适离开美国的时候，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这个在美国差点被枪毙的论文（按唐德刚的说法，当时参与答辩的美国教授，其实并没有人懂中国的学问），到了中国，却大受欢迎。等于开创了用西方的学术形式（还谈不上方法）研究中国学问的先河。

从那以后，一千中国学人也就跟上了。所以，十年之后，爆得大名的胡适的论文，也就无需“大修”，直接通过了。“胡适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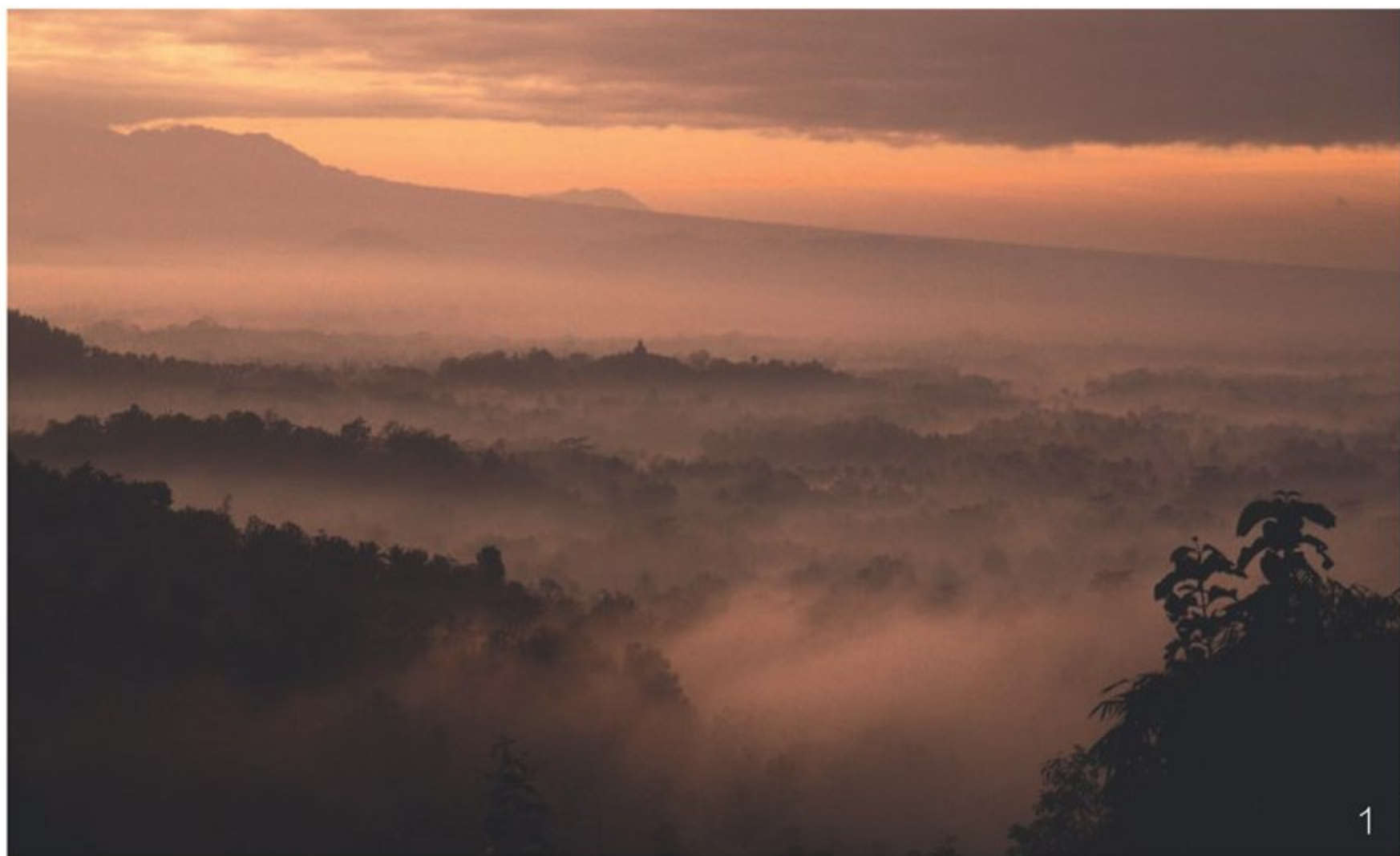
士”被叫了十年，才真正戴上了博士帽。

当然，这么一来，这个开先河的著作，也无需完成下半部了，因为后人跟上之后，做得比胡适还好。后来，胡适又写了若干半部书，都是开了先河，然后下面就没了，也无需有了。

西方人做学术，形式上讲究有体系。胡适的大作，作为提交给老外的博士论文，当然符合这一要求。但是，中国人做学问，讲究书读得多，腹笥宽，肚子里的料要多。人家读过的，你没读过，或者读过了没记住，就不配跟人谈学问。不仅如此，学界还特别重传统，讲究家学。至于文章写出来是什么样子，大家并不计较。这个习惯，显然不那么容易被改变。所以，单单学生认账还不行，还需要学界认可。

蔡元培为了让中国学人尽快认同胡适，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的时候，居然说胡适出自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因而有家学传统。其实，胡适跟精通汉学的绩溪胡氏家族，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这样一说，那些习惯掉书袋的老学究们，到底能不能认账、认可了胡适研究中国学问的资格，这不好说，但蔡元培的苦心，倒是难得。

自胡适之后，人文学科的西洋学术形式，总算进入中国了。此后，大家越做越像，著述甚多。同时，像样的大学里，留洋归国的学生也越来越多，逐渐占据了主流。影响所致，连钱穆这样没出过国的“土包子”，写出的考据著作和通史性的《国史大纲》，也不是传统史学的样式了。自学英文的他，其实也在偷偷地阅读英文的史学著作。



摄影 刘玥

1

穿越爪哇： 浓缩的印尼风情画

文 / 麦静



旧时读书,每读到“爪哇国”一说,常遥想至虚无的南洋诸岛,颇有“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的感喟。而今日的爪哇,作为印度尼西亚的第四大岛,拥有国内过半人口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前往的路途似乎并不遥远。从首都雅加达一路向东,横穿狭长的爪哇岛,印尼的风土人情尽在其中矣。

与度假胜地巴厘岛截然不同,爪哇岛的物价低廉,英语并不普及。出了雅加达以后,高级酒店寥寥无几,当地更流行的是一种叫Losmen的简易住宿:一栋家庭民宿式

的小楼,提供风扇、干净床铺、冷水淋浴和早餐,双人间一晚只需约15美元。大部分餐馆都没有英文菜单,还好印尼语的拼写采用拉丁字母,可以用Google翻译查到词义。这套拼写系统由荷兰人发明,1972年,印尼政府又推出了以马来语为基础的拼音系统,如今的印尼语拼写与马来语已十分接近。

这似乎是某种喻示:从商业、宗教到语言,外来文化早已在这片炎热多雨的土地上深深扎根,错综交织地渗透在这个国家今日的种种面貌当中。

佛陀沉睡之地

抵达日惹的时候,正好是除夕晚上。尽管春节早在2002年已被定为印尼的法定节假日,然而,在城中最繁华的街道上,亦无半点农历新年的气氛。

据统计,在印尼的华人数量多达一千万,然而走遍城中几条主要的商业干道,也没看见任何中国商店和餐馆的痕迹。从1998年5月的排华暴行,到2014年印尼政府宣布正式废除官方用词“支那”(Cina,含有蔑视成分),重



摄影 刘珂

2

新采用“中华”(Tionghoa,源于闽南语发音)一词作为对华人的称谓,当地人与华人间的和解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绝大多数游客来到日惹,皆为一睹东南亚三大佛教遗迹之一的婆罗浮屠。约在公元8世纪,盛极一时的夏连特王朝在山丘上修建了这座举世无双的佛塔,它上下共有九层,象征佛教的大千世界及心灵深处,每一层都指代一重修炼的境界。从佛塔的东面进入,拾级而上,再按照顺时针的方向逐层游览,不仅可以尽览每一层回廊上精美绝伦的史诗浮雕,同时也象征着逐步趋近完美的精神境界。

凌晨四点,我们从婆罗浮屠脚下开始攀登。漫天星斗闪烁,远处隐隐传来庙宇的梵唱。天色渐渐明了起来,在顶层无数座钟形的舍利塔之间,错落其中的佛像神色恬然,拈花微笑,笑意又消融在乳白色的晨雾里。目之所及,青山如黛,底下烟云缭绕,似乎确是另一重境界。

有趣的是,距婆罗浮屠不远的另一处著

名遗迹普兰巴南——一座印度教的湿婆神庙,也几乎建造于同一时期。有学者认为,宗教的更迭从未在印尼造成激烈冲突,信奉印度教的国王可能会庇护佛塔的建造,反之佛教徒国王亦然。在今日的印尼,将近90%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但这并不妨碍婆罗浮屠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游览景点。

八九点钟时分,印尼的本地旅行团就纷纷涌入,其中的女性全都戴着穆斯林头巾,又遵照这里的规定,腰间围上大乘佛教图案的纱丽。这些本土的游客团,通常是一个二三十人的大家庭,又或是中小学组织的旅行团,大概是难以见到外国人,他们经常笑容灿烂地拉着游客比划,然后涌上去一起合影。

婆罗浮屠曾经在若干世纪中沉睡于层层火山灰之下和茂密的丛林之中,直至19世纪,才被荷兰殖民者发掘,得以重见天日。后来又因为《国家地理》的一组专题报道,广为各国游客所知。无独有偶,吴哥窟的命运也惊人的相似——失落在茂密丛

- 1/ 婆罗浮屠和默拉皮火山的日出。
- 2/ 婆罗浮屠被誉为东南亚三大佛教胜地之一。

林之中,又被殖民者所发现。这令人想起马克思描述东方的那句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尖叫的猫屎咖啡

离开日惹以后,接连在泥泞的土路上开了八九个小时,到布罗莫火山匆匆看过日出,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座火山。所幸这段再次长达八九个小时的路程,几乎一直沿着海岸线开,雨季的热带天空透出一种沉郁的湛蓝,大片的橡胶树林与稻田刚刚被雨水洗过,浓绿异常。摇下车窗,爪哇海的风肆意地扑到脸上,疲惫不堪的旅途似乎一下子轻松了下来,连司机大叔也开始哼起慢悠悠的印尼民歌。

司机由旅行经纪代为安排,是个皮肤黝黑的本地大叔,完全不懂英语。不过语言显然不是沟通的唯一方式,司机大叔哼着歌,突然



扭过头来热情地说“Kopi, Kopi”,又做了个喝茶的手势,然后停到了一家小店门外,要请我喝咖啡。

早在17世纪,荷兰人就将阿拉比卡咖啡树种引入斯里兰卡和印尼,至18世纪,印尼已成为咖啡的主要产地,为欧洲提供大量的优质阿拉比卡咖啡豆。19世纪后期,一场大规模的咖啡锈病席卷亚洲,摧毁了斯里兰卡的咖啡种植业,自此斯里兰卡改为种植茶叶,并一跃升为世界三大产茶国之一,而印尼则不得不从非洲引进抗病能力更强的罗布斯塔品种。如今的印尼咖啡超过90%都是罗布斯塔品种。阿拉比卡咖啡价格昂贵,多作为精品咖啡出售,而罗布斯塔咖啡产量大、价格低,通常用来制作速溶咖啡、罐装咖啡饮品。

不难推断,在印尼街头巷尾流行的都是罗布斯塔品种的咖啡,它们通常只要大约1500盾(约合人民币七毛钱)一杯。印尼人喝咖啡不大讲究——通常是阿拉伯式的饮法,将咖啡粉放在一把大茶壶里煮,倒入杯中也不经过滤,只是耐心地等着咖啡粉慢慢沉到杯底,加入大量白砂糖,再一口饮下

这浓稠如草药之物。

这并不意味着印尼没有上等咖啡。除了早已蜚声国际的精品咖啡曼特宁以外,近年来印尼还因为一种颇为新奇的咖啡而声名大噪——麝香猫咖啡,俗称“猫屎咖啡”,售价可达数千美元一公斤。麝香猫生活于丛林地带,会挑选最为成熟香甜的咖啡豆食用,咖啡豆经过麝香猫胃部的发酵排出后,据称会具备一种独特而美妙的风味,融合了酒香、糖浆与巧克力的口感。

这种习性无疑成为了麝香猫的噩梦。最初,当地人只是潜入丛林大肆搜寻麝香猫的粪便,它们的栖息地受到破坏。后来,人们发现人工养殖麝香猫可以带来更丰厚的收入,于是大量的野生麝香猫被捕获,囚禁在卫生条件恶劣的牢笼中,终日被迫不断吃下咖啡果实,再排出贵如黄金的粪便,其中的咖啡豆则被清洗处理,出口到世界各地。

喝过咖啡,公路逐渐潜入深山,不断回旋。山间雾气深重,便宜的印尼3G手机网络开始失去信号,乳白色的湿润空气不断漫上车窗,需要反复用手指拭去,才能看清窗外高高

低低的山谷,环抱着密匝匝的咖啡树。在驶入我们将要寄住的咖啡种植园之前,司机大叔忽然把车停在一栋并不起眼的小院前,微笑着指着大门说,“Kopi luwak, kopi……”。(麝香猫咖啡)里面隐约传来凄厉的兽类叫声,混杂着挣扎时拽动的锁链声音。再一细看,大门上挂着一只颜色剥落的卡通麝香猫,我才回过神来,摆摆手表示对“猫屎咖啡”并无兴趣。

从印尼回来后不久,我到郑州出差,走进了一家叫做“猫屎咖啡”的连锁咖啡店。店里的招牌饮品正是麝香猫咖啡,标价两百多人民币一小杯。咖啡店客流兴旺,这种昂贵而曾经鲜有听闻的咖啡,大概将成为这座城市的富人新宠,代表着某种与国际接轨的奢侈品味。

硫磺火山的眼泪

如果自西向东横贯爪哇,宜珍火山将是岛屿上的最后一座火山。由于它富含高纯度的硫磺,夜半时常会出现蓝色火焰的奇观,近年来也开始有零星的游人前往。但火山附近没有任何旅店,我只能住在距其数



3

十公里外的一个咖啡种植园里，再于凌晨驱车前往火山。

旅行经纪安排的当地向导在山路的入口处等我，他先把我带进了旁边一个破落的办公室，里面有两个穿着制服的官员模样的人，指了指旁边一块纸皮牌：Camera Fee: \$10（相机费：10美元），我摇摇头，他们又把我的背包搜查了一遍，确认没有单反相机，才悻悻地放我出门。

除了入口的收费办公室外，再找不到这里有半点与游览相关的迹象，上山的土路一片漆黑，周遭杳无人烟，看来不过是座光秃秃的荒山。直至临近山顶，手电筒微弱的光照出近处的路，这才明白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一片乱石嶙峋，我们需要攀爬到火山的谷底，才有可能看得见硫磺火焰。是夜细雨连绵，比起脚下的湿滑与崎岖，更难以忍受的还是刺鼻的硫磺气味，随着路径的深入而愈加浓烈。

我预先准备了3M的口罩，然而此时才发现它只能抵御北京的雾霾，对硫磺的毒气却束手无策。这时身旁路过一小队欧美背包客，

1/日惹苏丹皇宫南广场上的彩灯单车。
2/日惹街头制作皮影戏人物的匠人。
3/日惹传统美食。

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防毒面具、护目镜、登山杖，一应俱全。我正暗自羡慕，却陆续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矿工：他们不戴口罩，只戴着头灯，肩上扛一根铁杆，两头是沉重的竹筐，装满了大块的硫磺。尽管挑着将近两百斤的重担，他们依然步履如飞。

向导告诉我，矿工们一天大约要工作12个小时，敲下来的硫磺论斤计价，所以矿工们都会争取多扛一些重量，多来回几趟，这样下来他们一个月大约能挣200美元左右。“我以前也是一个矿工”，向导一边跟路上遇到的旧相识打招呼，一边用半吊子英文跟我说，“不过我怕死，所以来当向导了”。由于长期暴露在高浓度的硫磺气体中，这些矿工的寿命一般都很难以超过50岁。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攀爬，我们终于深入谷底，强烈的酸性气味让人几近窒息，由于有雨，硫磺火焰势头不大，蓝莹莹的一簇在岩石的缝隙间神出鬼没，随即涌出大量的

白色气体，灼得人双泪流无法视物，游人中有个年轻的女孩几近昏厥，不远处有几个正坐着歇息的矿工，看着我们，发出了友好而略带嘲弄的笑声。

随着拂晓来临，火焰渐渐式微，眼前黑黢黢的火山湖渐渐现出本来的颜色，温柔的绿松石色几乎要让人忘记它的危险内在——这是世界上酸性最强的火山湖，前两年便有法国游客不慎落入其中，尸骨无存。不过相比之下，更为危险的恐怕是另一种缓慢而无形的吞噬，火山湖夜以继日地释放出硫磺气体，而矿工们也仍将往返于这段路途上，不舍昼夜。

回程的路上又断续遇到了挑着担子的矿工，他们笑着向游人兜售刻成螃蟹、心形、字母形状的各式硫磺块，牙齿在长年熏燎的黝黑皮肤的映衬下分外洁白。在掏钱准备买下一两个纪念品时，我才发现手腕上佩戴多年的银镯已被熏成了暗红色，真是难以想象怎样的皮肤才能胜却金属，抵御硫磺的长年侵蚀。

离开宜珍火山，再驱车两三个小时，即可抵达与巴厘岛隔海相眺的码头，搭乘半小时的轮渡，便就此告别这个昔日的爪哇国度。踏足巴厘岛，则全然是另一重人间。适逢农历新年，海滨小径上熙熙攘攘，到处都是出手阔绰的中国游客，而这里的印尼人全都态度友好、英语流利，提供专业而热情的微笑以及各种周到服务。

叫上一辆出租车，在弯弯曲曲的临海山路上兜上半小时的风，费用则足以抵上在爪哇岛租赁一天的SUV车连带司机。巴厘岛犹如一个流光溢彩的离岸梦境，由高级酒店、沙滩、海鲜餐馆和游客织成，显得与印尼的过去及现在都毫无关系。

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曾于《岛夷志略》中如此描绘爪哇——“宫室壮丽，地广人稠，实甲东洋诸番……其田膏沃，地平衍，穀米富饶，倍于他国”。此种盛景似乎早已模糊在历史烟云中，不复可寻。今日爪哇更像是大部分游人都希望暂时逃离的生活本质——坚硬、艰辛，充满残酷的真实。

编辑 徐伟 制图 美编 黄静

人类为什么越来越善良？

学者斯蒂芬·平克认为，不论是来自考古学、人类学、文化学，还是统计学的证据，都证明了人类本性凶残，在文明的进化过程中，我们正变得越来越好。

文 / 唐山

“战争日渐减少，人类正变得越来越善良。”对于这样的命题，相信许多读者不以为然。

毕竟，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并未完全消散，一般认为，那是史上最残忍的两次战争，更何况，从没有哪个时代曾出现过纳粹这样的极端组织，它通过工业化的手段杀掉近600万人，几乎消灭了一个民族。我们把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称为“悲伤的20世纪”。

是的，自二战后，世界相对和平了几十年，但前提是现有核武器足以消灭人类上百次，一旦脆弱的“恐怖平衡”被打破，当下的和平又有多大意义？人们宁愿相信：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凶险，暂时的平静不过是在为下次战争积攒能量而已。

不知道为什么，斯蒂芬·平克给自己这本内容厚重的书起了个鸡汤式的标题——《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平克被誉为“当今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面对来自“常识”的挑战，他该如何回应？

人类原本就是凶残的动物

几乎所有民族都曾将过去视为天堂，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神话：先民既淳朴又善良，所以持久和平，没有战争。但是，这个神话得不到考古学证据的支持。

以距今5300年的“奥茨冰人”为例，他身上带有4个人的血迹，显然，他生前经历混战，最终因后脑中箭和肩部重创而死。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证明，先民们自相残杀，并吃掉对方。在已发现的原始文明遗迹中，无一例外布满暴力痕迹。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斯蒂芬·平克(美)著 安雯译
中信出版社



美国学者戴蒙德，曾持续50年观察新几内亚原始部落，在《昨日之前的世界》中，他展示了一幅仇杀不断、充满血腥的画卷，几百个部落为生存而竞争，谁敢踏入他人领地，必将付出生命代价，许多部落已忘掉因何成为世仇，可彼此成员一见面，必然兵戎相见。

统计表明，原始社会因战争造成的年均死亡数占人口总数的5.24%，而即使遭遇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德国、日本、俄国（苏联）年均因战争死亡人数也只有1.44%、0.27%和1.35%，如将全人类都算进来，则只有0.6%。

原始文明战损率高，因为开展的是“无限战争”，双方频繁采取偷袭战术，老人、儿童、妇女皆在猎杀名单中，为瓦解敌手的抵抗意志，不惜使出最恐怖的手段。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荷马史诗》中会有如此多的血腥描写，为什么《圣经·旧约》中的上帝

如此残暴，动辄消灭全城男女老幼。

不论是来自考古学、人类学、文化学，还是统计学的证据，都证明了人类本性凶残，在文明的进化过程中，我们正变得越来越好。

人类是怎样把暴力关进笼子的？

斯蒂芬·平克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个暴力行为明显下降的阶段，即国家的诞生、人道主义革命和权利革命。

国家诞生的价值在于：通过国家垄断暴力的行为，杜绝了日常暴力的泛滥。从统计上看，这使暴力死亡案例降低到原来的1/10。

新几内亚的一名奥纳亚人这样解释国家的作用：“政府来了以后，生活好多了”，“一个人可以安心踏实地去吃饭了，无须时刻警惕别人的袭击，早上可以放心地出门撒尿了，不用担心中箭丧命”。

塔西佗曾说：“原来我们受犯罪之苦，现在我们受法律之害。”中世纪欧洲凶杀率高达0.04%—1%，而到1950年，则下降到0.008%。从13世纪到20世纪，英国各地凶杀下降至原来的1/10—1/50，即使是纳粹德国时期，一对一的凶杀率都在下降。

15世纪，欧洲有5000多个独立的政治单元，17世纪早期变成了500多个，到拿破仑时代是200多个，到1953年，只剩下不到30个。操纵暴力之手越少，则暴力行为亦不断减少。

但反例是，美国作为最成熟的现代国家，其犯罪率却居高不下，这岂不是证明了：国家无法有效减少暴力？

斯蒂芬·平克的解释是,美国由三部分组成,即东部、南部和西部。新英格兰文化污染的东部地区犯罪率、凶杀率等接近欧洲,而西部、南部低收入地区基本处于无国家状态,穷人们依赖“荣誉文化”(即以牙还牙)来保护自己,而不是国家法律。换言之,要减少暴力,必须进一步强化国家的作用。

国家垄断大大减少了暴力,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谁来约束国家滥施暴力?而人道主义革命的价值在于重建道德理性,以约束国家滥施暴力。

在人道主义革命前,人类的精神世界长期被信仰和迷信所把持,道德家们认为,只有严厉的刑罚才能抵抗人天性中的堕落,这为残忍打开了方便之门。

由于当时国家能力有限,为维持秩序,管理者倾向于用酷刑来震慑犯罪。在几乎所有国家,公开处决、虐待成了集体狂欢,人们观赏着活剥人皮、凌迟、砍头、剖腹、鞭打等,并将其视为正常的生命体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鼓励了暴力行为的泛滥。16世纪巴黎风靡“烧猫”游戏,闲汉们将猫吊在火堆上方,不断放低绳子,以欣赏其惨叫,直到它慢慢变成焦炭。从暴民到暴君,历史进入死循环。

人道主义革命萌发于17世纪“理性时代”,在18世纪末“启蒙运动”中达到光辉顶点。通过重建道德理性,人类懂得了刑罚不是要讨伐神秘的宇宙正义,而是为了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

道德理性的最大成果是将权力置于笼中,从而有效控制了暴力,这是个双赢格局:古罗马的49个皇帝中,有34人被杀死,而从中世纪到1800年,欧洲弑君率降至原来的1/5。权力越来越慎重地使用暴力,人民也越来越倾向于“不流血的革命”。

而说到权利革命,它的价值则在于让非暴力成为我们生活的自觉。

上世纪30年代,美国父母平均每个月揍孩子3次,1975年,降到每年10次,到1985年,降到每年7次。上世纪50年代,94%的瑞典人打孩子,其中33%的人会经常打,到

1995年,经常打孩子的只剩4%。

1967年,25%的美国男人认为扇妻子耳光天经地义,甚至17%的美国女性也表示同意,到1991年,仍这么想的美国男人已不足15%,到1995年,只有5%左右的女性对此表示认同。

美国学者戴蒙德在《民主的精神》一书中提出,从调查结果看,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民众普遍赞同现代民主制度,越是被严格监控的社会,人们赞同度越高,可他们在性别平等、儿童权利等方面,却表现出较低的认同率。事实证明,束缚我们的并不是文化、历史等因素,而是政治以及对权利认识的水准。

权利革命不仅减少了家庭暴力、种族冲突、私刑等带来的伤害,而且使人类养成了视暴力为野蛮的思维习惯,现代人遭遇的暴力正变得越来越少,连虐狗、虐猫等亦被法律禁止。在权利革命风行的50年中,全球民主国家数量显著增加,世界各国暴力发生率明显下降。

也许,不大声喧哗、不随地便溺、不动辄骂人打架,会让一些人觉得束缚太多,但人人都不那么穷凶极恶,这世界就会安全许多。

规律事件与概率事件的区别

在书中,斯蒂芬·平克列出了足够扎实的统计数据,证明暴力正在减少,我们可能永远告别大规模战争,但自二战后,人类对这种理性推论越来越不感兴趣,因为无法回避这样的追问:在经历了惨痛的一战后,为什么我们又掉入更惨痛的二战中?为什么理性没能制止悲剧的发生?

斯蒂芬·平克的回应是:只要将以往战争完全罗列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其爆发时间并无规律可言,换言之,战争是概率事件,而非规律事件。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概率是均匀分布的。假设一栋房子每个月会遭到2次雷击,如果某月1日它已被雷击过一次,那么下次最可能发生在哪天?很多人会觉得,剩下29天机会均等,都是1/29的可能性,这其实依

然是规律思维,而非概率思维,学过概率论的人知道,2日它被雷击的可能性最高,离1日越远,则被雷击的几率越低。

典型的概率事件都是集中分布的,正如下雨,总是有的地方多一点,有的地方少一点。离这次大战越近,就越可能爆发下次大战,离它越远,爆发大战的可能性就越低。

换言之,20世纪爆发两次世界大战是概率决定的,用规律思维根本无法解释它,但即使如此,也并不影响人类暴力不断下降的事实——以更长的视角去看,20世纪战争总数显著减少,战争造成死亡率亦显著降低。

以统计学的视角看历史,并非新方法,但本书胜在不仅引入了统计学的技术,更引入了统计学的智慧。比如将概率事件与规律事件分开,这是以往史学工作者常常产生误会的地方,严格来说,风靡一时的“历史周期律”“血酬定律”等,就有误把概率当规律之嫌。虽然造出了一些新词,却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由于太过随意地无视反例,使它们的解释力大打折扣。

本书引人深思之处在于,在减少暴力的三阶段中,中国究竟处在怎样的地位上,还需多久才能赶上世界潮流?

显然,我们已迈过国家诞生的门槛,但在人道主义革命阶段存在缺陷。在我们的社会中,许多通识尚未被贯彻,许多常情常理尚被视为异端,我们距离真正意义上的道德理性还有差距,不得不经常依赖习惯、文化、命令来维持,这给暴力留下空间。

至于权利革命,我们更是刚刚起步,性别歧视广泛存在,几乎所有家长都在打骂孩子,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游客迈出国门会有种种奇葩举动,因为在日常生活的大课堂里,我们接受的是另一种教育,它驱走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留下了暴力。

历史如长江大河,不论遭遇怎样的“三峡”,终将奔流到海,从这个意义说,多一个明白人,就会少一分苦痛,少一点代价。读史方知天地宽,这应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1 全家欢乐出游记 邂逅吉祥物“海星宝宝” ——三亚海棠湾喜来登度假酒店欢乐家庭套餐



● 三亚海棠湾喜来登度假酒店近期隆重推出“海星宝宝”欢乐家庭套餐,人民币2,290元起,包括:入住50平米宽敞舒适的园景房三天两晚;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至酒店定点穿梭巴士接送机服务;每日两位成人及两位10岁以下儿童营养自助早餐;入住时,小宝贝可获赠儿童特色礼物及欢迎饮料;还可免费参加海星宝宝科普小课堂等趣味儿童活动。如需预订更多详情或预订,请致电0898-38851111

机场至酒店定点穿梭巴士接送机服务;每日两位成人及两位10岁以下儿童营养自助早餐;入住时,小宝贝可获赠儿童特色礼物及欢迎饮料;还可免费参加海星宝宝科普小课堂等趣味儿童活动。如需预订更多详情或预订,请致电0898-38851111

2 一下科技完成D轮融资 中国移动视频迎来巨头时代



● 近日,一下科技在北京正式宣布,已完成由新浪微博领投,红杉资本、韩国YG娱乐等知名投资机构跟投的2亿美元D轮融资。据悉,本次融资后,一下科技估值已超过10亿美元,正式跻身独角兽俱乐部,此次融资表明中国移动短视频领域将正式进入巨头时代。

一下科技成立于2011年8月,是中国领先的移动短视频娱乐分享应用和移动视频技术服务提供商,拥有业内一流的视频编解码经验以及视频多媒体运营能力,旗下拥有“秒拍”和“小咖秀”两款业界领先的视频应用产品。其中“秒拍”产品,每日视频上传量超过100万,日播放次数则达到5.1亿次;而“小咖秀”产品,上线短短半年,日活跃用户已突破500万大关。

一下科技成立于2011年8月,是中国领先的移动短视频娱乐分享应用和移动视频技术服务提供商,拥有业内一流的视频编解码经验以及视频多媒体运营能力,旗下拥有“秒拍”和“小咖秀”两款业界领先的视频应用产品。其中“秒拍”产品,每日视频上传量超过100万,日播放次数则达到5.1亿次;而“小咖秀”产品,上线短短半年,日活跃用户已突破500万大关。

3 第十五届国际无我茶会在浙江龙泉举行

● 10月27日,第十五届国际无我茶会在浙江龙泉举行。来自日、韩、美、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等国内外代表共350余名茶人参与了本次茶会。大会以“弘扬茶文化、发展茶产业、促进茶旅游”为主题,依托龙泉当地得天独厚的茶、瓷、水文化,向国内外茶届人士展示了龙泉悠久的茶文化、青瓷文化以及良好的生态和旅游资源。“国际无我茶会包括七大精神:无尊卑之分、无流派和地域之分、无报偿心之分、五好恶之分、求精进之心、遵守公共约定、培养默契,体现团体律动。”此次茶会发起人之一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王岳飞介绍。龙泉金观音红茶已连续三届在“浙茶杯”评比中独占鳌头,为今后龙泉打造浙江的“红茶之都”立下良好基础。通过本次茶会,龙泉市借力平牌效应,力争将其建成竞争力强、辐射面广、影响力大、国内知名的休闲茶旅养生地、茶文化传播中心与多茶类发展示范区。(高小影)

4 方寸承尊 公益承爱 心系天下 W2016 耀目驭世



近日,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中国电信,携手全球移动通信与数码融合技术领导厂商三星电子,在北京万事达中心举办了万人规模的“心系天下 W2016 天翼手机发布暨公益基金启动音乐会”。

心系天下 W2016 天翼手机发布暨公益基金启动音乐会”。

心系天下系列产品自诞生以来,一直是中国高端手机市场的领跑者,备受高端用户青睐。本次发布的 W2016 是心系天下第八代旗舰手机,秉承“传承、创新、尊贵、思仁”品牌理念,蕴含大师工艺与优良设计的品牌基因,在外观设计上有重大突破,应用全新至臻材质,品质力臻完美,性能出类拔萃,较前七代产品具有显著创新,整体形象令人惊艳。心系天下 W2016 将继续领跑高端手机市场,树立顶级商务旗舰新一代典范,为成功人士打造前所未有的尊贵体验。

本次发布会上,心系天下还推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心系天下公益基金”,今后将以此为平台实现心系天下扶危济困的公益行为和企业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献礼社会,彰显品牌一直坚守的“心怀大仁、仁思天下”的公益精神。

5 全球顶尖商学院院长齐聚复旦共论“管理教育创新”

● 11月初,来自全球11所知名管理学院的院长和代表会聚于复旦大学,共同庆祝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复建30周年。

在当天举行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全球合作学院院长论坛上,陆雄文院长回顾了三十年以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从恢复建院到逐步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管理学院的历程,表示“与全球十所商学院合作过程中,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收获颇丰。”

据悉,在近日公布的英国金融时报全球EMBA项目排名中,复旦大学与华盛顿大学联合举办的EMBA项目已连续4年跻身前十;而与BI挪威商学院、香港大学联合举办的EMBA项目也名列百强。

陆雄文表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管理学教育已经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学教育,在水平和规模上仍然存在差距。尤其是在人才培养的数量方面,中国每年培养的高级管理学位拥有者不及美国的六分之一。耶鲁管理学院斯奈德院长指出,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不希望拥有更多高水平的管理人才,管理人才被各国均视作一种重要人力资源,企业乃至公共事业的运营都离不开管理人才。